

精編插圖本

多余的话



瞿秋白 著

译林出版社



多余的话

瞿秋白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余的话 / 瞿秋白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47-3334-2

I. ①多… II. ①瞿…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6021号

书 名 多余的话
作 者 瞿秋白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宗珊珊 门国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334-2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多余的话

何必说? (代序)	3
“历史的误会”	5
脆弱的二元人物	10
我和马克思主义	14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18
“文 人”	22
告 别	36
记忆中的日期	40

乱 弹

乱 弹 (代序)	45
世纪末的悲哀	50
画 狗 罢	52
哑巴文学	54
一 种 云	56
菲洲鬼话	58
狗样的英雄	61
猫样的诗人	66
吉诃德的时代	77
苦力的翻译	79

水陆道场·····	81
民族的灵魂·····	81
流氓尼德·····	84
鸚 哥 儿·····	88
沉 默·····	90
暴风雨之前·····	92
新鲜活死人的诗·····	93
财神还是反财神? ·····	97
财神的神通·····	97
狗道主义·····	100
红 萝 卜·····	103
“忤 悔”·····	105
反 财 神·····	116
小 白 龙·····	118
《铁流》在巴黎·····	122
谈谈《三人行》·····	127

散 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137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41
猪 八 戒·····	171
美国的真正悲剧·····	174
美国的“同路人”·····	180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183
慈善家的妈妈·····	185
鬼脸的辩护·····	195

王道诗话·····	199
关于女人·····	201
真假董吉诃德·····	203
透 底·····	205
中国文与中国人·····	207
关于高尔基的书·····	209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212
“美”·····	215
出卖灵魂的秘诀·····	218
最艺术的国家·····	220
人才易得·····	222
择 吉·····	224
《子夜》和国货年·····	226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238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	240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244

多余的话

编者按：《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作。这里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刊出。除当时普遍混用的“的”“地”“得”外，其中明显的错字漏字都在[]内标明。

1935年8、9月，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部分刊载了这篇《多余的话》，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发表了全文；与手抄本比较，《逸经》发表的文本有不少遗漏，这里都逐一注明。

《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供研究者参考。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①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① 语出《诗经·黍离》。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①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

^① 即《新社会》旬刊，1919年1月1日创刊，次年5月被查封。

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①（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②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③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④。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发起，于1920年3月创立。

② 《妇女与社会》，即《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 et Socialisme*）。其作者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③ 《晨报》初名《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28年6月停刊。

④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记述，他是1920年10月14日从北京动身去莫斯科的。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①（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時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②，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

① 陈独秀当时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② 大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和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

的见解，当时只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连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

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个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聩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①——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

^①《逸经》所刊本文，自“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起，至以下第四段“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一句为止，一共遗漏4段文字。

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①，梁漱溟[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

^①《逸经》本自“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至“文艺评论”，共遗漏36字。

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工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工]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工]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

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什]维克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

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①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①《逸经》本遗漏“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一句。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义[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

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年尾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

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党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党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我也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

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党的争辩[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 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

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

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

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①。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①《逸经》本自“这些都做了”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共遗漏 26 字。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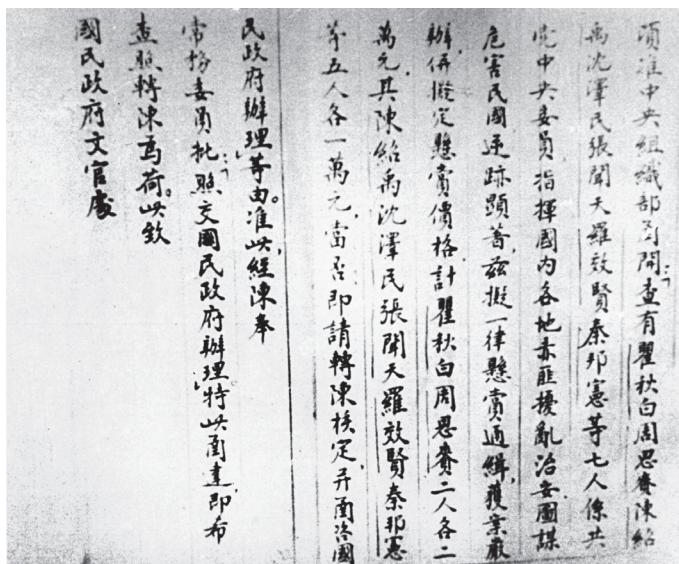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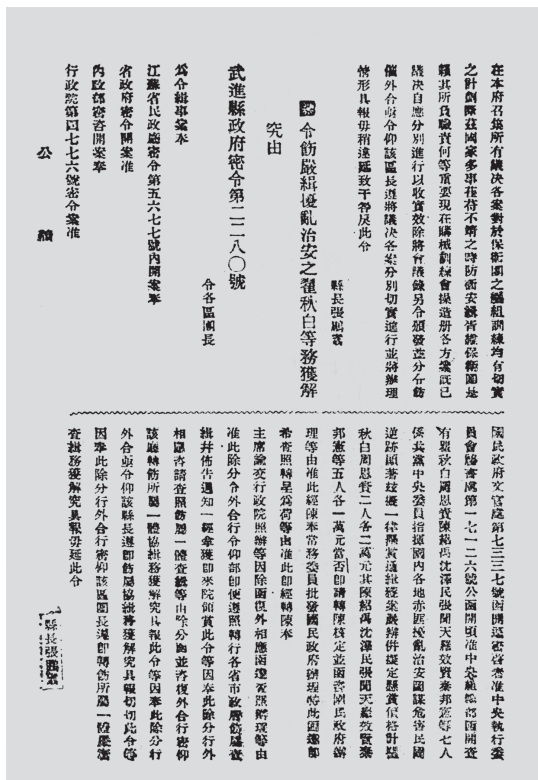


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留影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密令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重金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七人，并拟定悬赏金额：瞿秋白、周恩来各两万元，其余五人各一万元。



国民党武进县政府密令

国民党武进县政府严缉瞿秋白等的密令，刊载于《武进县政公报》第55、56期合刊。



长汀县小径村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长汀县小径村被俘。



长汀瞿秋白囚室

廿載浮沉萬事空
年華似水一流
東枉拋心力作英雄
湖海樓連
芳牀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
昏已近夕陽紅
寂寞此人間
且喜身無主
眼底空
烟過盡時正我消遙處
花落
知春殘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
春再來應有負如故
算
山城細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舊夢
殘何事萬緣俱寂後
偏留綺繞
空山

夢回 情寄天涯

一九三三年初 在竹於汀州獄中錄

寒冰先生雅正

瞿秋白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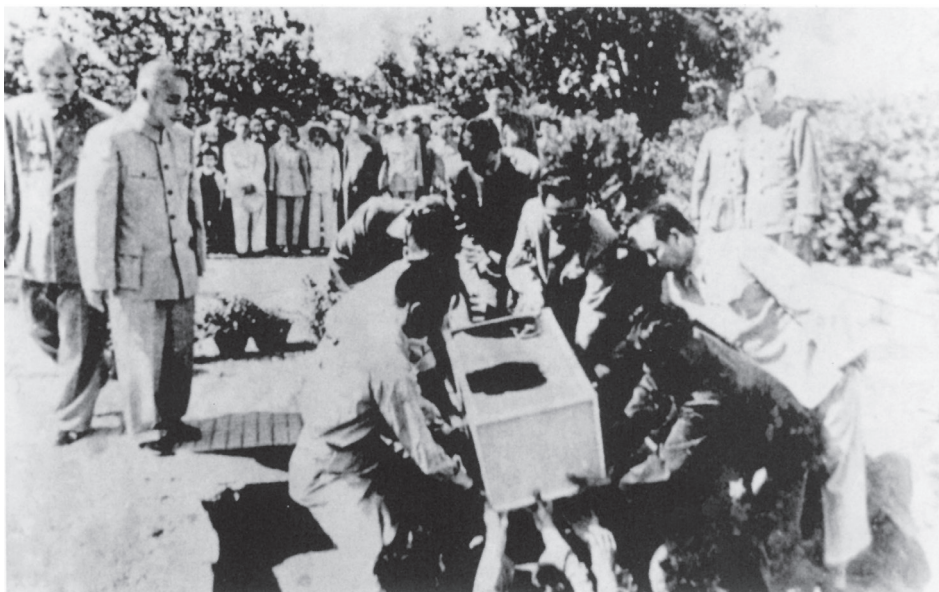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驻地——福建省长汀中学院内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独坐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尔后走出中山公园，步向刑场。



周恩来扶送瞿秋白遗骨入墓穴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瞿秋白遗骨由福建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6月18日上午9时，中央举行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由周恩来主祭，并亲自扶送瞿秋白骨灰盒放入墓穴。

讲到 I 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 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已经过去，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

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

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宣[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到[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现]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①，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①《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副标题为《四十年》；《鲁定》，今译《罗亭》；《安娜·卡里宁娜》今译《安娜·卡列尼娜》。

记忆中的日期

——附录^①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生于常州

一九〇二

入私塾

一九〇五

入常州冠英小学

一九〇八冬

初等小学毕业

一九〇九春

入常州中学

一九一五夏

因贫辍学

一九一六二月

母亲死

二月

赴无锡南郊某小学任校长

是年父亲赴济南，弟妹分散

八月

辞无锡教职返常州

十二月

抵汉口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

一九一七四月

在北京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

九月

入俄文专修馆

一九一九一月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

《新社会》杂志

五月

任俄专学生会代表

^①“附录”的“记忆中的日期”有不准确之处，这里不一一注明。《逸经》本没有刊登这个“附录”。

一九二〇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启程赴俄
	任通信员
一九二一一月	抵莫斯科
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九月	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
一九二三一月底	返国抵北平
七月	参加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九月	返沪任上海大学教职
	是年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一月	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	剑虹死，赴粤
十一月七日	与杨之华结婚于沪
一九二五一月	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
	被举为中委
一九二七二月	写批评彭述之的小册子
三月	赴武汉
四月	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仍任中委
七月	（宣言退出国民党）赴庐山
八月七日	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后
	实际主持政治局
一九二八四月三十日	离沪出国
六月	参加共产党六次大会
	任中委，留莫斯科为中共代表
一九三〇六月	撤销驻莫代表职

七月	启程返国，仍在政治局工作
九月	参加共产党三中全会
一九三一一月七日	参加共产党四中全会
	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之职请病假
一九三二秋	病危几死
一九三四二月五日	抵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
一九三五二月十一日	离瑞金
二月二十三	抵福建汀州之水口被钟绍葵团俘
二十六	入上杭县监
五月九日	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

乱

弹

乱 弹（代序）^①

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②，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③。可是，要说咱们末世还记得“流风余韵”的，那还是说得近些罢。三代的“韶乐”^④，现在即使没有失传，至多也不过给吃租阶级的大魔王做做“配享”^⑤，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⑥大出丧的时候，曾经用过“韶乐”；至于小市民，那是轮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昆曲”，却跑到了上海的无线电里^⑦。这一个中国的“国粹”居然也发扬而光大起来了。不但第一名市民，就是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偶然的欣赏欣赏。

“市民”（citizen）是所谓自由的公民，这是和“奴隶”对待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署名笑峰。以下《世纪末的悲哀》、《吉诃德的时代》、《一种云》、《菲洲鬼话》、《苦力的翻译》各文与本篇同时发表，合为一组，总题作《笑峰乱弹》，以本篇作为代序。

② “乾嘉之世”，指清乾隆（1736—1795）至嘉庆（1796—1820）的八十余年。

③ “唐虞三代”，指古代传说中唐尧、虞舜和夏、商、周等朝代。

④ “韶乐”相传是虞舜时代的乐曲名。

⑤ “配享”，亦作配飨。即祔祭（附祭）。祭祀时的附带对象。

⑥ 哈同（S.A.Hardoon，1847—1931），犹太人。一八七四年来上海，供职于英商沙逊洋行，兼营鸦片、皮毛及外汇投机买卖。后又自设哈同洋行，倚仗帝国主义势力经营房地产和放高利贷成巨富。

⑦ 一九二三年左右，上海某些“绅商”（当时商界和流氓社会中的“名流”或“闻人”）曾发起振兴昆曲，接办苏州的“昆曲传艺所”，训练演员，进行演出，昆曲乃盛行一时，无线电中时有播出。

名称。中国现在，只有所谓“绅商”才配叫做市民。但是，绅商和绅士已经不同了。商与士一字之差，在时间上至少隔了一世纪。而昆曲却不是绅商的艺术，而正是绅士等级的艺术。这老老实实是中国旧式绅士等级的艺术，而不仅是地主阶级的艺术。固然，乾嘉之世的绅士之中已经搀杂了些盐商“狙侏”^①，——郑板桥^②之类的名士所瞧不起的；然而，他们始终也是盐官儿，至少也是类似于官的“准官儿”，他们也总要弄些身份，——例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见官可以用大红名片的身份。总之，一定要加入那个绅士等级。当时，绅士等级的艺术，什么诗古文词，什么昆曲，都是和平民等级的艺术截然的分开的。昆曲原本是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元曲几乎都是“下流的俗话”。可是，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就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馇钉”^③进去！这还是戏台上的歌剧吗？对不起，先要问一问：这所谓戏台是个什么样的戏台？这已经绝对不是草台班的戏台！昆曲已经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听罢！昆曲的声调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其实，那样的猥琐，那样的低微，真象〔像〕它的主人的身份。昆曲的唱工是要拗转了嗓子，分辨着声母介母韵母，咬准那平上去入，甚至于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中国的四方块之谜画似的汉字，在这里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束缚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弄得简直不象〔像〕活人嗓子里唱出来的东西。这的确确是所谓“红氍毹上”的歌曲。在绅士的第宅——“状元及第”之第——里面有这三开间或者五开间

① 狙侏，指经纪人，掮客。

② 郑板桥（1693—1765），即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

③ “馇钉”，原指堆叠的食品，后用来比喻文字的罗列堆砌。

的花厅，一头铺上两丈开阔的红地毯，这就算戏台了。“戏台”前面三四步路的光景，就是听戏的大人老爷的座位，再后去十几步，二十步光景，是太太小姐“垂帘听曲”的地方。自然，这里可以听得清平上去入。而且唱昆曲的戏子，在当时还有许多和幕友一样，豢养在绅士的第宅或者衙门里面。他们本来和“倡优所畜^①”的文人清客是差不多的东西，同样是“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的。这种昆曲，当然不是给公馆衙门之外的平民小百姓听的。现在，“治于人的小人”，要想在无线电的播音里去听清楚昆曲的平上去入，自然是牛听弹琴，一窍不通了。

“乾嘉以降”不久，昆曲的清[轻]歌曼舞的绮梦，给红巾长毛的^②“叛贼”捣乱了，给他们的喧天动地的鞞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③之间，夹着这么一段“可怕可恨”的回忆。不知怎么一来，在同光之世，我们就渐渐，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远了，一直到差不多听不见。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这本来是草台班上的东西。高高的戏台搭在旷场上，四周围是没遮拦的，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也配得上“乱弹”的别名。满腿牛屎满背汗的奴隶们，仰着头张着嘴的看着台上。歌词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为禁不起那唱戏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临了：不押韵的也押韵了，平仄不调的也就调了！这是，这曾经是别一个等级的艺术。

① “倡优所畜”，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② 红巾，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成的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称红巾军；长毛，清代道光年间，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为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律令，恢复汉族蓄发的习俗，被清统治者辱称为“长毛”。二者在这里泛指农民起义军。

③ 同光之世，指清同治（1862—1875）、光绪（1875—1908）的四十余年间。

当然是平民等级的了。

然而，统治阶级不但利用这种原始的艺术，来施行奴隶教育；他们还要采取这些平民艺术的自由的形式，去挽救自己艺术的没落。于是乎请乱弹登大雅之堂。可惜，没有出息的绅士，始终是没有出息的；俗不可耐的商人市侩，始终是俗不可耐的。因此，乱弹就在绅士等级蜕化出来的绅商阶级的手里，重新走上所谓“雅化”的道路。樊樊山制军，^①袁寒云世子，王晓籁先生，某某老板等等，都来“爱美”^②一下，说句直译的俗话，就是客串一下，串得个珠圆玉润满纸琳琅。不但如此，连唱皮簧的戏子，尤其是以“做女人为职业”的男戏子，都一个个“绅商化”起来，做了院长副院长的大官，例如梅兰芳^③老板，现在居然是美国文学博士梅兰芳梅大人了。

这样，皮簧的乱弹又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了绅商阶级的艺术。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中国的商人必须变成绅士，正因为中国绅士保存着绅士的身份而来做商人了。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一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

① 樊樊山制军，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进士，曾任陕西、江宁布政使。辛亥革命时，两江总督张人骏弃职逃跑，樊曾短期护印，故有“制军”之称。后住在北京当遗老，写诗捧戏子。下文的袁寒云（1890—1931），名克文，袁世凯次子，喜唱昆曲。王晓籁，浙江嵊县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帮会头目之一，曾在堂会中串演《草桥关》等戏。

② “爱美”，英语 amateur 的音译，意为非职业的、业余的。

③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〇年赴美国演出时，获波摩那学院及南加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然而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

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谈。

史铁儿 一九三一，九，七。

世纪末的悲哀

时代也是有主人的。对于有些人这是世纪末；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也许是世纪初——黄金时代的开始呢。然而，黄金时代虽然不远，却不是这么容易达到的。这要经过血污池，奈河桥，刀山，油锅，以及……一切种种这类的东西。这条路上——到黄金时代的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兴奋，是快乐，是痛快？这都是又当别论，不在乱谈之列。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确实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

世纪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见着这么几点儿血渍，他就战栗着，痉挛着……吓得个半死不活。呵！神经衰弱的时代呵！但是，神经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为得病的病根来得特别，他们会一跳起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变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绝后的勇敢。怕血症会变成渴血症。天在旋转着，地在震荡着，洪水泛滥着，火山爆裂着，牛马怒吼着……这是什么？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驾驭这个世界的上帝，就雇用[佣]那些神经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绝后的人，来支持这个世界。也许正因为受着上帝的雇用[佣]，所以变得这么勇敢。他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他们实在口渴得很，他们专门要吃奴隶牛马的血，他们想把黄河扬子江似的血都喝干净。他们正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统，要叫出民族的精魂，来救命，来……叫着的是：“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嗜杀人者能一之！”^①这样的叫喊，真

^① 这是反用《孟子》中的话，以讽刺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原话见《孟子·梁惠王》：“‘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象〔像〕黑夜里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响，越是因为他们的胆怯，这是自欺欺人的叫喊，不过想要掩饰自己的害怕，盖住内心的悲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悲哀得发狂了。

同时，世纪末的人们之中，有些却很忠实于自己的怕血症。他们象〔像〕兔子一样的“聪明”：把自己的头和美丽的血红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脚爪底下，就自以为别人看不见它了，因为它看不见别人了。他们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象牙塔和水晶宫还不是一样的建筑在血肉模糊的骷髅场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宫的里面，始终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这里有肉感，有爱神，有……这里是多么清闲，又多么孤寂，这里多么潇洒，又多么怅惘！即使不幸谪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宫，也还会吹箫吴市^①，做个风雅乞丐。一样可以有牢骚，有落拓……等等的诗境和灵感。所有这些上帝御选的人们，总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词，哼哼唧唧。这是些什么神秘的咒语，还是白天说梦话？不是的。这是仙人传授的口诀，念着可以解救世界末日的劫数。如果奴隶牛马也会这样高尚，也会学着哼哼唧唧，那么，天下的一切怨气都可以宣泄净尽，再也不会有什么天崩地陷的灾祸。是的，这并不是无病的呻吟。病就在于世纪末，病就在于世纪末的悲哀，那是衷心不可救药的无穷无尽的悲哀。这也是悲哀得发狂了。

发狂的病是有好些种，上面讲的，就是武痴和文痴的分别。如果豺狼猫狗的万牲园^②看厌了的话，那么，不妨看看这文痴武痴的疯人院，倒也怪有趣的。

九，十。

① 吹箫吴市，春秋时伍员（子胥）自楚逃至吴国后曾在吴市吹箫乞食。

② 万牲园，旧称三贝子花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前身。

画 狗 罢^①

张天翼^②的《鬼土日记》，替我们画了一顿鬼神世界。天翼的小说，例如《二十一个》之类，的确有他自己的作风，他能够在短篇的创作里面，很紧张的表现人生，能够抓住斗争的焦点。他的言语，也的确是“人话”，很少文言的搀杂。不过魄力是比较的不大。如果他尽力于活的现实的反映，那么，一定能够胜任愉快的发展他的才力。可是，最近出版的《鬼土日记》却有点使我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苛求责备”的心。

第一讲到题材方面，这是鬼神世界。问题不仅仅在于“鬼神”，而主要的还在于“世界”。你想：你的题材是六分之五的地球，这未免太大了罢？六分之五的世界，是小说所不能够写的。结果，只能够把世界缩小，放在科学试验室里去。而科学试验室里，陈列着小飞机，小潜艇，小电车……外加活鬼若干，是终究不真切的，免不了所谓“图式化”(schema)的。这种题材，它本身是很不适宜于文艺的表现。六分之五的世界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公律和历史过程，可是，这里的现实生活是复杂到万分，发展上是有许多方面的不平衡的。这些共同规律的意义，正在于适应着最繁杂最变动的现象，而能够给我们一个了解社会现象的线索。如果把这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那么，自然要走到庸俗的简单化方面去。

① 本篇及下篇《哑巴文学》最初同时发表于《北斗》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一年九月），署名均作董龙。

② 张天翼，一九〇六年生，号一之，学名元定，湖南湘乡县人。作家。《鬼土日记》，中篇小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正午书局出版；《二十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文学生活》第一卷第一期。

作者的《鬼土日记》恰好走上了这条路。自然，当做社会科学的参考材料看，这未始不是一本“发松的”好书。而当做文艺创作来看，那就不能够不说是失败的了。

第二，这篇小说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是“鬼话连篇”的。这并没有什么。这是无可奈何的鬼话！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做人。但是，这里可暴露了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作者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太大了。“鬼土”里面没有一个真鬼。幻想的可能没有任何范围。这固然是偷巧的办法，然而也是常常容易吃力不讨好的。古话说得好：“画鬼容易画狗难”。如果是画狗，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象〔像〕不象〔像〕。现在画的是鬼，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其实，鬼并不是不可以画的，大家不要以为鬼没有作用。法国人有句俗话，叫：“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抓住了活人”。中国的情形，现在特别来得凑巧——简直是完全应了这句话。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孔夫子的鬼，他还梦想统治全世界。礼拜六^①的鬼统治着真正国货的文艺界。……这样说下去，简直说不尽。我们要画鬼，为什么不画这些鬼呢？

说到画狗，那是更好了。说广泛些：与其画鬼神世界，不如画禽兽世界。本来，中国自然也在六分之五的地球之内。而中国有的只是走狗和牛马。可是《鬼土日记》里面只见人的鬼，而没有见狗的鬼；没有见牛马的鬼；即使有牛马的鬼，也只是影子。

所以我说：还是画狗罢！

九，十。

① 礼拜六，指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因《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创刊）得名。

哑巴文学

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只有在中国，“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十二年，而这些“国语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读的。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但是，这过渡过到什么时候才了？

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古文的腔调完全和言语脱离。象形字是野蛮人的把戏。他们总算从结绳而治的程度进了一步，会画画了。结绳时期的每个结，固然不发生读音的问题，野蛮人看着每一个结，只有他们自己“肚里有数”：懂得这是记的什么事。而象形文字的初期，其实也是这种情形。每一个字的形体有作用，而读音却仍旧只有附带的作用。看着字形可以懂得，至于读着懂不懂，那就不管的了。中国古文的读法，因此只是读的人自己懂得的念咒，而中国文字的形体（象形，半象形，猜谜子的会意，夹二缠的假借）也简直等于画符。两千多年中国绅士的画符念咒，保持象形文字，垄断着智识，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的绝妙工具。

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面。这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看不可读的。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见〔现〕的唐五代俗

^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语出《论语·泰伯》。

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纪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是章回小说的祖宗。而现在的新式小说，据说是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这些作品的祖宗显然是古文而不是“平话”。这样是不能够创造出文学的言语的。自然，用这种文字，也可以做出内容很好的作品来。可是诗古文词里面，未始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只能给看得懂的人消遣消遣。只看不听，只看不读——所能够造出来的：不是文学的言语，而是哑巴的言语；这种文学也只是哑巴的文学。

其实，新式白话能不能够成为一种听得懂的言语呢？这绝对是可能的。科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演讲里面，一样用着“新名词”，一样用着新的句法。因此，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此外……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固然那是很肮脏的。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

八，十五。

一 种 云

天总是皱着眉头。太阳光如果还射到地面上，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至于月亮，那更不必说，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的人间，这是孤儿寡妇的眼光，眼睛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完的眼泪。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①的山岳，至少有大截是上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据说是中国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对于他们的亲生骨肉，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这样一年年的过去，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更番的来去，一点儿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漫漫长夜，已经二十年了。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那云为什么这样屡次三番的摧残光明？那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飚吹过来的。还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榨床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那些会画符的人——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就用这些符箓在呼召。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可是活着总要吃住这么二三百亩田地，——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喷着。狂飚风暴吹过来的，血肉蒸发出来的，符箓呼召来的，屁股吐出来的，烟囱喷出来的，都是这种云。这是战云。

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

① 封禅大典，古代帝王到泰山、梁父山祭祀天地的仪式。

什么时候才黎明呢？

看那刚刚发现的虹。祈祷是没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那虹发现的地方，已经有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那才拨得满天的愁云惨雾。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电闪娘娘才办得到。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

九，三。

非洲鬼话^①

军营的篷帐支在沙漠里的荒原上。“这里……现在虽然是荒原，不久就要有万道长虹的电炬，光怪陆离的玻璃窗，庄严灿烂的图书馆，……一切，一切足以代表欧洲白种人的文化，只要能够征服这些蠢如鹿豕，一点儿‘国家民族观念’都没有的非洲土人。”火一般的太阳回家去了，沙漠里吹来的热风还在波动着蒸闷的空气，飞虫嗡嗡的……那军营里的白人伸开了四肢，听那替他打扇的黑奴讲非洲的神话。

不对，非洲那里会有什么神话！我们的光荣的希腊才会有神话。非洲只会有鬼话。好，就听鬼话罢。

“这样，非洲是罪孽深重的，上帝震怒了。这是在许多年以前，数不清的年数，也许是一万年，也许是一百万年。当初，上帝是很仁慈的，象〔像〕中国孔夫子那样仁慈。上帝赏赐给非洲人许许多多牛马驴骡猪羊猫狗，大概总在三万万只以上罢。非洲人是很富的。牛马驴骡替我们耕田，拉车，推磨，车水……替我们做种种工作；猪羊给我们吃；猫给我们玩，它是多么诗人样的温柔呵；狗给我们看家，它是多么凶狠和忠实呵。狗本来是最象〔像〕我们人的，我们人对于上帝也是这样忠实，而对于牛马也是这样凶狠的。生活是多么好。这样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

① 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的“民族主义文学”刊物《前锋月刊》上，发表了黄震遐描写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间小说《陇海线上》。文中将蒋军（“中央军”）比作法国“客军”，将中国比为“非洲”。本篇及下篇《狗样的英雄》均为批判这种由国民党反动文人策划的“民族主义文学”而作。

“到了那一年，忽然，忽然出了怪事。我们非洲人也听说过中国的《封神榜》^①，那里的青毛狮子五色神牛等等，是会变成人的。我们非洲的怪事也就是这么样的：那些牛马……一批一批的，总之，除出最温柔的猫和最忠实的狗之外，这许多畜生都不甘心做奴才了，都不甘心做坐骑了，都不甘心做刀砧板上的肉了，他们一批一批的变成人，直立起来。啊呀，这还了得，天昏地暗了！于是乎我们人就想尽方法去打平这些畜生的犯上作乱。于是乎我们的祭师，就一只手捧着符篆，那是上帝的儿子写的，一只手仗着宝剑，那是上帝御赐的，去平定大乱。要是有中国《封神榜》上的神仙的神通就好了，他们祭起某某法宝，立刻就可以叫畜生现出原形，跨上它的背，骑着就走，还可以揪住它的领毛，左一个耳刮子，右一个巴掌，问它甘心不甘心做奴才。那是多么痛快！

“但是，我们非洲人不中用，辜负了上帝的恩典。还得上帝给我们帮助，派了天兵天将，把要隘守住了。基督教的上帝多么仁爱呵，阿门！我们得着了上帝赏赐的种种法宝。我们出力的去杀。上帝的法宝是很厉害的：——那“万火筒”轰的一声就轰死几十几百只畜生。那‘火鹰’在畜生头上盘旋着，吐出几粒仙丹，立刻开花出来，就炸死几百几千。这叫做放天火。这是最神妙的法宝。有一只火鹰，是用三十万个七两二钱银子炼出来的，其余的成本虽然轻些，也都是用新旧金山的金银和大西洋的仙水炼出来的。至于地上的“连珠火龙”，那也够厉害，“搭搭搭搭 [嗒嗒嗒嗒]”的吐出血红的舌头，这么一扫就可以‘舌尖儿横扫五千人’，叫那些畜生变了人仍旧是个死。总之，一切上帝的法宝，都是杀畜生的。

“不过，最可恶的是：第一，这些畜生死不完，每天打死杀死烧

①《封神榜》，即《封神演义》，神话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

死炸死五六千人，有时一两万，据说当时这样一次杀了整整十个月，结算起来，起码就要杀掉一两百万，何况这样屠杀不止一两次；然而，这些畜生仍旧在捣乱，仍旧一批一批的变成人。第二，这些畜生变的人至多只是打死，很少重新打成畜生，再乖乖的做工的；固然也有，但是实在太少了。我们恨不得跑到《封神榜》时代的中国去，问问那些神仙：究竟他们是个什么神通，能够打得那样痛快。问上帝，上帝也说没有办法。

“因此，上帝又大放洪水。我们因为上帝来不及，自己也一天开三坝，大放尼罗河的水。这样去淹死他们。不过并不一定要他们死，主要的是要他们变成鱼鳖。牛马等等是热血动物，会变人；鱼鳖是冷血动物，也许不会变人了。可是，仍旧没有用。这是多么可怕的恐怖世界呵！这些杀不完淹不死打不服的畜生！

“于是乎上帝震怒了。上帝说：你们这些人太不中用了，这样，岂不要连累我连上帝也做不成吗？我要自己动手了！这些畜生的背后一定有恐怖的妖魔势力，给我搜集证据，我来和这妖魔算账！但是，上帝也不能够拿那妖魔怎么样。呵，呵！

“从此之后……结果，上帝也气疯了。非洲人的消灭，剩下的是那些牛马等等变成的人，一直到现在。只有狗没有变，听说被‘牛马人’杀尽了。只有猫没有变，据说逃到月球上去唱诗了。

“如果还有猫狗没有杀完逃完，那就托福托福，托疯上帝的福，在疯上帝仅仅保留的领土上，替上帝打扇，讲神话了。该打该打，不是讲神话，是讲鬼话。”

白人微笑着，他的手摸摸自己的心：心还跳着么，我难道真的疯了吗，难道我亲手造出来的非洲高等人民族，竟也保护不了吗？

九，九。

狗样的英雄^①

中国的绅商，中国“孔孙道统”的忠实信徒^②，不是说和平是中国的民族性么？！然而社会斗争太剧烈了，短兵相接的阵势太紧张了。这种和平主义的假面具是不能够不揭穿的了。因此，战争变成了民族性。看是什么样的战争？

现在，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也就是抢夺民众膏血的剧烈斗争。现在，中国的红白战争一天天的剧烈，所谓剿匪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而剿杀世界的匪头——尤其是中国绅商的太上皇的意旨。这就更需要杀人放火，更需要战争。“凡是必需的，都是合理的”，这是哲学家的话头。文学家就要说：“凡是必需的，都是神圣的。”这样的神圣战争就要有狗样的英雄。

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读者先生听见我这句话，也许会怀疑：“怎么！杀人放火是共匪呀！怎么又是……？”哼！绅商所要杀的并不是“人”，而是奴隶、牛马，并不是“中国民族”，而是别一个民族。请你放心好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导报》第三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署名史铁儿。原题作《屠夫文学》，编入《乱弹》时改为现题。

② “孔孙道统”的忠实信徒，指国民党政客戴传贤（戴季陶）。他在所著《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提出“道统”说：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的道统，向下传给孟子、韩愈……一直传到孙中山，再传便是他自己了。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车”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

——《前锋》^①第五期《陇海线上》

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colonisateur）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剌[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剌[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于是乎“人”和“野兽”这两种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请看民族主义文学家自己的描写：

一方面是所谓阿剌[拉]伯人，“这里老百姓们的脸上都罩着一层阴恶的表示，屡次杀气腾腾地偷望着我，他们这些人真可怜，什么都不晓得……老百姓对于屠杀焚烧奸淫掳拐的故事，都已经看得不要看，一望见穿上制服的人，就发生同仇敌愾之心，马上想动手收拾掉他。……他们对于国家没有丝毫的了解，尤其是看见了中央军也发生厌恶之心。”这是一个民族。

^①《前锋》即《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〇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别方面是所谓中央军，雇用着德国的凶哥儿（Junker）顾问，豢养着白俄的哥什哈（Cossack）。^①这样的七个人驻扎在村落里：“这自命为英雄的七个人就是（一）巴格罗夫（前两天吃醉酒跛了腿），（二）任林（拿一把无用的好刀，据他说可以威吓），（三）庄克明，（四）张维新，（五）罗敏（十七岁的孩子），（六）驾雀罗夫，（七）我自己。”这是另外一个民族，——中国的“黄埔少年”^②，保镖世家，俄国的哥什哈，德国的凶哥儿混合组成的一种民族——孙逸仙所谓国族。

这两个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了，说得清楚些，是国族的猎狗去巡逻“野兽”了：

七人的远征队全副武装的到四围的村落里去巡逻一周……走到一个很好的村落之前，我发了“散开”的口令，大家马上构成一条散兵线，向村落搜索进去。这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才狼狈不堪地回来。罗敏已经战死了。张维新的屁股上中了枪，我的帽子丢在一个坟场里。……失败本是意中之事，世界上又安有以七人的实力继续去搜索三个村落的豪举？况且这三个村落的老百姓又是久欲得我等而甘心的土匪呢。

读者先生不要奇怪：七个良民和三村土匪——这土匪似乎太多了！其实，土匪的匪字已经不是《康熙字典》上那样的解释。现在的匪字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总之，这是七个人的中华国族和三个村落的“土匪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只是民族主义的战争文学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插话。不过插话虽

① 凶哥儿，德文 Junker 的音译，现译容克，意为贵公子。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普鲁士的这种由纨绔子弟组成的贵族党，是个凶暴的发动集团，这里指蒋介石所聘用的德国军事顾问。哥什哈，今译哥萨克。

② “黄埔少年”，指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蒋介石军队的骨干。

然小，却把民族主义文学的原身完全显露了出来。

至于民族主义的战争文学的正面题材，却是《陇海线上》的“为民族而战的尚武精神”。军阀混战之中，两方面都要自己说是“为民族而战”。民族主义的文学，不过在那些四六电报宣言布告之外，替军阀添一种欧化文艺的宣传品，去歌颂这种中世纪式的战争，叫几声“亲爱的同志”，唱几句“咨尔多士，为民前锋”^①，哼几声：

可是，朋友们——

你可闻过号筒的雄音？

你可闻过战马的悲壮？

在朔风凛烈的天然里，

你可听见前进的步伐声？

呜呼，先驱者呵！先驱者的心^②！

一点不错！你们是绅商地主高利贷资产阶级的杀人的号筒，你们的声音是多么雄壮，多么壮烈！中世纪式的战争是多么浪漫谛克呵！你们这些号筒想号召民众来帮助军阀混战，但是，他们却“久欲得你们而甘心”。因此，你们不能不狼狈不堪的逃回去了。自然，民族主义的文学更加注重的是：鼓吹屠杀民众的剿匪战争了。首先出现的是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叫做什么《国门之战》^③。这里，假造一些谣言，描写民族主义者杀老婆的本领。那又是多么英雄气概。神话化了的岳飞也拉进了剿匪战争，大声叫喊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吃人肉喝人血的精神，的确值得帝国主义者称赞：“好狗子，勇敢得很！”请看：

①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歌中的两句歌词。

② 引自《陇海线上》的序诗。

③ 《国门之战》，万国安作，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前锋月刊》第六期。

大家围着这六个间谍，旅副瞪大了眼睛望着，旁边还有几个高而且大的兵，手里拿着巨斧，旅副停了半天说：——我看再找一把刺刀来切切他们看，……不大工夫，两个老兵抬着一把俄国的喂马切刀放在地下，旅副下令将他们眼睛上的蒙布拿下来，叫他们也认识认识我们中国的手段怎样。我一看那几个间谍：三个俄国人，三个不知国籍的人，嘴里塞满了东西，眼睛露出很凶的神气，似乎他们很欢迎死。旅副叫我先收拾一个，我那时吃了点高粱酒，并且看见了仇人是很喜欢杀掉他们，我用了一把大斧，抡起来照着绑在屋里左边那个长黑头发的人太阳穴上就是一下，差不多砍到鼻梁上了。那个人的头上着了这一斧，太阳穴立刻陷落下去，斧刃的周围都成了白色，我把斧子拿下来，紫黑的血跟着就飞射出来，那人临死的哀鸣也就很小而短促的一叫就完了。不大工夫，我们这几个屠夫弄得血肉狼藉，一股血腥的气味，要不叫吃酒也就呕出来了。

不错，残杀俘虏，他们是会的。这里描写多么“动人”！杀的艺术实在高明。他们还会什么？还会涨着通红的脸，嘴里冒着白沫，慷慨激昂的口中念念有词道：“你们不要懦怯，不要顾惜！……你们打倒了赤俄，你们到了莫斯科，前进！……前进！”

记得“五四”前一年鲁迅有一篇《狂人日记》发表。那狂人为什么发狂？只不过为着中国的礼教吃人。足见得那时候的人神经多么衰弱，为这点“小事”就气得发狂了。现在呢？现在吃人的不止是礼教，而老实不客气是真把人肉放在刀砧板上细细的剁，还要唱着新诗，歌颂一番这样英雄的事迹。可是，现在的“狂人”，他们也不是当年那么狂法了，他们不但“在脸上杀气腾腾的表示了”，而且……读者先生，请你等着新的《狂人日记》罢。

三二，八，二〇。

猫样的诗人^①

诗人！吓！诗人，还了得！

据说现在中国的文坛是太撒野了。有一些诗人在报纸上大登其广告，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还说，他们要出一种有声有色的《声色》^②杂志，来做勒住这野马的缰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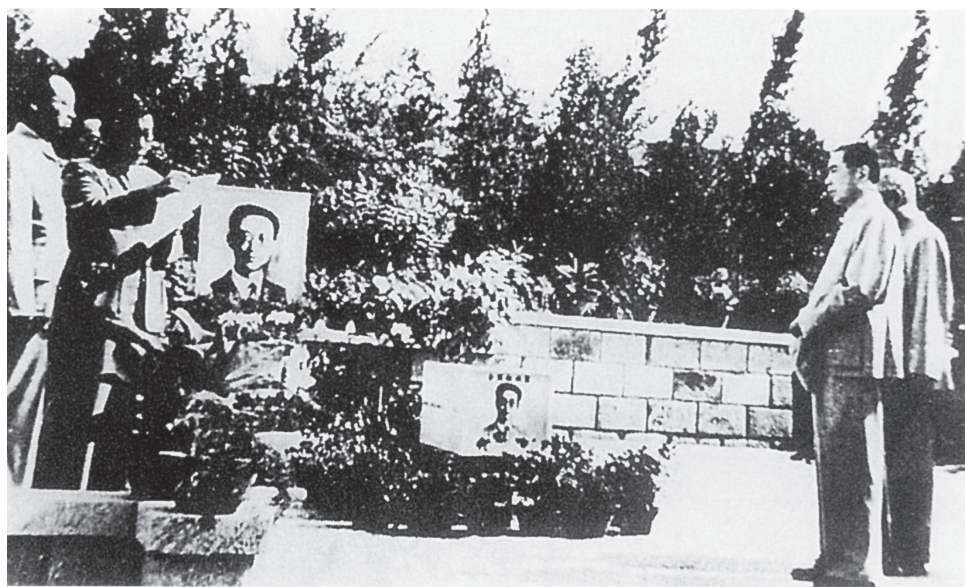
我们并非诗人，不懂得为什么中国文坛上是撒野的野马。也许，那些“该杀的”就因为撒野的缘故所以被杀了的罢？剩下来的撒野的野种，在等着杀的时光，还应当嘴上套起勒口，扣上缰绳。好吧，我们且看一看这有声有色的《声色》。

原来这声是歌声，这色是色情。这是另外一种的缰绳，并非牵着战马去上战场的那一条。因为马和美人固然同样是英雄的配角，不过美人在英雄的怀里，马却是英雄的坐骑，它的死所是战场，不是红绡帐里。英雄要为民族而战，要沥血沙场，固然要用牵马的缰绳。但是，丰功伟烈的报酬，还要有美人，有声色，有这另外一种的缰绳，把一切野马羁縻住了，让咱们的英雄享清福。温文尔雅不撒野的猫，唯美主义的《声色》就是这另外一种的缰绳了。

《声色》上有什么？最大的就是一只猫。这猫大得可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署名 V. T.。原题作《猫样的温文》，编入《乱弹》时改为现题。

② 《声色》，即《声色画报》，综合性月刊。项美丽、邵洵美编。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创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现仅见三期。



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作瞿秋白生平的报告。



北京八宝山瞿秋白同志之墓



《瞿秋白文集》(14 卷本)、《瞿秋白选集》、《瞿秋白论文集》

1980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出版《瞿秋白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编 6 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理论编 8 卷，共 547.7 万字。在瞿秋白诞辰 100 周年之际，14 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出版完成。



《论中国文学革命》

瞿秋白《论中国文学革命》一书，冯乃超编，香港海洋书局 1947 年 7 月出版。

習秋田錦文書自序

革命的理想不能和革命的实际相离……

[illegible][illegible]

如不中則即轉他職，則以爲非於全機關求來的意見，而是各人意見，這是不妥當的。智識階級，政治界，機關中，才識淺薄，無一學術的修養，而意見代表者，更應先自修養，並要有長遠的考慮，如和時局，社會，學術的意見代表者，應有學術的修養，才識內涵。以當時而言，學術知識，是中國發展前途最重要的情形，知識是這時代最寶貴的財富，但二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已陷於窮困，一且要生活，則不得不爲之計，如二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已陷於窮困，一且要生活，則不得不爲之計，如二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已陷於窮困，一且要生活，則不得不爲之計。

一种云

太阳是给看顾的。太阳先如王位似的，他面上，那也经得起的流汗的，至於一点，那是不必说，他只记得他露出半面用他那惊讶的眼光看一有这罪孽的人，这是那无希望的眼光，眼睛裡含着继续正没有流定的眼泪。经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战士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一横便是中国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害了心，那对它们的亲生骨肉却提出一份难堪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过了一年又过去，淫雨的雨后的风和表祖的宿害更毒的来着，一旦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日子，黑夜已经二十年了。这却是一种实在作祟，那害为什么这种时候王座的辉煌光明？那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和大风浪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飙吹过来的还有那那模糊血肉一样的底下滴着的那模糊的血肉蒸出来的。那完全无价的人一会富得描会富得要的人，就用这中符咒在呼号，那些吃田地的土地蛛，一眨眼见了这王座品要穴土地蛛他的虎牌，可是活著就要吃他怎么三不两刀地，一眨眼土地蛛就

《一种云》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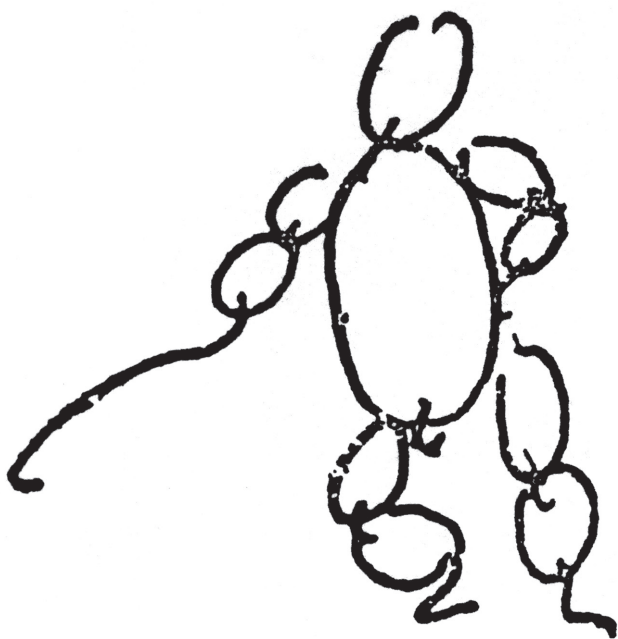
1931年9月3日，瞿秋白撰《一种云》，发表于同年10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1卷第2期上，署名笑峰。该文用象征的手法，勾画出黑暗的旧中国，预示中国人民革命必将胜利。

瞿秋白所用特制书桌

瞿秋白到苏区后留在鲁迅家的一张特制书桌。人离开书桌时可将盖篷拉下锁住，适宜从事秘密工作使用。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将其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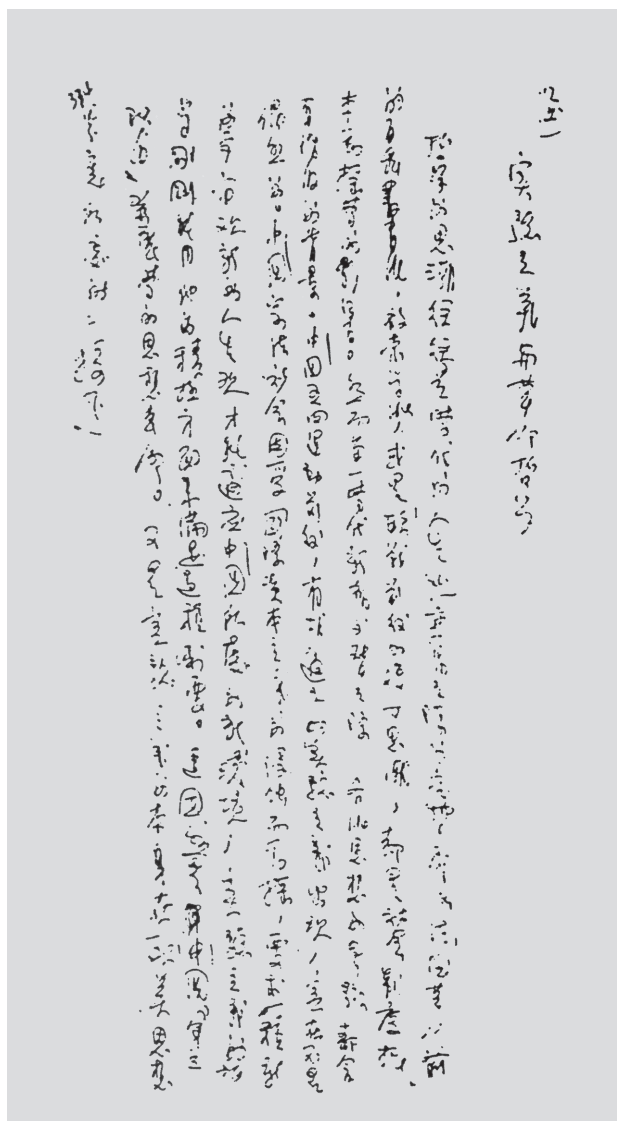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瞿秋白手绘阿Q漫画像

瞿秋白手绘阿Q漫画像

这幅由10个阿Q的“Q”巧妙构成的漫画像，题有阿Q唱过的戏文：“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是瞿秋白1933年2月间在鲁迅家避难时的游戏之作。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瞿秋白撰《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发表于《新青年》1924年8月1日第3期。这是瞿秋白批判实用主义的著名论文。图为该文手稿。

她蹲在她的后腿上，两只前腿静穆的站着，象古希腊庙楹前的石柱。

——《声色》创刊号第十五页，徐志摩：《一个诗人》。

咱们的大诗人化身为小小的虱子，在这雌猫的四腿两股之间欣赏着，出神的看着。他们是在鉴赏那希腊石柱的雕刻艺术吗？也不完如此。鉴赏的是有许多，这是：

你的乳，我的痛嚼的胭脂，我的乱吞的铅粉，我的狂饮的香水……

还有——

人的说不出的什么心事也会被引起两片蚌肉一般……

张开你的皓臂和银腿，让你的浑圆，肥满，丰润，柔嫩，奢华的壮健，猥褻的洁白，淫欲的伶俐，来喂饲我因饥饿那不知道的事物，因相思那无名的事物，而憔悴得快要垂萎的灵魂。

——同上，第二十三页。

还有——

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颤抖的勇敢。

——同上，第三页。

好了，够了！

猫——不撒野的温文尔雅的猫，捉老鼠是很凶狠的猫，见着主人

很驯服的猫。据说，这样的猫“是一个诗人，纯粹的诗人。”

——同上，第十五页

凶狠的吃老鼠的猫，“叫春”时候的音调，倒也的确很浪的。但是，老实说句撒野的话：它是一个清客，它的主人是“吃租阶级”（rentiers）。“文学青年们”，假如你们有租可吃的话，不管是田租，房租，还是地皮租……只要有得吃的话，那么，你们抚摸这只温文尔雅不撒野的猫罢。

八，十八。^①

① 这里的八月，或为九月之误。

吉诃德的时代

据说中国识字的人很少。然而咱们没有统计过，如果说中国的识字人只有一万，或者两万，大概你总要摇头罢？可是，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其余的“读者社会”在读些什么？如果这一两万人的小团体——在这四万万的人海之中，还把其余的人当人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说中国还在吉诃德的时代。“中国”！——我是说那极大的大多数人的中国，与欧化的“文学青年”无关。

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西洋武士道的文学。中国的中世纪，也就充满着国术的武侠小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西班牙中世纪末的西万谛斯^①写了一部《董吉诃德传》，把西洋武士道笑尽了。中国的西万谛斯难道还在摇篮里？！或者没有进娘胎？！

不错，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但是，恐怕就一部罢。模仿《水浒》的可以有一万部，然而模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草泽的英雄，结果即使不是做皇帝，至多也不过劫富济贫罢了。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观音菩萨。我们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种“过屠门而大嚼”的人！——这个年头，这个世界，不但贪官污吏豪强绅商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怨

^① 西万谛斯 (M.de.Cervantes, 1547—1616)，现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小说《董吉诃德传》今译《堂吉诃德》。

恨的对象又新添了贪工头，污那摩温^①，大小买办，×国新贵。——恨得真正切齿，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那里抖动，你可以看见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是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然而，既然这样恨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贪什么，污什么的，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干？他们吗？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的，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象[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后事如何”？那么“请听来生分解”罢。

至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嵋山五台山去学道修仙练剑，——这样的事，最近一年来单是报纸上登出来的，就有六七次，——这已经算是有志气的好汉，总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你不用问，请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

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的中国里面，那中国的西万谛斯……还是在摇篮里呢，还是没有进娘胎？！不是的，这些西万谛斯根本就不把几万万“欧化之外的读者”当人看待。你或者说：这几万万人差不多都不读书。那么，我反问你一句：你看不看见小茶馆里有人在听书？

九，八。

① 那摩温，英语 number one 的音译，这里意指工头。

苦力的翻译

外国鬼子却象[像]发疯一般，还要大家（苦力）加快赶路。他对西崽说：“我给他们每人每天二两银子。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西崽答了一声：“是。”他把外国人怎样发恼，势力怎样的大，脾气怎样的坏，和轿夫们说了一遍，而且说外国人说的，他的女人要是死了，到下一站，就要到衙门里去告状呢。

——《小说月报》第二二卷八月号，
波兰谢洛随斯基著的《中国的苦力》^①。

这些轿夫苦力的确请到了一个“好”翻译。虽然这个翻译是西崽，他却译得很顺。虽然这个翻译译得很错，可是他译得很顺。^②

这样的翻译是会翻身的。中国的上海现在可以看见很多的精致的洋房，里面住着的人固然大半是外国鬼子，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之中，有些便是这样的翻译连身都翻过来了的。自然不止在上海。可是尤其是上海的耀武扬威大出殡，大做寿，大造祠堂，大大的做旅沪几十年纪念的那些高等华人，的确曾经当过这样的翻译，同时，拣着了外国鬼子遗失的钱包，却会很信实的恭候洋大人领取的。因此，这种翻译的确是“未可厚非”。不过，苦力实在不需要他！

① 谢洛随斯基(W. Sieroszewski, 1858—1945), 现译谢罗谢夫斯基, 波兰作家。曾参加一九〇五年波兰革命。《中国的苦力》, 许念曾、徐位译。

② 赵景深(1902—1985), 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曾在所作《论翻译》一文中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 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

同时，如果另外一个翻译把这句话译做：“在我的女人不致死在中途，尤其更好些地，能使她赶到就医的前站而能痊愈的条件之下，我将给轿夫们以各个人每天二两银子计算的赁银。我甚至将给如此之多，如彼之多他们将要求的。”这样的翻译错是不错，但是不顺。苦力也不需要他。因为他的“中国话”不是中国活人嘴里讲的话，不是活人耳朵里听得懂的话。

难道翻译不能够又顺又不错吗？不会说活人的话，这自然是可能的。难道顺就一定要错一点吗？这可只有高等华人知道了，恕不代答。

九，三。

水陆道场^①

民族的灵魂

黄昏之后。新月^②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③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魑魑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红字：“×国府”^④。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署名司马今。编入《乱弹》时作者曾作较多的删改。

② 新月，这里借指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文学、政治团体“新月派”。

③ 狮子，借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他们曾出版《醒狮杂志》，被称为“醒狮派”或“狮子派”。

④ “×国府”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简称宁），因以《红楼梦》中的“宁国府”隐指国民党政府。

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了病，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何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要“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鬻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个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猻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岳飞，诸葛亮，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等^①……这些千奇百怪的鬼，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

^①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代官僚。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任两江总督。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人，清代官僚。曾任湖南巡抚，甲午战争时请缨赴敌，兵败革职，后成为金石学家、文字学家。邓世昌（1855—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清代海军将领，甲午海战中阵亡。

先生的生魂马占山^①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有专职，
保国御侮责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那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好个“伟大的”岳武穆^②，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准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自己人”的岳武穆之流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岳武穆之流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岳武穆……，回来罢！”

“回来了！”

① 马占山（1855—1950），字秀芳，吉林怀德人。“九一八”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曾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二年二月投降日本，就任龙江省伪省长，同年四月反正。后在日军进攻下退出东北。

② 武穆，岳飞的谥号。牛皋（1047—1087），字伯远，汝州鲁山（今属河南）人。岳飞部将，后被暗害身死。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南宋高宗宰相，主张议和，诬杀抗金名将岳飞。

流氓尼德^①

欧洲资产阶级的老祖宗是海盗出身。那时候他们的所谓做生意，老实说，实在是很浪漫谛[罗曼蒂]克的：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那里，也就是抢到那里。东印度公司^②……鸦片战争等等已经是大规模的海盗队了。后来，他们一天天的肥胖起来，大家要搭绅士架子，于是乎有所谓市场道德。这也许是他们的福气。因为当时世界还没有瓜分完结，所以抢劫的地方，范围很大，在自己家里尽可以装着斯斯文文的样子，据说要每个人拿出“真本事”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十分露骨的霸占，撞骗，投机……是不行的。这所谓“真本事”，当然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本事，要拿出来的东西，老老实实在成本轻，价钱便宜，货色道地。跟着，政治上也有所谓立宪人权……国会制度。道

① [注]流氓尼德——是 Linmarité 的译音。欧洲 human 这个字根是“人”的意思，加上一个 ité 的字尾，变成 humanité——虞芒尼德，就是“人类，人道，人性”等等的意义。这个字尾表示一种抽象的集合的属性的，意义的确来得巧妙。依照这个办法，新仓颉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字眼“流氓尼德”，意思是流氓种，流氓性，流氓精神，流氓手段，流氓主义，流氓党，流氓学说，流氓制度，还是流氓路数——a type of human，都包括得了。

[疏]据国故学的说法却不是这样。郑康成的丫头曰：“流氓尼德”明明四字，并非一个字的。流氓尼德之尼，仲尼之尼也；德，德行之德也。是犹曰，氓虽流而有仲尼之德也。故流氓——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者也。——作者原注。

② 东印度公司，创办于一六〇〇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它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它长期垄断对印度的贸易，并操纵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管理权、民政机关的人事任命权和收税权）。在最后完成了对印度领土的占有后，于一八五八年撤销，将管理印度的权力直接转归英国政府。

地的国会制度——现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差不多已经完全消灭，——可是，在当初，这却是个“最高的理想”，这就是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照片：也是要拿出“真本事”来制造民意，取得所谓大多数的选举票的。现在，这自然已经是老古董，早就不时髦的了。

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地的时候，那就有点儿变种。大概是从海盗种变成了流氓种。请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根性就脱离不了封建式的地主绅士的混乱的血统关系，他们不能够当海盗，他们只能够当海盗的奴才。

中国这个地方，说起来也有点儿奇怪，固然自己也几次三番想当强盗，然而始终做了众人的奴才。这地方的市场上，还能够有什么“道地的自由竞争”吗？不能够。海盗把什么都霸占了去。市场是来得个狭小。于是乎中国的商人资本家，除出剥削剩余价值，榨取农民群众的汗血以外，还必须有点儿特殊的本事。这点儿特殊本事就是流氓精神。谁要是没有这种流氓精神，凭他剥削工农的“真本事”多么大，他在市场上还是要失败的。凡是现在“成家立业”，站得住的大资本家，差不多个个都有一套流氓手段。

流氓的精神差不多全部包含在赌博主义里面。做生意，以至于办实业的，首先要会赌。成千成万的空头生意，放大了胆做去罢。撞它一下，撞得好可以变成头等的绅商，撞不好，还是一个“马路巡阅使”^①的小瘪三。这叫做“睏得落，立得起”。其次就要会打。三刀六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所谓码头是打出来的。凭你货真价实，我管不了许多。其三是要会骗会吓，还要会抵赖。我们只要看看流氓在茶馆里“讲道理”的神气，就可以看见这种讹诈撞骗的本事。而这正是所

① “马路巡阅使”，北洋军阀官制，“巡阅使”是管辖一省以上地盘的军政长官，或用以安置并不占有一省的军阀，如“长江巡阅使”之类。这里是戏称无所事事，在马路上游荡的闲人。

谓生意经。其四是要会罚咒。自然，一面嘴里在罚咒，一面脚在底下写着“不”字。嘴里尽管罚着恶咒，一转身，立刻就干得出“天诛地灭男盗女娼”的事情。其五是要会十二万分的没有廉耻。流氓的小辫子要是给人家抓住了，他立刻会磕头下跪。人家说“你是昏蛋”，他一定答应“是，是！”——但是他也会摇着破蒲扇，翘起一个大拇指说：你看我是在提倡国货，多么爱国。……够了！区区并不是流氓，流氓主义的讲演集，还是让流氓党的领袖去出版罢。

读者先生只要稍为留心些中国最近几十年工商业界的具体现象，就可以知道这种流氓性的流氓路数的人物，的确是中国新文学的很别致的题材。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难道不是这样？最近两三个月以来各种各式的流氓把戏更是多得不得了。自然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三个月里的情形。这种流氓制度的政治，是有流氓学说做根据的。欧洲阶级的伪善的假道学的思想家，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至多还不过有客观的无意之中的虚伪和欺骗，他们主观上也许真有些唯心主义，他们讲“民约”^①，讲“自由博爱平等”，讲“主权属于人民”，他们甚至于还要把“人民”理想化，把这个字眼变成一种了不得的，神秘的象征。至于中国可不同，中国假使也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话，那他们可是老老实实的“唯物主义者”（注意——并非唯物论者）。他们的脸皮真是厚到十二万分，他们不客气的说：人民蠢如鹿豕笨如牛马，人民是阿斗——昏庸无用不知不觉的昏君，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精明强干大权独握的诸葛亮。他们这套戏法，不但是万分的无耻，而且是个太巧妙的骗术，他们说：“不错，主权是属于阿斗的，因为阿斗是皇帝，然而阿斗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昏庸无用，所以就把全权交给诸葛亮，由他

^① “民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著《社会契约论》或译《政治权利的原理》（1762），最初的中译本名为《民约论》。

去治理国家。”这个“权”属于人民，又交出去给党国，——这样一出一进，一套戏法就变完了。多么巧妙！如果阿斗不肯有“自知之明”，而要动手动脚的来干涉，甚至于自己来治理国家呢？那就是现成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套打的手段拿出来！这一副全套的流氓学说，就是流氓制度的政治的根据。你不信？——有书为证！^①

根据这种整个的学说和制度，自然发生最近两三个月的许多流氓把戏。似乎用不着详细说了。举几个例罢。

“三年之后我如果不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请杀我以谢天下。”——这一个恶咒赌得结实。三年的期限过去了，这班人还会有脸皮跑到人跟前来，拍拍胸膛的叫喊：“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相信！相信！谁不相信，就是反动！”八个月以前，早就有“根据人民职业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还有议决的“约法”^②。这会议和约法的结果，小百姓亲身尝着它们的滋味。过了八个月，另外又有一帮流氓出来说什么：职业团体代表选举……国民救国会^③，国民代表会等等。花样是多得很！说嘴郎中说得天花乱坠，他们葫芦里其实还是卖的那一套假药，比砒霜还毒！小百姓气愤不过，抓住一两个流氓，打他们一顿；立刻，就会有人出来打拱作揖的说：“赔罪，赔罪，对不起！我要是再卖国，诸位尽管抓我的胡须，打我一个半死不活。”他说着，还真的用手揪揪自己一把有名的大胡子。真做得出来！可是一转身，立刻就去恭请国联的列国联军来共管瓜分。同时，立刻转动机关枪，

①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中说：“象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阿斗是有点没有能的”，“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委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又说中国人民“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这四万万人都象阿斗”。阿斗，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的小名。

②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

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汪精卫曾通电发起组织“国民救国会议”。

盒子炮，刺刀，木棍，麻绳……把小百姓大大的教训一顿。这算是诸葛亮用兵如神，杀敌救国。只不过并非救小百姓的国，而且为着实行无抵抗主义，杀无抵抗主义的敌人，保全海盗的奴才的国。……

所有这些——叫做流氓尼德！

一九三一，一二，二五。

鸚 哥 儿

“昔有鸚鵡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意志，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胡适之引周栎园《书影》^①里的话做他的《人权论集》^②的序言。

鸚鵡是一种鸟儿，俗话叫做鸚哥儿。大家知道鸚哥儿会学嘴学舌的学人话。然而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的结果，发见〔现〕了它还会救火，这倒是个新发见〔现〕的新大陆。

话呢，的确不错！现在的鸚哥儿都会救火了。第一，因为新大陆是鸚哥儿侨居过的，所以新大陆要有大火的话，它一定要去救。第二，鸚哥儿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因此，中国正在大火，鸚哥儿也一定要来救的。鸚哥儿怎么救火呢？

鸚哥儿会学人话，它们自然是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救火。

例如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结果，普鲁士的兵打到了巴黎城下，资产阶级的各种党派，看见巴黎工人武装起来防守巴黎，并且组织公社政府，于是乎大家牺牲政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工人，宁可准备把

^① 周栎园（1612—1672），名亮工，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由明入清的学者。著有《因树屋书影》（即《栎园书影》）。文中所引见于该书卷二。

^② 《人权论集》，胡适等人的论文集，一九三〇年新月书店出版。

巴黎去投降普鲁士的军队。结果，的确把法国的爱洛两州立刻割让给德国，这样得了德国普鲁士的同意，使普鲁士的军队不来牵制他们，他们就痛痛快快地屠杀了巴黎公社。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各种党派联合的政府叫做国防政府，的确救了法国的和德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的鹦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也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再则，最近英国财政资本的统治也开始着了大火了；所谓工党的麦克唐纳^①立刻牺牲政见，主张裁减工人的失业救济费，减少工人的工资以及国家职员薪金，……他和保守党自由党组织三党联合的国民政府，企图救英国帝国主义的命。中国的鹦哥儿也学着英国的贩卖工人的专家，来主张什么联合各派的国防政府。中国的鹦哥儿就会这样学嘴学舌的救火。固然，他们“虽有意志，何足云耳”，然而他们要救火的诚心，他们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诚心，是值得“感激”的！

花言巧语的鹦哥儿，你们的“人权”、“自由”……还要骗谁呢？

鹦哥儿呵鹦哥儿！你们还不如兔儿爷。兔儿爷有一种特别的骗人的本事：它们遇见什么危险的时候，立刻用两只小巧的前腿，把自己的很美丽的红眼睛遮起来；这样，它们就看不见危险了，它们以为危险也看不见它们了。如果它们遇见的是猎狗，那么，它们这一套把戏，岂不是骗了猎狗又骗了自己么？自欺欺人，一当两用，真正巧妙之至。

中国的兔儿爷现在也应当看见大火了。但是，它们会遮起自己的眼睛来。

自从日本如入无人之境的打进了满洲，一切种种的鹦哥儿，都忽然的发见〔现〕了中国的大火；大学教授，新闻记者……都在叫着：“赤

^① 麦克唐纳 (J. R. Macdonald, 1866—1937)，英国工党领袖。曾两度出任工党内阁首相。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主持保守党、自由党、工党的“国民联合内阁”，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去职。

焰薰〔熏〕天，疮痍遍地。”大家口头上都要救国，其实是要救火。有些人也许衷心至诚的要解放中国，甚至于要解放的还是劳动群众；可是他们象〔像〕兔儿爷一样故意遮起自己的眼睛来，说：“劳动群众腐化了么？为什么不起来救国？”他们遮起了自己的眼睛，不看那些对于帝国主义不抵抗的枪炮飞机手榴弹……正在对准着劳动群众，而且这些家伙对于劳动群众决没有对于“吾人子弟”的学生那么客气。结果，这些人的至诚，客观上仍旧是替绅商统治救火，——因为他们这样“至诚的态度”比鹦哥儿更加容易骗人。所以兔儿爷终究也是一种骗人的鹦哥儿，不过道行和法力比较得更深些罢了。

可以说：一切种种的鹦哥儿，连兔儿爷式的也在其内，虽然会学着人话七张八嘴花言巧语的说个不了，然而他们大家一致不说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这就是成千成万的平民小百姓被人家屠杀，剥夺任何的自由和权利，做牛做马的做着苦工。这些小百姓还是牛马的时候，日本的以及法国英国美国……资本家的军队要开进中国来，永久是如入无人之境的。

中国的绅商统治之下，中国原是个“no man's land”^①！

一九三一，一二，二六。

沉 默

世界上有那种“听得见历史的脚步”的耳朵。他们要象〔像〕猎狗一样，把耳朵贴伏在土地上，然后他们的耳朵才听得见深山里的狼叫和狮吼。可是，这种耳朵有时候也会生病的；生了病的耳朵就觉得什么都是沉默了。

^① “no man's land”，英语，意即没有人的地方。

何况这世界上的声音并非都是中听的。不中听的声音，还有人故意把它淹没住了。于是乎更觉得什么都是沉默的了。

远一些：譬如大西洋的英国舰队里，据说曾经发出革命歌的歌声，——那些英国水兵反对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减少兵士的饷银，一致罢操，把舰队开到了伦敦，违抗国民政府的命令（《申报》）。过不了多少时候，这些革命歌的歌声听不见了。难道就这么沉默了？！近一些：在中国的满洲，“日兵中有受日本全国劳动协会暨共产党……各机关报之感触者，——该机关报刊载反对侵略满洲之论文，并谓出兵为进攻苏俄之前阶——以为抛妻别子为谁战争，为谁侵占满州，故一部分兵士，于进攻马占山时，主张怠战……旋日军于下令进攻大兴时，驱此二三百名日兵为最前线，而白川大将^①竟密令亲信兵士，在后用机关枪扫射，可怜此二三百名日兵，均遭残杀。”（上海《社会日报》）这些主张怠战的呼声和机关枪扫射的响声，我们也没有听见。这些声音难道也都是沉默的吗？

当然不是的！不过这一类的声音对于民族主义者，都是不中听的。民族主义者之中的“最左派”尚且认为“工人无祖国”；对于日本欧美的劳动者，至多是“或许要有一部分的理由”。因此，所有这些不中听的声音，一概都淹没起来。

关于我们中国自己人的声音，那就更不必说了。

中国的平民老百姓还沉默吗？据那些生着“听得见历史脚步的耳朵”的人说——是的。事实上可不是的。

那些呼吼着的反抗的声音，虽然已经震动着山谷，然而绅商只要还有一分的力量，他们也必定竭力去淹没的。至于对付将要呼吼起来的声音，那就有一切种种的武器，可以用来堵住民众的嘴和鼻子，割

① 白川大将，即白川义则，“一·二八”事变中任日本第四派遣军总司令。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炸死。

断那些会呼吼的喉管。于是乎对人说：这些小百姓沉默了！

但是，总有那一天——这些不中听的声音终究要淹没不住的。

暂时，并不是平民小百姓沉默，而且绅商大人还在临死挣扎的大呼小叫；因此，大人老爷们的救命的叫喊，在一些地方盖过了平民小百姓的反抗的呼吼。这或许也是一种沉默。

这种“沉默”都是气象测验术里的一个术语。读者先生想一想：夏天，暴风雨之前，霹雳的雷声正要响出来可还没有响的那几秒钟，宇宙间的一切都象静止了，——好比猫要扑到老鼠身上去的时候一样，它是特别的沉默，——一根绣花针落到地板上去都可以听得见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着就要有真正的震动世界的霹雳！

一九三一，一二，二六。

暴风雨之前

宇宙都变态了！

一阵阵的浓云；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还是青的，那简直是鬼脸似的靛青的颜色。是烟雾，是灰沙，还是云翳把太阳蒙住了？为什么太阳会是这么惨白的脸色？还露出了恶鬼似的雪白的十几根牙齿^①？

这青面獠牙的天日是多么鬼气阴森，多么凄惨，多么凶狠！

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噉噉啾啾……——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一阵一阵的成群的水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着了惊吓，慌慌张张

① 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张的飞过来。它们想往哪儿去躲？躲不了的！起初是偶然的，后来简直是时时刻刻发见〔现〕在海面上的铄亮的，真所谓飞剑似的，一道道的毫光闪过去。这是飞鱼。它们生着翅膀，现在是在抱怨自己的爹娘没有给它们再生几只腿。它们往高处跳。跳到那儿去？始终还是落在海里的！

海水快沸腾了。宇宙在颠簸着。

一股腥气扑到鼻子里来。据说是龙的腥气。极大的暴风雨和霹雳已经在天空里盘旋着，这是要“挂龙”了。隐隐的雷声一阵紧一阵松的滚着，雪亮的电闪扫着。一切都低下了头，闭住了呼吸，很慌乱的躲藏起来。只有成千成万的蜻蜓，一群群的哄动着，随着风飞来飞去。它们是奇形怪状的，各种颜色都有：有青白紫黑的，象〔像〕人身上的伤痕，也有鲜丽的通红的，象〔像〕人的鲜血。它们都很年青，勇敢，居然反抗着青面獠牙的天日。

据说蜻蜓是“龙的苍蝇”。将要“挂龙”——就是暴风雨之前，这些“苍蝇”闻着了龙的腥气，就成群结队的出现。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辟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

但是，暂时还只在暴风雨之前。“龙的苍蝇”始终只是些苍蝇，还并不是龙的本身。龙固然已经出现了，可是，还没有扫清整个的天空呢。

一九三一，一二，二七。

新鲜活死人的诗

诗人就是死也死得“高人一等”。这固然不错。但是，诗，始终是

给活人读的。为什么诗人爱用活死人的文字和腔调来做诗呢？！

中国古文和时文^①的文言，据刘大白^②说，是鬼话。仿佛周朝或者秦汉……的人曾经用这种腔调说过话。其实这是荒谬不通的。

中国的社会分做两个等级：一是活死人等级，二是活人等级。活死人等级统治着。他们有特别的一种念文章念诗词的腔调，和活人嘴里讲话的腔调不同的，这就是所谓文言。现在的所谓白话诗，仍旧是用这种活死人的腔调来做的。自然，有点儿小差别。因为暂时还只有活死人能够有福气读着欧美日本的诗，所以他们就把外国诗的格律，节奏，韵脚的方法，和自己的活死人的腔调生吞活剥的混合起来，结果，成了一种不成腔调的腔调，新鲜活死人的腔调。为什么是不成腔调的腔调？因为读都读不出来！为什么是新鲜活死人的腔调？因为比活死人都还不如！陈旧的活死人已经只剩得枯骨，而新鲜的活死人就一定要放出腐烂的臭气。

活死人的韵文，甚至于“诗样的散文”，读起来都是“声调铿锵”的，例如：

赤焰薰〔熏〕天，疮痍遍地，国无宁岁，民不聊生。

——《上海大学教授宣言》

武将戎臣，统率三军队，
结阵交锋，锣鼓喧天地，
北战南征，失陷沙场内，

① 例如《申报》上的电报，时评，广告，新闻，公文等，就是时文的文言。——作者原注。

② 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棧，字伯贞；后改姓刘，名靖斋，字大白，浙江绍兴人。诗人。著有《白屋说诗》等。

为国捐驱，来受甘露味。

——《瑜伽焰口》

这种活死人的诗，原本是不要活人懂的。用它来放焰口——一心召请岳飞诸葛亮等的耿耿忠魂，也许还有点儿用处。死鬼听见这样抑扬顿挫的音调，或者会很感动的跑出来救国呢。

至于新鲜活死人的诗，那真是连鬼都不懂。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诗人，大半是学着活死人的腔调，又学不象。活死人的诗文，本来只是他们这些巫师自己唱着顽[玩]的。艺术上的“条件主义”是十足的，所讲究的都是些士大夫的平仄和对子。新鲜活死人学着了：

只因为四邻强敌，虎视眈眈，
只因为无耻国贼，求荣谄媚，
把我们底[的]宝藏，拱手赠送他人，
把我们底[的]权利，轻轻让于外国……

——《理想之光》^①

这实在是一篇很拙劣的变相四六文，读着它肉麻得要呕呢！这里活死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最低级的旧式大众文艺，算是白话的了；可是，一描写到景致，一叙述到复杂的情形，也往往用起韵文，而且一定要用这种活死人的腔调。例如：“一壁厢柳暗花明，一壁厢山清水秀”等等。那篇所谓诗剧的《理想之光》的程度，大概至多也不过如此罢了。

再则，这些诗人学欧美的诗，其实又不去学它的根本。欧美近代

① 《理论之光》，孙良工、梅痕女士合著的四幕诗剧，发表于《现代文学评论》创刊号（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

的诗已经是连用活人的白话里的自然的节奏来做的。而中国诗人却在所谓欧化的诗里面，用着很多的文言的字眼和句法。欧美近代的诗，读起来可以象说话似的腔调，而且可以懂得，中国现在的欧化诗，可大半读不出来，说不出来。即使读得出来，也不象话，更不能够懂。例如当代诗人有这么一句：“美人螭首变成狞猛的鬻髅”^①。读者听着，这是：“美人遵守变成柠檬的猪猡”！

难道平民小百姓的活人的话，就不能够做诗么？固然，因为中国的艺术的言语几千年来被活死人垄断着，所以俗话里的字眼十分单调，十分缺乏。然而平民小百姓的真正活的言语正在一天天的丰富起来。如果平民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脱离一切种种活死人的影响，打破一切种种活死人的艺术上的束缚，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平民的诗的言语。

至于陈旧的和新鲜的活死人，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②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① “美人螭首变成狞猛的鬻髅”，引自黄震遐作诗剧《黄人之血》，载于《前锋月刊》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

^②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茨冈》。

财神还是反财神？^①

财神的神通

“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②有人这样说。

这句话仿佛是对的。自从状元老爷倒了运，轮着军官大人出风头了。军官大人不但胳膊粗拳头大，而且还有洋枪洋炮，飞机毒瓦斯，坦克车……！

然而，武侠小说上的飞剑和拳术，始终只能够在梦里安慰安慰穷人。而洋枪洋炮，也不过是财神菩萨的法宝。没有财神菩萨的保佑，不但胳膊粗拳头大的武士只配当个把保镖的，就是该着洋枪洋炮的英雄也还做不成主子。

中国的国货财神，向来就分做五路——所谓五路财神是也。可是，现在世界，样样欧化；固然化不彻底，然而至少财神也变成了半吊子的欧化财神了。因此，中国现在的财神是五代同堂多子多孙，至少总有十七八路。这都是些英国种，美国种，法国种，日本种的……杂种财神。他们各霸一方，做着真正的主子。现在读者诸君的贵国，早就是：“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了！

不过还要添一句话，就是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神，此其一。其二，中国的许多财神主子，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三二年七月），署名司马今。

② 见穆时英作的小说《南北极》。

三四路一帮，八九路一帮，互相勾结着，——为着要互相吵架打仗，抢码头，夺地盘。中国的各帮小财神的打架，也是听着外国的各帮大财神的指使的。

这样，一切种种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才是中国的主子。财神菩萨保佑谁，谁就可以雇用指挥洋枪洋炮的军官大人，谁就可以喂养吹吹打打的状元老爷，——从会写四六文章的书启起，一直到会做印象主义的欧化文艺为止。

话已经说明白了。现在的状元老爷，就是一切种种新式的旧式的政客。军官大人，就是那些坐飞机吃大菜，以至于穿青布棉大氅的军阀。而财神菩萨是一切种种帮口的绅商。

绅商之中，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地主，他们是当然的绅士，同时，他们一定要做生意；中国农民的汗和血，中国的米麦豆和棉花，丝和茶叶，中国手工工人的一切种种生产品，逃不了地主绅士的商行；中国一切穷人的生命都在地主绅士的掌握里面；那许多当铺钱庄……以至于税收机关，收租法庭，象〔像〕天罗地网似的布满了全中国。其次，就是那些绅士化的资本家，他们的花花绿绿的商店里，贩卖着乱七八糟的西洋货和东洋货，他们的乌烟瘴气的堆栈里，收罗着许多外国大财神需要的货色。这些资本家中，固然也有些开着工厂，和外国财神“竞争”。你知道他们竞争些什么？他们和外国财神竞争的是：谁剥削工人剥削得凶些。自然哪！他们是在“提倡国货”，更加有理由叫工人“增加生产效能”！于是乎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工人，从五六十岁到五六岁，从天亮六点钟到天黑六点钟，甚至于从鸡叫到三更，都在天天挤出自己的血汗来，替中外财神“造产”。

可是，因为世界上的大财神——国际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支配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国的小财神无论怎样压榨，自己总还不能够满足。他们因此十分谦虚，对人说：我们并

不是财神，不过是“小贫”^①而已。他们也就非常之驯服，对着外国大财神总是“镇静而无抵抗”，想多得几个赏钱。可是，他们还很勇敢——时时刻刻要互相决斗，为的是要抢赏钱。

为着抢赏钱的缘故，中国的绅商领袖在上海就分成两大帮：江浙帮（又叫做阿拉帮）和广东帮。至于其余的小码头，每一省，甚至于每一县，都分成许多小帮口。你抢我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军阀制度的基础就在这里。

最近，一九三二年的一月，江浙帮和广东帮又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②虽然还没有动刀动枪，这出滑稽戏也就够好看的了。结果暂时仿佛是讲和了。于是乎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殿；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飞行皇帝为什么腰把硬？因为江浙帮的财神保佑他。太子为什么不能够得意？因为他的财神要想“接收”上海市商会而没有成功。

谁说“胳膊粗拳头大的就是主子”？

自然，中国的财神没有洋枪洋炮也是做不成功的。但是，单有洋枪洋炮的，单有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的，单有粗胳膊大拳头的，——始终只配做大大小小的保镖的。这些保镖的用处，就是打架抢码头，就是屠杀反抗财神的一切人。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联合着屠杀，屠杀一切反抗财神的群众，屠杀一切反抗日本大财神的群众。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又正在互相勾结，互相排挤，这些讲和，那些又吵嘴，——不久又要自伙儿里大大的打起来！

① 《三民主义·民主主义》（第二讲）中说：“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

② 当时国民党内粤方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和宁方蒋介石的冲突公开化，双方在会议上激烈争吵，并发表通电互相攻击。蒋介石曾一度宣布辞职，自南京出走。

狗道主义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①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余万能”主义^②，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总在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

① 狗道主义的文学，见胡秋原发表于《文化评论》创刊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日）的《阿狗文艺论》。下文“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同此。

② “关余万能”主义，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由英国管理中国的海关，关税收入都尽先摊还外债本息，剩余的才交中国政府，称为“关余”。国民党政府的若干部门都曾为争夺关余发生争执，各方都说“关余”给它就能做出什么事业来。因此这里讥为“‘关余万能’主义”。

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出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的说：不准要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①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取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土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拚[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象小绵羊一样。

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中说：“中国人用不着自由”，“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话说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王公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做宋大西^①，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道的喊着：“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

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的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

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

① 宋大西，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中的角色。

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①

红 萝 卜

最近我方才发见〔现〕了一本小小说，题目是《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②。单是这个题目就够了！

十二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宗法社会的运动还是大逆不道的。不论当时的运动是多么混沌，多么幼稚，可是，战斗的激烈的对于一切腐败齷齪东西的痛恨，始终是值得敬重的。当时是女子要求解放。而现在？是男子甘心做消遣品了。十二三年来的“进步”真是大得不得了。这至少在城市的布尔^③阶级里面有这种情形。消遣品！这是多么高贵的头衔。高贵的人自然要格外的有礼貌，格外顾到绅士的身份，因此，咬牙切齿的“粗暴”的反抗精神应当排斥。一切颓废感伤，歇死替痢^④的摩登态度，尤其是性神经衰弱等类的时髦病，应当“发扬而广大之”。至于宗法社会的毒菌，还在毒死成千成万的武侠神怪小说的读者群众，那可是不关他们贵人的鸟事。这一类的黄金少年，自然是财神菩萨的子弟，至少也是梦想要做财神菩萨的小老板。对于这种寄生虫的攻击，暴露，讥刺……只嫌太温和了，太仁爱了，太“人道主义”了。这种文艺现在是太没有力量了。常常不是攻击，而是可怜这些可怜的寄生虫；而可怜往往会变成羡慕的。

对于这些“消遣品”，以及一切封建余孽和布尔阶级的意识，应当

① 这是《黄人之血》中的一节。米加勒，或作米迦勒，战胜魔鬼的天使长（见《圣经·旧约》）；爱普鲁，即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② 《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穆时英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③ 布尔阶级，即资产阶级。法语 bourgeoisie（布尔乔亚）的略称。

④ 歇死替痢，英语 hysteria 的音译，通译歇斯底里，即癔病；借作神经失常，情绪激动的意思。

要暴露，攻击……，这是文化革命的许多重要任务之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确有“没有完成的事业”，要在新的基础上去继续去彻底的完成。

然而是谁来完成呢？难道只是一种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①？

当然不是的！这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群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固然群众是有朋友的。这些“朋友”是离开财神菩萨的小布尔，这是真正反对一切财神菩萨的“智识阶级”。这是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

至于红萝卜，那可多谢多谢！红萝卜是什么？红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这就是说：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

现在，“自由的智识阶级”自己出来报名，说要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

好极了，欢迎之至。但是，第一，假使他们摆出“科学的”尊严面目，说无所谓有意识的替群众服务，而只有“客观的科学的独立的真理”，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第二，假使他们表现自己的“超然的清高的无党无偏的”态度，居然要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第三者”，说压迫者固然不准侵犯别人的言论出版自由，而被压迫者也不应当“侵犯”别人在思想上意识上来实行压迫的自由；第三，假使他们并不是来帮助群众斗争，并不在群众的立场上来检查种种可能的缺点和错误，来共同努力的纠正，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锻炼出文化上的更锐利的武器，而是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种“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布尔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

① “自由的智识阶级”，《文化评论》发刊词《真理之槪》中提出的名词。

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这的确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忏悔”

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现在，他们不再忏悔自己的罪过了，他们来要求工人和劳动者忏悔了。这些“下等人”有什么可忏悔的？据说：这些人的罪过是在于不懂得民族主义，是在于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所以应当忏悔。

财神少爷的耳朵，听不见非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呼号和战斗。一则是因为他们听不进，二则是因为他们的老子，财神菩萨的法宝镇压着那些呼号和战斗。

固然，“下等”穷人的斗争还没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然而，穷人用不着忏悔，穷人用得着的是挖心——挖掉“奴隶的心”，越挖得干净，斗争的胜利越有把握。

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掉，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我的父亲，父亲如今又传给我了，并不管我是不愿意要它。……这奴隶的心，我不要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奴隶的心呵！

——《小说月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号，巴金^①：《奴隶底〔的〕心》

①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〇四年生，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



少年时代的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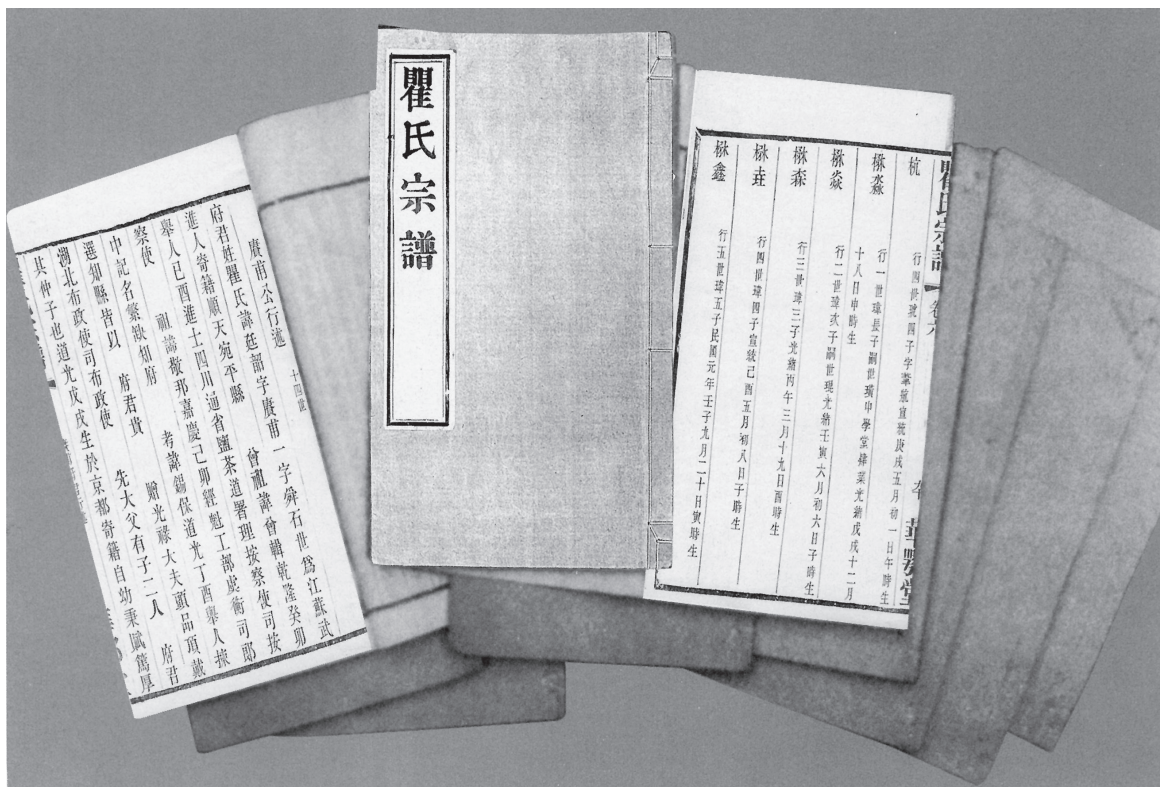


城西瞿氏宗祠

1909年1月，瞿秋白一家搬到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借住。

《瞿氏宗谱》

民国癸丑六修华鄂堂常州瞿氏宗谱，一函10册，内记瞿秋白祖辈世系。“民国癸丑”，即1913年2月6日至1914年1月25日。





金璇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阴西乡大岸上村人，喜爱诗词，写得一手好字，颇有旧学根底，是瞿秋白第一个启蒙老师。她与人为善，怜贫悯苦，是中国传统的善良贤淑的女性。



少年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合影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信奉道教，好老庄之术，通医药，擅山水画，喜爱篆刻，对瞿秋白有多方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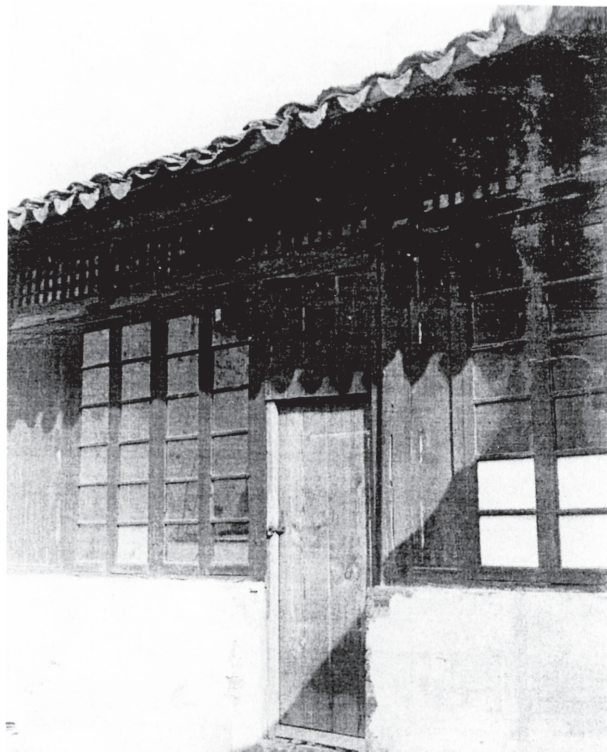
冠英小学

1905 年秋，瞿秋白插入新旧学兼教的冠英两等小学堂（今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初等一年级下学期读书。1909 年 1 月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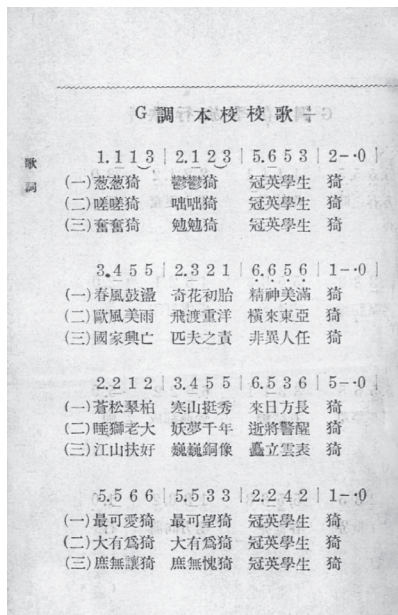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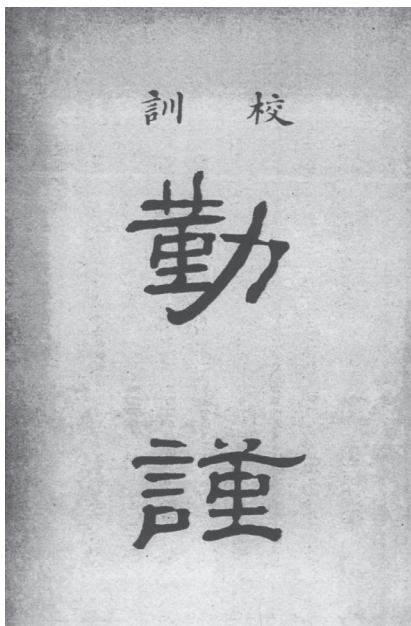


庄苕甫

庄苕甫（1855—1909），常州市人。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改冠英义塾为冠英两等小学堂（今常州市觅渡桥小学），任堂长（即校长）。



瞿秋白在冠英小学读书时的教室



冠英小学校訓、校歌



星聚堂

1904年春，瞿秋白一家搬出八桂堂，先迁至乌衣桥。同年春末夏初，再迁至常州城西织机坊秋白祖母娘家庄氏的星聚堂九皋楼下。图为九皋楼前进新厅。



庄怡亭

庄氏塾馆塾师、瞿秋白的表叔庄怡亭(1884—?)，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常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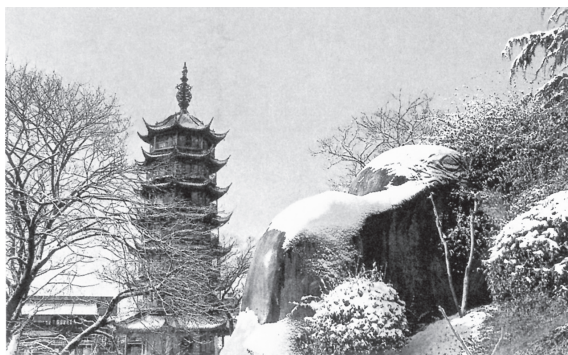


庄氏塾馆

1904年秋，瞿秋白开始在庄氏塾馆读书。该塾馆在星聚堂前进西侧的一个大房间。



天宁寺



文笔塔



舣舟亭

红梅阁



天宁寺、文笔塔、舣舟亭、
红梅阁

瞿秋白少年时期常与同学到常州东门名胜天宁寺、文笔塔、舣舟亭、红梅阁等地游览，谈论古今，指点江山，抒发报国豪情。



北洋政府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并继续研究文学和哲学。

一九三一年发现了这种“挖心文学”的萌芽,张天翼的《二十一个》,《面包线》^①,黑炎^②的《战线》……这些作品里面反映着“下等的”小丘八儿的改造,反映着他们的转变。自然,这都还不过是初步尝试的作品,都还是太片面的,非第亚力克谛的(non-dialectic)^③。可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至少已经不是空中楼阁,这能够反映一些现实的生活,——反映着“反财神”的斗争的某一方面。

不过,“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得多。如果圣人的心有七窍,那么,奴隶的心至少也有七十个窍。为什么?因为这又是财神的神通,财神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风俗……以至于文艺的法宝,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千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事实上,没有巴金写的小说里那个主人翁说的那么简单。当你晓得要为自己“谋幸福”的时候,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心变成另外一种的奴隶的心。

譬如说罢:“自由的”小布尔的心,也是一种奴隶的心。而小布尔的心不但在一切种种穷人的肚子里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小布尔要算是会自己谋自己个人的幸福的了。如果你着重在个人方面想,财神爷的仙法立刻又起作用:他马上念起咒来——“管你自己,管你自己。”这种咒语往往很灵验的。它叫你的奴隶的心,形式上变换一个样子,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

① 张天翼的《面包线》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② 黑炎,原名任敬和。小说《战线》的副题是“呈给还活骷髅塔下跳跃着的人们”,连载于《小说月刊》第二十二卷第十、十一、十二号(一九三一年十、十一、十二月出版)。

③ 第亚力克谛,英语 dialectics(辩证法)的音译。非第亚力克谛,即“非辩证法的”。

现在实际生活里面，正在进行着极复杂的“奴隶的心”的消灭过程，这种小布尔的传染病菌，也在剧烈的斗争之中受着消毒剂的攻击和扑灭。

假使要说穷人也有什么罪过可以“忏悔”的话，那么，不是忏悔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而是忏悔挖奴隶的心挖得不干净。现在醒悟得多了，现在还要努力的去挖，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

黑炎的《战线》里，描写一些兵士，也奉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命令，组织宣传队，特别去演说打倒军阀，这些兵的演说是：“军阀就是×××，×××……其他就没有别的军阀了！”这固然是奴隶的心，固然值得“忏悔”，——如果这些兵现在还在人世间，他们一定正在忏悔。但是，譬如有一个兵说：

“我现在是当着二等兵，是怎样苦，我都告诉她了；并且她还倒在我身上哭！……她要爱我一百年！”……她希望他早些出发，将来打到上海的时候，这种没有饷发的丘八不要干了，最好到厂里去做工，不然拖黄包车也可以，那么，以后她便和母亲同到上海去……

这是什么？落拓的学生青年，常常会做着这样甜蜜的幻梦：将来找到相当的职业，不一定太阔，甚至于很清苦的，可是有一个爱人在怀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种“理想”，比较当工人当车夫的“理想”似乎不同些，似乎要细腻些，也许“将来的家庭”的书房里还要挂一盏古雅的画着花的电灯罩。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同样是小布尔的市侩式的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奴隶的心。

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

反 财 神

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

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反财神说：谁团结得紧干得彻底，谁是主子！

财神的神通大，财神指挥着洋枪洋炮，指使着种种式式的走狗，摆布着乱七八糟的白萝卜，红萝卜，蒙蔽着奴隶的心。

反财神难道就不会夺到那些洋枪洋炮，难道就不会打死那些阿猫阿狗，剖开那些白萝卜，红萝卜，挖掉那种奴隶的心？！

反财神是要冲破万重的压迫，喷出万丈的火焰，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齷齪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这种火焰现在已经烧到了中国。这将是几万万群众的火焰。

自然，从万重的压迫之下刚才抬起头来的人，也许力量还薄弱，也许支持不住而又倒下去。说这种反抗运动是“盛极而衰”，那只有脂油蒙着心的人。谁要是把脂油刮掉，真正把自己的心拿出来，交给中国的几万万群众，那他就知道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不是“盛极而衰”，而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

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最近也居然发生了些新奇的“怪现象”：就

是杨树浦，小沙渡的蓝衫团^①。听说苏州也有了这类的东西。这些“怪现象”自然还是小焉者也。比起夺到了洋枪洋炮，赶跑财神菩萨的地方，这当然是小焉者也。可是这些蓝衫团是新式的草台班。中国内地本来有一种草台班戏子，逢年逢节，他们赶到财神庙去唱戏，——或者灵官庙土地庙，反正都是一样的变相财神，——这算是给一般农民群众的安慰。安慰农民群众一年做到头，弯腰驼背的榨出许多血汗，双手捧着奉送给地主绅士。绅士说：你们太辛苦了，我叫草台班来唱几天戏，给你们玩玩。这些草台班总是替财神做戏，恭维财神的。现在，那些蓝衫团的草台班，可不替财神唱戏，而且还要唱戏来反对财神。所以说是“怪现象”了。这些新式戏子到上海工人里去唱戏，将来还要到全国民众里去唱戏，而且一定要唱反财神的戏。

反财神的戏，当然不是一唱就好的。这些戏，例如《工场夜景》（袁殊），《活路》（适夷）^②，都是真正要想指出一条活路来的，这条“活路”的开头，难免只是诉说没有活路的苦处。然而，至少这种诉苦是有前途的。这里因为诉苦而哭，也将要是学会不哭的第一步。而且还有一件事值得指出来的：就是这些新式草台班的戏子，因为要唱戏给“下等人”听，而不是写小说给上等人看，所以开辟了“下等人国”的“国语”运动。这是中国文学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新纪元。可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有意识的去努力，因此，他们用的言语还难免混杂一些“上等人国”的“国语”。

照财神菩萨说起来，“下等人”自然就是强盗土匪，只会抢东西。

① 蓝衫团，当时我国工人和革命戏剧工作者组成的活动于工厂区（如文中提到的上海杨树浦，小沙渡等）的活报剧团，演出多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左翼戏剧运动中曾开展这类活动。

② 袁殊，原名袁学易，一九一一年生，湖北蕲春人。作家。适夷，即楼适夷，原名锡椿，一九〇五年生，浙江余姚人，作家。《工场夜景》和《活路》曾于一九三一年合印一册。

下等人自己如果还抱着一颗奴隶的心，他也会说：

“他妈的，拚[拚]上一拚[拚]吧，左不过是一死！现成的放在那里，为什么不抢呢！……”

可是，下等人的长工，例如李塌鼻，王大保之类，真正挖掉了奴隶的心，真正知道要创造下等人自己的国家，他们说：

蠢东西！真是杂种！你们要抢些什么！老子是不抢的，老子们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不是抢，是拿回我们的心血，告诉你，杂种，只要是谷子，都是我们的血汗换来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呀！……

——丁玲：《水》^①

小白龙

财神菩萨对于真正的强盗土匪并不怕，对于叫化流氓更不怕。真正“可怕”的是反财神——是知道拿回自己心血的群众。

至于对付强盗土匪叫化流氓，——财神菩萨的法宝多着呢。

自从日本财神的洋枪洋炮在满州乒乒乓乓大干起来之后，自从中国的五路财神，互相竞争着表现镇静不抵抗的神通以来，强盗土匪就大交其运。原来中国的财神借着强盗土匪的声名，还可以更加巧妙的宣传不抵抗主义。

东三省的著名胡匪头子小白龙，于是乎也和马占山一样的出风头了。

^① 丁玲，原名蒋冰之，一九〇四年生，湖南临澧人。作家。小说《水》连载于《北斗》月刊第一、二、三期。李塌鼻、王大保都是《水》中的人物。

小白龙道：

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

——《关东豪侠传》，震华书局出版

小白龙等类的土匪，可以被这些礼拜六派的武侠小说大家描写得如此之“深明大义”，如此之民族主义，如此之爱国主义，如此之国家主义，如此之马鹿^①……如此之对内不抵抗主义，——而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这并不是小说家的罪恶。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证财神主义的基础。所以武侠小说家能够这样描写，而且描写得这样巧妙。

现在对于小白龙，老北风，盖三省^②……的崇拜，很自然很顺便的和最近几年流行的武侠小说联贯起来。这些小说和连环图画，很广泛的传播到大街小巷轮船火车上。那些没有“高贵的”智识而稍微认识一些字的“普通人”，只有这种小说可以看，只有这种戏可以听，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平常这一类的小说的题材虽然单调，可是种类和份数都很多的，什么武侠什么神怪，什么侦探什么言情，什么历史什么家庭。……这些东西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的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些所谓小说家……一切种种的艺术家，也是财神菩萨的走狗。

① 马鹿，日语中的汉字，“愚蠢”的意思。

② 老北风、盖三省，都是小白龙一流的土匪。

千万不要看轻它们。它们虽然土头土脑，没有洋狗的排场，不一定吃牛肉，不一定到跑狗场去赛跑。它们就算是吃屎的癞皮黄狗，可是到处都在钻来钻去，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见它们的狗脚爪的。它们很忠心的保护着财神菩萨。

而且在文字技术上，它们往往比较的高明，它们会运用下等人的容易懂得的话。它们虽然不用下等人自己的话，它们可能会用草台班上说白的腔调，来勾引下等人，使下等人抛弃自己的言语，而相信只有那种恶劣的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方才可以“做文章”。它们利用这种几百万人习惯的惰性，能够广泛的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这决不是第二等的问题！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所谓“马路文学”（*Littérature des boulevards*）^①。不过，那里的马路文学已经没有文字上的优越的武器。中国的民众，可在一般的文化上，在最具体的文字言语问题上，也受着封建余孽，——古文言和新文言的压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现在对付中国的马路文学的方针。

我们必须承认：在反对文学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里面，我们主要的注意只集中在“好的”作品。这没有疑问的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无名的反动意识的代表所出版的几百万本的群众读物，实际上却是最危险的毒菌，散布着毒害和蒙蔽群众意识的传染病。在这个战线上，必须要最紧张的工作。

——德国文学家皮哈的演说

① “马路文学”，十九世纪中叶盛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倾向。“马路”，指巴黎中区的街道。因当时常有一群作家在这里的酒吧间酣饮和寻欢作乐，同时进行一些文学活动而得称。

二十世纪的初年，欧美就发生过“Christ（基督）还是 Antichrist（反基督）”的斗争。

现在的中国，是个“财神（Tsaishen）还是反财神（Antitsaishen）”的斗争。

一九三二，一，十五。

《铁流》在巴黎^①

中国的“铁流”从一九二七年就流起……

不，这里是说绥拉菲摩维支的一本小说《铁流》^②——有完全的注解和序文的中文译本。这可直到最近才出版。^③

关于这个《铁流》，却有一些“海外奇谈”。

因为日本占领满洲，“研究日本”忽然的成了最时髦的工作……可是，“大伸国际公义”的国际联盟在巴黎开会之后，又来了一个消息，说法国军队开进了镇南关^④，于是乎“研究法国”似乎也应当同样的时髦了。

巴黎的报纸，书籍……似乎不在“仇货之列”，——不应当加以抑制。

这样，我们可以在巴黎的旧报纸里，寻出些关于《铁流》的很有趣的消息：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十字街头》第二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署名 Sma kin。

② 绥拉菲摩维支（А.С.Серафимович，1863—1949），现译绥拉菲摩维奇，苏联作家。《铁流》完成于一九二四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队伍的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

③ 杨骚译的《铁流》出版得早些，可是，这个译本没有曹靖华译得好。而且三闲书屋校印的曹译本有一篇涅拉托夫的序文，非常之好的一篇论创作方法和艺术上的一般问题的论文。还有详细的关于事实的注释，其中引用了小说里主人翁郭甫久鹤自己著作的回忆录：《由古班到沃瓦河及其归程》，并且附有地图。这就更加使读者亲切的直接的感觉得这部伟大的纪事诗的呼吸。小说和事实合并了，——这本来不是两件东西！——作者原注。

④ 镇南关，在广西凭祥市西南。一九五三年改名为睦南关，一九六五年再改名为友谊关。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铁流》已经在巴黎的日报上发表过。日报上登载了没有几章，就接到好些读者的信。有一封，署名的是“Reno”工厂的一个五金工人，他写的是：

难道真正有这么一个郭如鹤吗？难道会有这样的英雄？真难相信，虽然很愿意相信……如果俄国的革命党人能够在《虞芒尼德》（L'Humanité）^①上，登载自己关于国内战争的回忆录，那就好极了。

他居然得到了活的郭如鹤的回信，不过这个人虽然在小说里是姓郭如鹤，他的真姓可是郭甫久鹤。他的回信说：

亲爱的同志！你觉得奇怪：“难道真有这么一个郭如鹤？”的确有。亲爱的同志，我活着，到现在还活着，我现在是快枪团的团长。为着使你不要怀疑，我现在寄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你。

天才的普洛【罗】作家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面描写的达曼红军的征战——我是参加的，我那时候先是达曼军的第一队队长，后来就做了全军的军长。这个光荣的征战，绥拉菲摩维支描写得完全正确。我的真姓是郭甫久鹤。

达曼红军在一九一八年的八月间被敌人包围着，逼到了黑海和亚左夫海的海边。我们决定了不投降。可是枪弹炮弹不够，而且完全没有粮饷，我们就这么不断的和德国人，土耳其人，乔治亚人——孟塞维克（就是中文译本里的克鲁怎人）打仗，爬过了三千多米达高的高加索山脉。走了五百基罗米达的路，冲破了敌人的包围，我们始终和北高加索的主要部队联络了起来。

①《虞芒尼德》报，法语《人道报》的音译。

时常没有子弹，甚至于没有枪的打仗，没有船只的穿过河，山上的作战，极残酷的饥饿，没有衣服，没有鞋袜，疫气等等，——这就是达曼军战斗的特点；战胜了一切障碍，完成了《铁流》里所描写的征战。而白党义勇军在一九二〇年就毁灭了，他们也被逼到海边，赶进了黑海。一部分的古班军得胜了回到古班，退伍了，开始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劳动。

只要听见工农政府的第一声的号召，我们一定任何时候重新集合起来，在战斗的达曼旗帜之下，去继续“铁流”的光荣的历史。

我敢用无产者的“铁流”的参加人的名义，告诉你，亲爱的法国同志：将来的达曼军，一定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决心来拥护西欧的弟兄，那时候，我们和你们就可以会面，亲亲热热的握手，而共同的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谨致同志的敬礼。

郭甫久鹤

——巴黎《虞芒尼德》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我非常之高兴的读着你的信，简直不知道怎么样来谢你的这样知心的回信。读着你的信，我很了解：——象〔像〕你这样的人是创造得出那样的奇迹的。

我在工厂里的图样间——我是在那里做工的——和图样工匠，还有工程师，谈了许多关于你们的军队的话，和他们说：你们军队里长官和兵士过着同样的生活，那样真挚的友爱只有红军里会有。然而，哼！他们方面，我尽碰着怀疑的态度，往往简直是讥笑。

可是，你的这封信，——他们要我读给他们听，我就读了，可真正使他们完全惊奇得不得了。

他们原来也会懂得：你们的力量和红军胜利的来源，——虽然红军里面军事智识好的军官是不够，象你们那样的亲爱精神，我们这里

连影子也没有。

这些事实，并且使你们和你们的一切，在我们眼光里面，一天天的高升上去。

每一次苏维埃艺术的展览会，每一份苏维埃艺术的作品，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同情；真要看看：每一次苏维埃的电影，能够克服了一切障碍，达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工人的情绪是多么快乐和兴奋。

我看了《母亲》的电影片子。印象非常之深。影戏院真正要被鼓掌的声音冲破了；我一生一世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热烈；我们正在要求准许《铁甲舰波铁摩京》的电影片到法国来开演，我现在已经想得到：这片子到了之后是个什么情形。

亲爱的同志，也许我们很快就可以在银幕上看见你；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里，有好些非常之好的描写之中，觉得到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厉害的力量和光芒，你简直不应当再延搁下去了——快些把《铁流》排成电影，把你自已照到银幕上去。

是的，我们要看见这颗从东方升上来的巨大的明星，这颗伟大的红星，它吸引住了我们的视线，紧张了我们的感觉。

我们真正是无限的幸福，我们对你们表示我们的全部的爱情，表示对于你们的极深切的忠实的感情，——你们为着革命的事业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我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代表《虞芒尼德》报的一切读者的共同的意见，对于你表示感谢和同志的亲爱的敬礼。

R.Gilbert (“Reno” 工厂的工人)

吉尔佩 (R. Gilbert) 说：《铁流》的精神，在法国连影子也没有，这是在一九二八年。现在，至少这种影子已经在徘徊着。而“法

国客军驻扎的非洲沙漠”和安南^①地方，不但有了“铁流”的影子，而且有了“铁流”的本身。至于“四海之内”，那就更不必说了，这里“铁流”快要变成铁海的波涛，——虽然还没有冲掉“本地的客军”。这里不止一个郭如鹤似的英雄。而且这些英雄的本领，有敌人替他们宣传：他们在同一个时候会“猖獗”又会“投降”，他们在前一个月“病死了”，后一个月又“被打死了”，再过几个月又会“溃窜”了。关于这些“铁流”用得着所谓宣传吗？

用不着。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也没有宣传，没有标语口号。

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那一种形式的生活是始终要胜利的，什么是始终要毁灭的——“万劫不复”的。

这种将要“万劫不复”的东西，在自己灭亡的前夜，才要拚[拼]命的造谣，拚[拼]命的宣传。它们还企图用几万万几十万万人的血，去挽回那回不了的命运，——用帝国主义的大屠杀的战争，来维持自己的狗命。

可是，回答这种造谣宣传和屠杀战争的，将要是全世界的“铁流”——铁洋的飓风。

一九三一，十二，十七。

① 安南，越南的旧称。

谈谈《三人行》^①

当我们读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感觉就是：这篇东西不是一口气写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因此，在全部的结构方面，我们不愿意再来详细的批评。例如，这篇小说的开始也许离着满洲事变很远呢，而最后方才很偶然的用满洲事变来点缀一下。照出版的年月推算起来，写这几段“点缀”的时候，最近也总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间。而小说结束得这样匆促，简直没有发展对于新起来的反帝国主义高潮的描写的可能。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带着散漫的痕迹。

《三人行》的题材本来是旧社会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动部队。这并不要紧。革命的部队也需要看一看敌人势力的外围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问题是在于《三人行》的立场是否是革命的立场。

不错。《三人行》里一个姓柯的说：

从前的痛苦是被压迫被榨取的痛苦，现在的，却是英勇的斗争，是产生新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阶段……你以为新社会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一翻掌之间就……划分为截然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么？

这是《三人行》作者的立场，作者是从这个立场上企图去批判他所描写的三个人。这是革命的立场，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立场。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署名易嘉。《三人行》，茅盾著的中篇小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①的立场不同了，——所以说《三人行》是三部曲的继续或者延长——是不确的。然而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

《三人行》之中的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贵族子弟的中世纪式的侠义主义（姓许的），一个是没落的中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叫云的青年）。作者要写他们的破产和没有出路，写农民的子弟怎么样转变到革命营垒里去。姑且不论作者的写法，——是脱离着现实的事变，并且没有构造一种假定的事变来代表社会的现实，而只是为着这三个人物描写一些布景，这本来是机械主义的公式的写法，而且是没有中心的，没有骨干的。这姑且不去说它。

只说作者所要写的“三个人”罢。

第一个“人”是侠义主义。这里的姓许的算是要“为着正义而斗争”，他用他个人的力量去救几个苦人，他还想暗杀摆烟灯放印子钱的陆麻子。作者把他的无聊，可笑，讨厌，他那种崩溃的书香人家的颓伤精神，都还写得露骨，相当的透澈。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这是应当暴露的。

可是，第一，这种侠义主义，并没有发生在现实的崩溃的中国贵族子弟之中，而在于平民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在失业破产的流氓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秘密结社，——畸形的侠义主义表现在现实的所谓下流人的帮口里面。而中国的贵族并没有忏悔，并没有干

^①《幻灭》、《动摇》、《追求》是茅盾于一九二八年发表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合名为《蚀》。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

什么侠义的行动（勉强的说起来，除非是五四时期的“往民间去运动”，那可是和九一八事变隔着两重高山呢）。中国的贵族子弟至多只会梦想要做诸葛亮和岳飞，想把骚动起来的民众重新用什么精忠贤能的名义压下去。第二，因此，作者描写的姓许的截然分做两段：一段是颓废而无聊的讨厌家伙，一段是干起侠义行为来的傻瓜，这两段中间差不多看不出什么转变的过程。即使有，也是勉强的。中国的书香贵族子弟本来就只会颓伤，不会侠义。勉强要他侠义，他也就决不会去暗杀皇帝和总长（象〔像〕民意党^①那样），而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窠的老板。多么可怜！《三人行》之中的姓许的可怜，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这方面也是部分的失败了。

第二个“人”是虚无主义。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当然不是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而是莫名其妙的“商界”：也许是钱庄当铺老板，也许是做南货业洋广杂货业的，也许是什么小作坊的店东……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没落的过程之中，他们愿意人家用“小”字称呼他们，这是“小”老婆的“小”字，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小”字。这种商界子弟，看看生意经轮不着他们这一辈人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黯淡下来……自己的力量是异常的小（这可是真正的“小”了），而又要在“夹攻中奋斗”！所以由他们看来，两边都不好：

一切都破弃了罢，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一切好名词都只是骗人。……一切都应当改造，但是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

这就是惠的虚无主义。对于他，旧社会是应当改造，而革命又太

^① 民意党，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团体，成立于一八七九年。他们以刺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斗争手段。一八八一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被沙皇政府粉碎。

丑恶。那种笑骂一切的态度，可以用来“安慰”一下群众，也正可以堵住革命的出路，因为革命也“只是骗人”罢了。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此拚[拼]命的发展着这种虚无主义，企图笼络住群众（谁大致看过民国元二年直到现在的礼拜六派李涵秋^①之流的小说，他就可以知道）。这种虚无主义是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态度来巩固对于现在制度的信仰。这的确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值得用力来打击的。

可是，《三人行》之中对于虚无主义的攻击太没有力量了，仿佛是打人家一个巴掌，反而把自己的手心打痛了似的。第一，作者描写惠和馨，写得叫人怜惜起来，这是最粗浅的读者也觉得到的，而读者之中的大多数正是这种粗浅的看法。惠在小说里面差不多没有行动，只有言论。因为他不行动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受着什么“现实”的紧箍咒（看原书一一五页）。于是他的言论越发显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例如他“对于一切都摇头”：什么“诉之公理，静候国联解决，经济绝交，革命外交，对日宣战，以至载货汽车中拿着青龙刀丈八蛇矛的国货武士的国术”。作者对于这种虚无主义的半面真理，只借着云的议论来反驳他，可是，你驳尽管驳，而读者觉得惠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因为他的“夹攻之中”的阶级立场并没有显露得充分。第二，惠的虚无主义因此就没有转变的必要。作者写着他稍稍修改了自己的“政纲”：说可以委托去改造社会的人“虽然一定要产生，但现今却尚未出现”。这样一个“稍稍的”转变，已经是等于不转变的了，而这篇小说之中的一切却连这个“稍稍转变”的原因都没有解释。惠后来发狂了，但是为什么发狂？在小说里所写的一切，并没有使他发狂的力量。总之，这个从虚无主义走到“光明在我们前面”的过程是找不着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三人行》的暴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失败了。

^① 李涵秋（1873—1923），江苏江都人。作家。著有《广陵潮》等。

第三个“人”是市侩主义。这在作者甚至于自己都没有觉察的。“三个人”之中的一个，云，就是市侩主义的代表。云是很切实的实际主义的人，他反对一切大道理，他主张“生活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些”。这是市侩对于人生的态度，坚定的打破了一切信仰的利己主义，不要多管闲事，不要多讲道理，要好好的勤恳的忍耐的下一番苦功，往上爬，总有一天出头的日子。这种所谓勤恳是不反抗的意义，所谓忍耐是顺从那些卑鄙齷齪的“社会律”的意义。这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的背面，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表演。虚无主义的目的本来就是要群众抛弃研究大道理的“妄想”，而各自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这也是市侩主义的基础。云的家庭是该着五十亩田的农民，有时候还能够雇用几个短工，即使不是富农，至少也是接近富农的中农。但是，我们就假定是这样罢：这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这是穷苦的，可是还能够过得去的小百姓。他们不在“夹攻”之中，因为革命对于他们只会益处，结算起来总是有益处的，不会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害处的。可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尤其是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生活，使他的眼界特别的狭小，他的志向特别微小，他的乡下人自以为是的自信力特别坚强，又在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笼罩之下，于是乎成为标本的不革命主义，——正是不革命，而不是反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阶层正在迅速的转变，而且不止一次，他可以转变过来又转变过去。反映这种转变，在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怒潮之中，的确是普洛[罗]文学的一种重要任务。这就要同时极有力量的揭发市侩主义。

然而《三人行》的作者却根本没有提出这个任务。第一，《三人行》的头几段简直是用云做正面的主人公，他的果断的坚决的口吻，劝告许的一些市侩主义的议论，差不多是句句要读者佩服他。直到他转变之后，他还是替市侩主义辩护，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尽管愚蒙，尽管顽固，可是当‘现实’的紧箍咒套上了他的头颅以后，他会变好，

例如我的父亲。”《三人行》的全篇对于“愚蒙顽固”的市侩主义并不加以鞭答的，而只不过认为是很可以变好的材料罢了。第二，就是这种变好的过程也是没有的。固然，云家里的田地被绅士抢去了，因此云要革命了。然而，在这件事以前的云是一个标本的市侩主义，一个绝对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他的革命性是突然出现的。关于他以前就模糊的认识社会改造的必要，只有后来的一句描写的句子，而在他以前的行动和言论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①而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

为什么？因为：一则《三人行》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的，单就三种人物的生长和转变来看，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二则这篇作品甚至于非现实主义的。

只有开头描写学生寄宿舍里的情形，还有一些自然主义的风趣。而随后，侠义主义的贵族子弟差不多是中国现实生活里找不出的人物；虚无主义的商人子弟又是那么哲学化的路数，实在是扩大的，事实上这种虚无派要浅薄而卑鄙得多；至于市侩主义的农民子弟，那又写得太落后了——比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和活的斗争落后得多了。甚至于几个配角，象馨女士和丫头秋菊，也有些“非常之人”的色彩。这篇作品之中虽然没有理想的“英雄”，可是有的是理想的“非英雄”。

而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反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占了胜利，很自然的，对于虚无主义无意之中做了极大的让步。只有反对个人英雄的侠义主义的斗争，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可又用了过分的力量。

如果这篇作品可以在某种意义之下算做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收

^①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语出《论语·述而》。

获，那么，也只在于它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在它的错误上更加提醒普洛〔罗〕文学的某些任务，例如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正确的运用起来，去对付敌人的虚无主义等等的迷魂阵。再则，就只有零碎的片段——揭穿了那些绅士教育家等等的假面具了。如果《三人行》的作者从此能够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罗〕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那么，《三人行》将要是他的很有益处的失败，并且，这是对于一般革命的作家的教训。

然而，茅盾在现在的一般作家之中，不能够不说是杰出的，因为他的思想的水平线和科学智识的丰富，超出于许多自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家”之上。

一九三二，三，十。

散 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读者杂记之一

房龙的《世界地理》，一本值得读第二遍的书，这样的书现在太少了，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它像一幅浮雕的壁书，把世界的各个区域的地势很生动的显现在你的面前。说这就是文艺的天才，倒不必，因为会了解自己的科目的人，总应当也会把它叙述给别人听，虽则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但是我还是以为这是一种义务。是不是呢？

可惜，房龙也同一切“前期”科学家一样，他虽然忠实于他的科学，但是更忠实于他自己，说得精确些——是更忠实于他自己的阶级。究竟跳得过“自己”的头的人是少极了。也许是自己不愿意，也许是几百年来因袭，像“马遮眼”似的遮住了他的眼光。

房龙在序言性的第二章里说：“假使日本的居民正是塔斯马尼亚族后裔时，这些海岛恐怕决不会养活六千万人民吧。又如不列颠群岛，如果它们的统治者不是来自北欧的人生战士，而是尼亚波利坦人或柏柏人，它们决不会变成庞大帝国的中心呢，”……假如广漠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主人不是斯拉夫族，而是日耳曼族或佛郎克族时，他们就会带了锋利的犁锄，尽力去开垦，这片平原的情形也就会迥然不同”。总之，似乎民族性在决定着一切。但是，你读完他的全本书之后，反而觉得瓦德的发明汽机，或是美国的建筑铁路，对于英美的发展更有决定的意义，究竟读不到为什么某某民族因为它的民族性，哲学，道德，宗教，而特别落后或是先进。你觉得，这些捞什子自然都在发生着影响，然而有了“犁锄”比没有“犁锄”就强些，有了些汽机，和没有汽机，

差别就更大了些，——不管那地方的民族的民族性是怎样，它总因此种种而在变动着。房龙自己的叙述打破了他的哲学。

因此，他不能够自信，他只能够存疑。“印度的一切问题都是深奥的道德问题和灵魂问题，”他说，“……它们常给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烦恼的迷惘……但最后，我还得承认他们是对的。他们纵然不是完全对，至少也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绝对的错。这是个很难的功课，但却教训了我一点谦逊。老天知道，我正需要它！”房龙是谦逊的，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学说，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学说”。读者还是帮着他“谦逊”一下为妙：读他所描写的——有时候描写得很活泼的——材料，不用相信他自己也说不圆满的学说。

印度人现在——尤其是最近五百年来——就只有心灵问题吗？有点不像事实。但是，这样的材料，在房龙的“地理”里就不容易找。例如第二十一章，题目是很“夸张”的：“大不列颠——荷兰对岸的海岛，五万万人民的保姆”。这“五万万人民”之中大概就有那三万万五千万的印度人在内，——不知我们中国的大英顺民是否也在其中？——可是，你在这一章里，一点也找不着“大不列颠”用怎样的奶汁在喂养那三万万五千万只有心灵问题的印度人的情形。还有其他的殖民地，埃及，英埃苏丹，缅甸，新加坡等等，他们究竟喝着英国绅士的什么奶汁，喝得胖到何等程度？自然，你可以在别几章里找到一点影子——关于印度是连影子也找不到，——然而清楚的回答是没有的。关于这个，还是到上海大马路上去，看看红头阿三的神气好。

关于中国人，房龙说了几句恭维话：“中国人……知道西洋各国对于孔子的书根本没有兴趣，其最注意的只是煤铁和煤油的让与权……如果要使财产安全，必须知道如何保护其自己的财产，否则最好还是将它们沉之海底。总之，中国已知道模仿日本的必要。”而关于中国的苦力呢，他说：“这些痛苦的劳工，无论谁来统治……俄国总会暗中在

他们耳朵里咕哝许多鬼话。”完了。不恭维的话，却是他指出孔子孟子老子三个圣人的理论，教训中国人“以公理报怨恨，欠账还钱，遵守信义和条约，纪念死去的祖先”。这都值得读者想想：究竟中国谁在想学日本，谁在“以公理报怨恨”，谁真正在“咕哝”，这是房龙分辨不清的，但是读者可以想想。

不过，照房龙想来，日本的夺取满洲热河，却有十足的理由：“日本锁住在小岛上，其人民生殖力……极其强盛，所以急需更多的土地。……有许多人似乎很愤怒，他们痛责‘日本的野心’，以为那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过我却反把这当作‘日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自私，无[毋]宁说是一种需要的美德。”这些话，不但对着满蒙问题说的，而且也关涉到高丽！

因为房龙迷恋着这样的“哲学化”，所以他对于这一类的地域，连描写地势和山川的兴致也没有了。读者可以读到的，只是一串说得很漂亮的“浪漫故事”和发松的比喻。

讲到他自己的国家——美国罢。不用说，他就在非洲等等，也看见许多白种人的“德政”。而在菲列宾那一章，他当然更要说：美国人“给菲列宾人无数修整的道路，数千所学校，三所大学，医生，医院，看护，人工孵卵器，鱼肉检查所，卫生学，以及一千零一种西班牙人听也没听见过的德政。可惜，那地方的人民却只知道等待天堂，“在那（天堂）世界中，一切卫生学……学校等，对于人是毫无意味的！”可惜！美国自己呢？它“所享受的这样无限的机会，大自然从不曾给过另一个民族……此外，历史再加上一件更重要的礼物：一种民族，一种言语，而没有过去”。固然，美国受过去——封建的束缚——比较少得多。但是，完全否认过去也是不行的。房龙自己也得提起一下“红人”，那是“由主位降到客位的红人”呵。至于说什么“一种民族”，那么，不由得要想起辛克莱的《屠场》；那些拉脱维亚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

黑种人，波兰人，那些“屠场”里，矿坑里的牺牲，不知道是否承认美国“只有一种民族”？！

房龙始终只是“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他没有丧失他的“自己”。

这《世界地理》还是值得读的，而且不必只读一遍。然而我——读者也庆贺我没有丧失我自己！

附记：《世界地理》的中国文译本不止一种，我读的是陈瘦石和胡淀咸两先生译的。偶然翻着傅东华先生译的一种，看中间的文句似乎深奥些，还发见【现】了这么一句：“再讲到猪，猪是靠橡实繁荣的。这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多瑙河，马其顿诸山脉间那个三角形中所以极富橡实的缘故，因为那三角形是密密盖着橡树林的。”再查陈胡两先生的译本，这一句却是这样写的：“说到猪，猪须食橡树果始得繁盛。亚得里亚海，多瑙河，与马其顿山脉间三角地带之所以多猪，就是因为那边密布着橡树林的缘故。”这里，傅先生是译做：因为猪繁荣，所以那地方富于橡实，又仿佛橡实的丰富是因为密密盖着橡树林。本来，因为鸡多所以鸡蛋多，因为鸡蛋多所以鸡多，——说来说去似乎都说得通。而陈胡两先生译的是：因为橡树多，所以猪多。这道理浅显些，没有那么重的哲学气味。究竟不知道房龙先生的原文是怎样的。过几时，倒要找本英文原本来读读。

一九三三，十一，十二。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的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他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

——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的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

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和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们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他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了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不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的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而现在，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自己

的乳母是野兽。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这样一直到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也发展了12月14日的人物，这是英雄的队伍，他们像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这是些勇将，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他们是活泼的战士，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赫尔岑）

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

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维新主义的老新党，革命主义的英雄，富国强兵的幻想家。他们之中，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

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也并不是没有，而且，似乎也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旧社会急遽的崩溃解体，这样，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和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则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层的萌芽，能够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智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

都是很宝贵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的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无可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重个人而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智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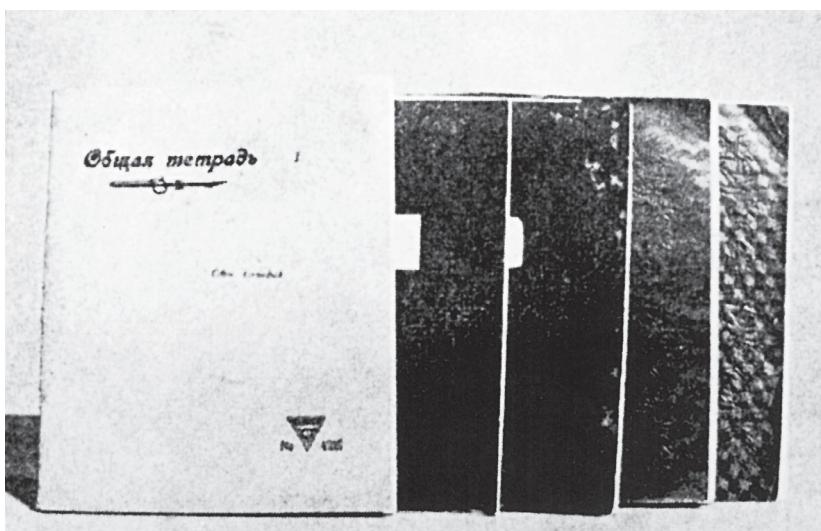
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只要看鲁迅当时的《摩罗诗力说》，他是要“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摩罗是梵文，欧洲人说“撒旦”，意思是天魔。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裴伦^①等等），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了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文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

在那时候——一九〇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浸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败了。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覆〔复〕，就是说，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等编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后也还不能够给民众自由，而要好好地教训他们几年。而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说，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这虽然也不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总有点不同罢，问题在于当时中国“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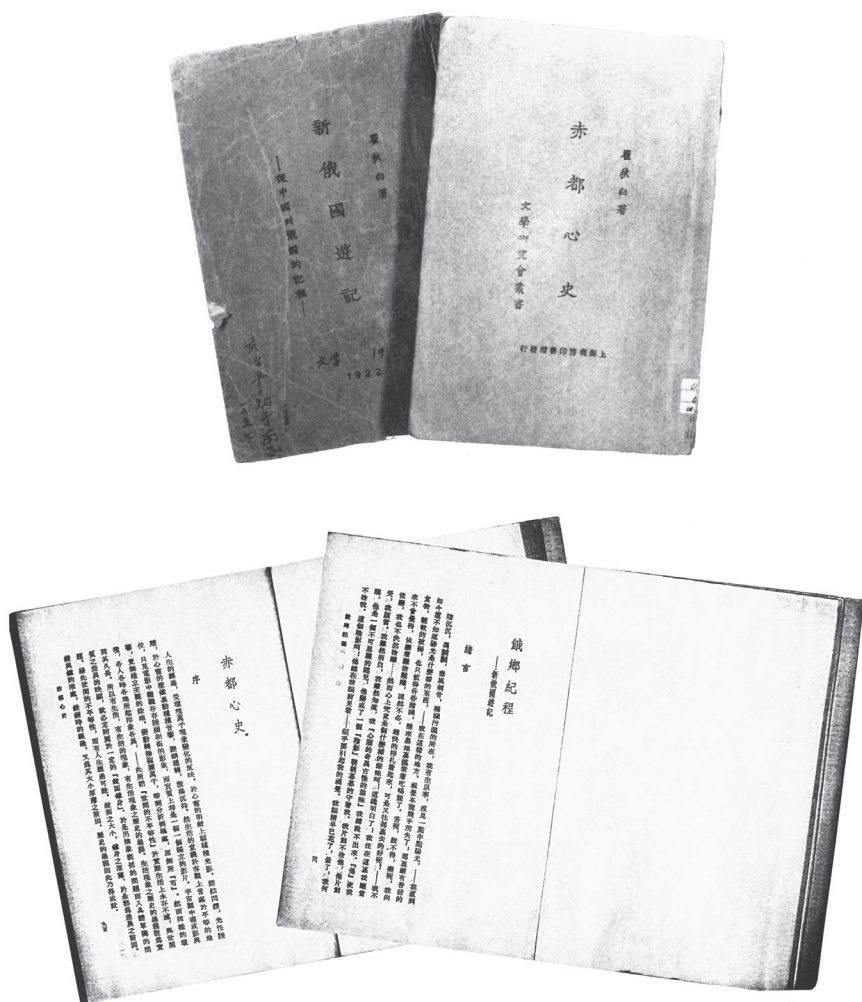
① 即拜伦。



瞿秋白著作的一部分



瞿秋白手记、手稿本的一部分



《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瞿秋白赴俄期间所写的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革命初期的情况，记录了自己受十月革命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饿乡纪程》，最初于1922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为《新俄国游记》，副题为《从中国到俄国的纪程》，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53年10月编入《瞿秋白文集》时，恢复原稿所题的《饿乡纪程》之名，以《新俄国游记》为副题。

《赤都心史》，192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暴风鸟的歌

瞿秋白译

洁白的海面平展着，风在吹拂，将世界吹亮。鸟雷和浪的冲撞，
像骤然的爆发，是暴风鸟，是闪电，是闪电。

他，一定用翅膀拍着波浪，一定在空中飞翔，一定在波浪中，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这风叫时是暴风雨，一面在波浪中飞舞，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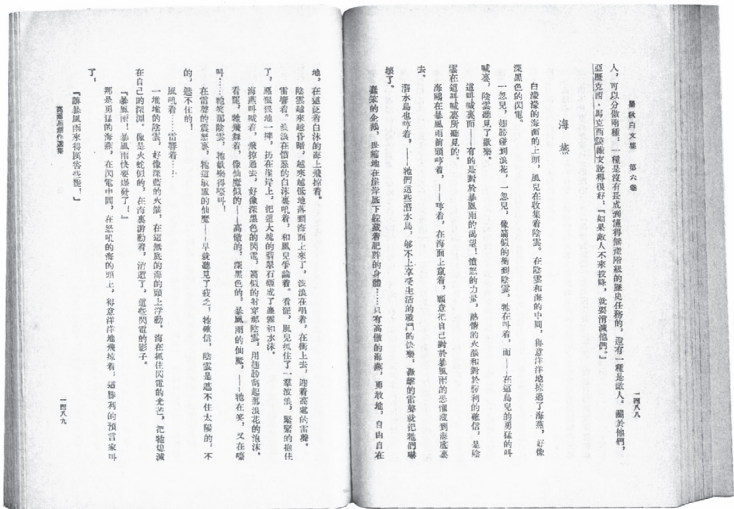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他一定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一面在空中飞翔，他一定
一面鸟雷一面波浪的飞舞，一定在暴风雨中飞舞。

《暴风鸟的歌》

《暴风鸟的歌》，高尔基著。瞿秋白于1920年至1922年间翻译，未发表。1930年重译时题为《海燕》。1933年编入生活书店出版的《高尔基创作选集》。



熱血日報

每份銅元一枚

發刊辭

洋，冷血。這是一股興風上海於上海人身上，還是現在上海市區的血管，已發久人的體能很得流於冷血，冷血是上學生工人們所流的血，已是把社會之路，民自由的血，民自由的爭鬥，不但上學民的熱血更起義的湧動着，並且是國人的熱血；時間上用現在人的熱血，引起燃起者的熱血。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血和熱心，現世界強盛者是有冷的鐵，而我們讀者只有熱的心的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心的將寒空中沒有雪的熱熱的血一日得著者，便是記者之末運。

敬告國人！

報特刊此目。

外國軍隊到處橫行

▲日海軍陸戰隊進行示威

▲美兵又打死工人學生

▲南北保衛團共推英兵之快樂

且日本外務省對於此項迫索之形勢頗覺不安，
 而由大馬路總領事館所派之警備隊約不敷，
 口日本人所留地之警備、日本之海軍陸戰隊亦往往
 來，雖是不足，然亦須酌量前赴駐紮，
 軍部、恐有不穩之患，故特作此動議，
 英美員中國人即訂一學生二工人警察打打，
 則之總有學生三、中國人衛隊、本欲拘捕其
 上則有學生三、中國人衛隊以其警備人非
 有違軍紀、當即派三英兵拘捕、押往關內候審
 將軍、觀者亦不反對、除開各處狀況、因各處
 海軍陸戰隊之來及警備之增加而人心愈感不安
 、風潮又有擴大之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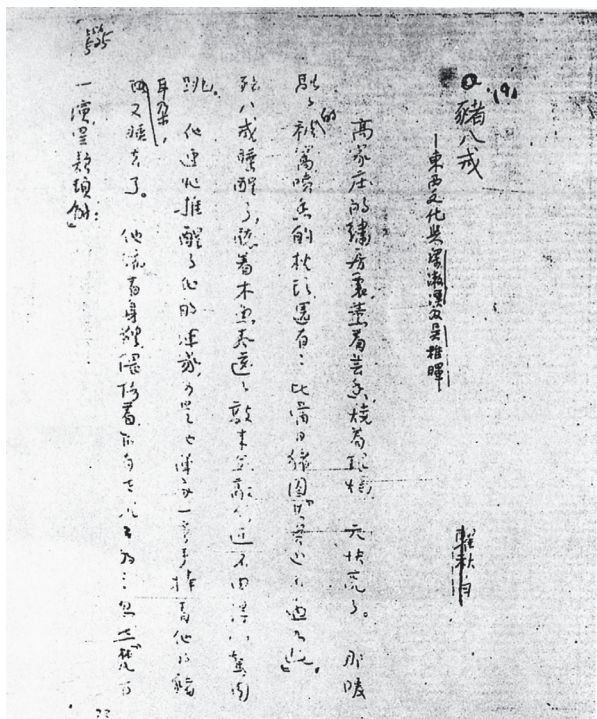
晉工部制之屈赴雲河

昨日蘇州罷工者又有二十八

▲美、英、德及瑞士工程已完工

昨日報載罷工者又有十八處，紛紛開會組織，粵閩兩省各多反抗租界當局運動，小沙灣各工之罷工者復有客罷工，日華、同興共計十四處，罷工工人所領者二千餘，中國人亦領者四處，罷工人數雖極其以上，現據某罷工學生云，已有三日，初二號當軍閥外人調閱軍，故未全罷，但至今日，二號罷工者復有增，已罷下

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发刊辞》为瞿秋白撰写。



《猪八戒》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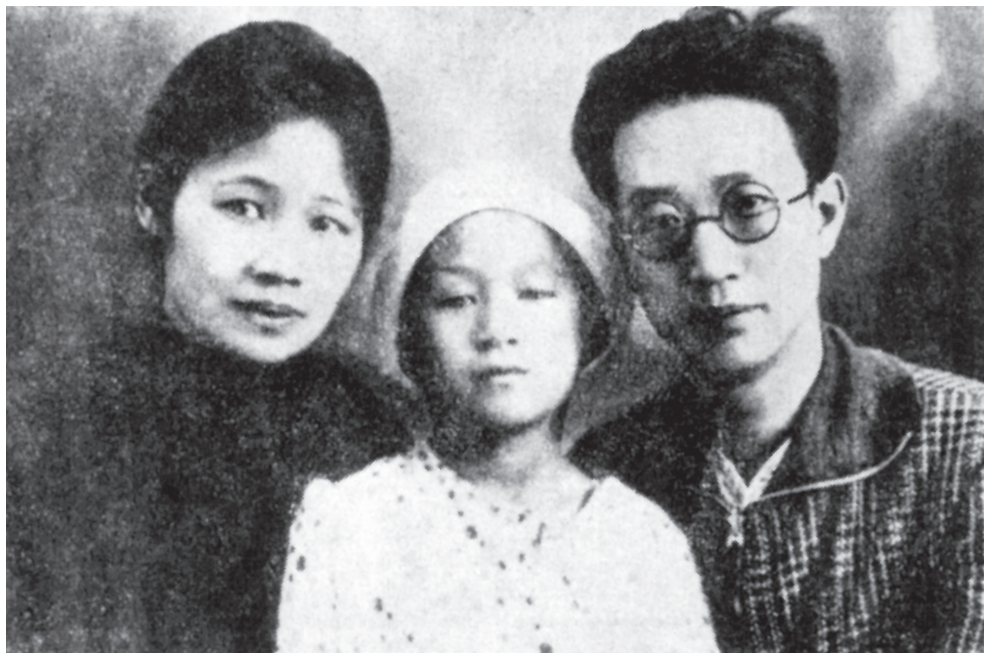
1923年11月15日，瞿秋白撰小说《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发表于同年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卷第5期。

抽利大酬勞各書無不說
 知市與不熟天資地望以心
 而變善之姓氏列下
 有餘聖廟方君始而萬
 公與行實前君始而萬
 五福聖五流前君始而萬

王道詩話

「你爲什麼許下誓的呢？」「我爲了要證明我的力量，我可以用我的力量來證明，不能使我的力量，爲我所利用，我可以用我的力量來證明，不能使我的力量，爲我所利用。」

瞿秋白和鲁迅商议,从1933年3月5日起,由瞿秋白仿鲁迅笔调,撰写了《王道诗话》等14篇杂文,经鲁迅修改,许广平誊抄,用鲁迅笔名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陆续发表。《王道诗话》是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第一篇杂文。



瞿秋白、杨之华与女儿独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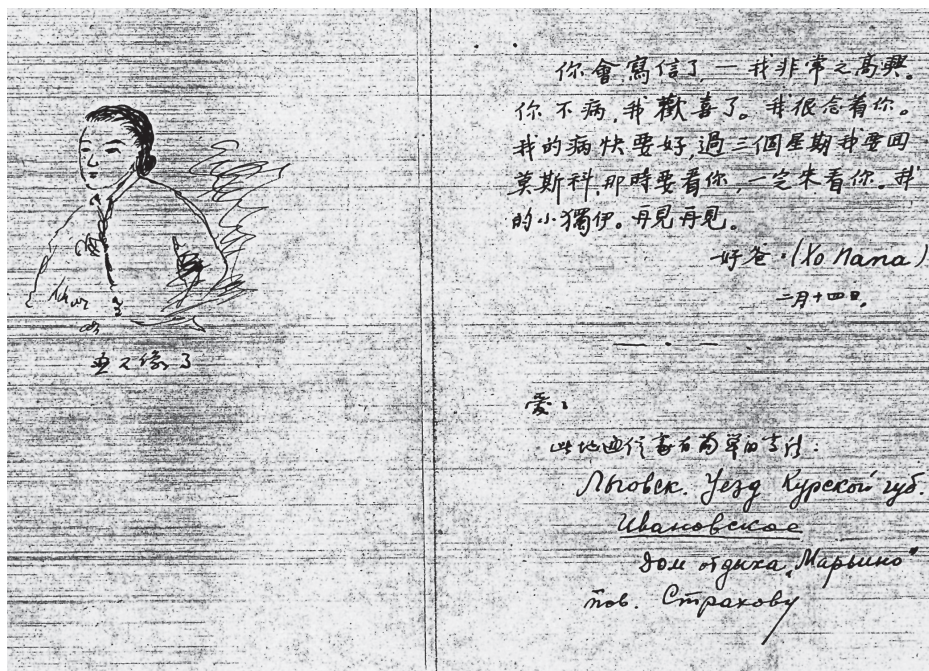
1929年，瞿秋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反法西斯同盟会回到苏联后，同夫人杨之华、女儿独伊在莫斯科合影。

好独伊，独伊！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许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淹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瞿秋白为女儿独伊题写的
诗文手迹

1929年3月15日，
瞿秋白为独伊题写了一首
小诗。诗中写道：“小小
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淹没
光明。看那沙场的血花灿
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
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瞿秋白写给女儿独伊的信

1929年2月，瞿秋白因肺病加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疗养。上图为2月14日给独伊的信。

论“胜利”，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

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他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说俄国文家科罗连珂的《末光》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书，书上有黄莺，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听说这黄莺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就只能侧着头想像那黄莺叫的声音。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呵。“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是已夫！”（《坟·摩罗诗力说》）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盔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种，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智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思先生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智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时候就开始的。我们说他的“参加”开始，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

辛亥之后，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并不是个个人都得到继续统治的是谁。鲁迅说，这是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

‘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而杀“现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尸。那时候还是完全的僵尸统治呵。

这些僵尸，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自然要竭力维持一切种种的国故：宗法社会的旧道德，忠孝节义和腐烂发臭的古文化。他们——好比“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坟·我的节烈观》）这些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节，一定要称赞烈女。而且为着保持自己的统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为活人总要想前进，青年总想活动，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般精神，然而鲁迅在这时代已经表现了他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①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

① 邹容《革命军》里自称“革命军马前卒”。

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举一个例说罢。白话运动初起的时候，钱玄同之流不久就开倒车，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言语”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不可以过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说明文章的好坏不在于文言白话的分别，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话好还应该懂古文。这样，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在运用“天才”创造新白话文的模范。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坟·写在“坟”后面》）“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坟”后面》）。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总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五四”前后，《新青年》的领导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张白话文学，——“理想”的浪潮又激动起来，革命的智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时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反动，——横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问题，是理想没有用处，革命的乱闹就是由于一味理想。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

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理会不到，那么，革命党本来就不要民众理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以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坟·杂忆》，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章士钊的走狗“现代评论”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奥妙。而鲁迅当时的《语丝》，革命

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针对着这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舔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的蝇屎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中不可少的阵线。

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约瑟夫^①）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要想稳定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②之类“开

① 指斯大林。

② 袁世凯称帝之前，曾收买当时名流学者劝进。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胡瑛、李燮和等六人，称“筹安六君子”。

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问题是在于要统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规则（《坟·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规则，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来。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铃铛……“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钊时代——五卅时代的陈西滢们，就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长了若干年，而他们现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经像生殖力最强的猪猡和臭虫似的，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子徒孙。当时——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他们的努力，例如剿杀“学匪”，或者请出西哲勒本霍尔^①来痛打女师大的“毛丫头”之类，总算不是枉费的。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伪主义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该被打而不做声（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起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

^① 即叔本华，德国的哲学家、悲观论者，极端轻视女性。

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能够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于文学家最深刻的“构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斗的同时开展；这又是新的阶段的更加严重的问题。而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卅”之后的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革命是在进到新的阶段，“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动物！就不再是请愿，不只是“和平宣传”，不是合法主义，而是……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此后的“血债”是越拖越多了。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而已集·题辞》

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这个转变完成之后不善于做戏的僵尸虽然退了位，而会变戏法的僵尸就更加猖獗起来。活人和死人斗争，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是的，以前“父与子”的辈分斗争只是前一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外套，现在——封建宗法残余的统治搀杂了一些流氓资本的魔术，——不但更明显的露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战斗，而且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也不再是纯粹的“父与子”斗争的形式。同时，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智识阶层，终于发现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

这样，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智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智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学运动——五四式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够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蹂躏革命“战士的精神和血肉……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这些流氓式的戏子，扶着几乎断送“死尸的生命”的僵尸，“稳定了”他们的新的统治。于是乎他们的鼓乐队里，就搀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的吴某某”等等，而偏偏还要说这是革命文学！这其实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低能儿（《而已集·革命文学》），这其实是段政府之下的陈西滢们的徒子徒孙。据说是段祺瑞等投降了“革命”，陈西滢们“转变了”方向，然而就社会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谁投降了谁，谁转变了方向，是大成问题的。这时候的新鲜戏法，只在于：“‘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只剩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丝杂感》）

“独木小桥”始终只是独木小桥。那些“扑通，扑通”掉下去的却学会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战略的争论。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

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这不但在日本，美国，德国，甚至于在苏联，也经过波格唐诺夫式的幼稚病。关于这种幼稚病，德国的皮哈曾经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的出现，只在这方面讲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

然而革命军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周围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离着。何况小资产阶级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呢。

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之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几千百年的痛苦经验之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概观》）然而，宽泛些说，这种文艺当然也是革命的文学。因为它至少还能够反映社会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应当注意的方向。而同时，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

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知〕识青年。这种智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的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这种典型最会轻蔑地点着鼻子说：‘我不是那种唱些有机的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赞美歌的人。’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是小资者，他受着战争的恐怖，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而发疯了，他歇斯替利^①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无产阶级而赞助它，另一方面又绝望地狂跳，在这两方面之间动摇着。”（乌梁诺夫）这种人在文艺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而很早“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们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暂时失败了，他们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极，有些叛变，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了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于是要“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

① 即歇斯底里。

《三闲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评创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的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倾向的争论。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候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然而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单说真有革命志愿的（像叶灵凤之流的投机分子，我们不屑去说到了），也大半纠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于酒量的问题。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

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

这是已经过去的问题了，也应当是过去的了。

鲁迅现在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

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碎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说：“他们^①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出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从满清末期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练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这种思想其实反映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

① 指老年的和青年的——作者原注。

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被剥夺了取得智[知]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厢]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像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我的旁观的所谓“科学”的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要感觉到他的燃烧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列的算式倒是不能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拚[拼]命的刻苦的干去，

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斯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萎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像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像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麝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人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如果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的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像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

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对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篇》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超越了全世界的纪录了。“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样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在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不过偏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作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一九三三，四，北平。

猪八戒^①

——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高家庄的绣房里，薰着芸香，烧着银烛。天快亮了。那暖融融的被窝，喷香的枕头，还有……比当日猪圈“其实也不过如此”。猪八戒睡醒了，听着木鱼声远远敲来，愈敲愈近，不由得心惊肉跳。他连忙推醒了他的浑家，可是他浑家一弯手捧着他的猪耳朵，又睡去了。他缩着身体偎倚着，亦有些沉沉的……忽然“梵音一演，异类顿解”：

——“猪八戒，你这畜生，怎么如此沉迷不悟！”——他听着似乎是他师父唐三藏的声音。——“西天的途程……且不说。一切爱恋六尘^②，以至于‘真美善是没有的，是幻执的。变起来只有苦趣。若妄执了再变下去，叫众生愈加的沉沦在苦海。不如反到漆黑一团，虽说不到真美善，也就看不见伪丑恶。倘嫌漆黑一团气闷，不如努力把漆黑一团都灭绝了，成个正觉’^③，得证涅槃^④。你尽在此流连忘返[返]，如何是了！？……”

他听一句，点一点头，似乎很有味的，谁知他点头不是领悟，是在打盹。早已睡熟了。唐僧没法，蹒跚踟蹰，捧着破钵不住的在他洞房前茜纱窗下走着，好没意思……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第一集第五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② 六尘，佛教用语。系色、声、香、味、触、法的合称。

③ 正觉，佛教用语。指成佛。

④ 涅槃：佛教名词。梵文 Nirvāṇa 的音译，意即“圆寂”，“入灭”，佛教徒视作寂灭一切烦恼的最高境界。

十万八千里外，忽然一朵筋斗云，从空翻落，原来是孙行者。大声的喝道：

“蠢猪。老孙叫你上西天去，你逗留在此地做甚！……哼，我告诉你，舒服不是在被窝里求的；真舒服须得真痛苦去换来。你道真善善没有？——那是因为你睡着。‘真善美是有的，是无穷的，变起来终能较真又真，较善又善，较美又美。向前不歇的变下去，很好顽〔玩〕。从当初漆黑一团，变到现在的局面，虽极不满意，却正好再变。这变个不歇，并非多事。下棋人常有的事：——下得最好，也不恤随手乱却，检入子盒，从〔重〕新再下。’你却走了一程，就已经灰心丧志，堕落至此。老孙没有别法对付你这蠢货，——你这怕变动的蠢货！我只有……”金箍棒一晃……

只听得豁朗一声——茜纱窗打得稀烂，琉璃瓶摔得粉碎……

猪八戒猛然惊醒，——原来一句话也没听见，——直吓得浑身急汗，簌簌的颤抖。他浑家忙着抚他的猪头，吻他的大耳，扑着他睡觉，口里念着二十世纪的《新中庸》，——定定他的心魂：

……数千年中国人的生活，除孔家外，都没有走到其恰好的线上。既非西洋又非印度。所谓第二路向固是不向前不向后，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而只是容忍与敷衍者。中国人殆不免于容忍敷衍而已，唯孔子的态度全然不是什么容忍敷衍，他是无入不自得。唯其自得而后这第二条路乃有其积极的面目。亦唯此自得是这第二条路的唯一的恰好路线。我们第二条路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一切容让忍耐敷衍，也算自为调和，但唯自得为真调和耳。……（梁漱溟）

猪八戒听着，知道这是“东西”哲……但是他想道：“那就对了呀！不向前，不向后！师父叫我向后去，一切绝灭，——那多么冷静。

混蛋的孙猴子叫我向前去，——那多么艰难。唉，始终还是中庸之道好。……”他不由得伸一伸懒腰，念道：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无君子无以治小人。”^①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篇小说里，凡是‘’记号里的话都是抄袭吴稚晖先生之《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见《太平洋》杂志第四卷第三号；——“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作者志。

^① “君子之中庸……”，语见《礼记·中庸》。

美国的真正悲剧^①

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现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文坛所公认的大文学家了。但是，德莱赛的成名是很晚的。美国的资产阶级一向自以为“荣华富贵”，了不得的文明国家。对于德莱赛这类揭穿他们的黑幕的文学家，老实说是有点讨厌。但是，德莱赛自己虽然从不去追求什么声望，然而他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无穷的光彩，始终不是美国式的市侩手段所掩没得了的了。现在，大家都不能够不承认德莱赛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他的一部伟大的著作《美国悲剧》新近已经摄制了电影片子，甚至于中国的上海都已经开演过。自然，美国的资产阶级的电影界会把这种作品糟蹋得不成样子，以至于德莱赛不能够不提出抗议。可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付德莱赛的手段，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今年七月间光景，他到美国的煤矿区里去了一趟，他在那里所遇到的事情，所看见的情形，简直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他去的煤矿区是美国宾息尔法尼亚省^②（Pennsylvania）和沃海欧省^③（Ohio）。那地方四万多矿工宣布了罢工，已经有几个月了。美国的几个煤业公司联合了起来反对罢工工人，斗争正在紧张的时候。在这煤炭大王的王国里，德莱赛住了几个礼拜，住在那种山谷中间的小房子里，亲眼看见矿工的痛苦生活，听见了许多矿工和他们的老婆

① 本文最早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在《北斗》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陈笑峰。

② 宾息法尼亚省，即宾夕法尼亚州。

③ 沃海欧省，即俄亥俄州。

儿女的诉苦；和工头，警察，兵士，审判官谈过许多次话。他回来的时候，有新闻记者去问他，他的手都发着抖写了几句话：

“我观察了美国几十年，我自己以为很知道美国。可是，我错了——我并不知道美国！……”

这是多么惨痛的愤怒的呼声！中国的留美博士，像胡适之，罗隆基，梁实秋之类的人物在《新月》上常常的写什么美国差不多人人都有汽车，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比不上英美的家畜猫狗。他们自以为很知道美国了！可是，现在美国生活描写的极伟大的作家德莱赛告诉我们，他尚且错了。自然，宁可做英美家畜的人，是不会像德莱赛这样认错的。

德莱赛还没有把他在宾息尔法尼亚煤矿区看见的听见的写出来。他正在写着。他已经对美国资产阶级严厉的申明：“我不能够不做声。”他现在要写的正是第二部《美国悲剧》，真正的美国悲剧。德莱赛始终看见了懂得了这个美国的真正悲剧。德莱赛亲眼看见所谓不偏袒的美国式的民权主义的官厅，他们的宪兵的铁蹄是怎样蹂躏面黄肌瘦的一群群的女人，他看见这些女人手里抱着的小孩是多么畸形，多么瘦得可怕。德莱赛对一个新闻记者诺尔茨说：

“要看见这样的情形，方才能够写第二部的《美国悲剧》。”

德莱赛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他看见了那些对着没有武装的工人群众扫射的机关枪，他看见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他看见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工人纠察队防备那些破坏罢工的人闯进矿坑去开工；这些破坏罢工的人，是资本家到别的地方去招来的。他还亲自受到所谓不偏袒的宪兵的威吓和教训。

在亚列克森州的一个小城市，叫做霍尔宁的地方，德莱赛去问一个宪兵：全国矿工总会的领袖菲列普史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忽然失踪，为什么一点儿消息也打听不出来。——这个菲列普史是工人群众很敬重的一个领袖。那个宪兵足足有六尺高，腰里带着很大的一枝

[支] 手枪，他看都没有看德莱赛，只当不听见。德莱赛又问了一遍。

那宪兵吐了一口口沫，眼睛朝着天就骂起来了：

“滚你的蛋。你要知道他干什么？！”

“看看你们这些专制魔王的蠢相！还是矿工的经费养活这班东西呢。”

那宪兵没有懂得德莱赛的话，可是，他大概觉得这总是讥笑他的，他就大声的嚷着：

“你再不闭起你的鸟嘴，我立刻送你到铁笼子里去。”

那枝[支]很大的手枪已经对准了德莱赛的鼻头。

“把我送进铁笼子里去？为什么？为了我问了你一句？”

那宪兵把德莱赛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眼界倒也不小，到处都去过，什么都见过。虽然德莱赛穿的衣服普通到极点，而且满身是煤和灰尘，可是德莱赛的外表始终有点儿和“灰色畜生”的矿工不同，所以那个宪兵觉得这一次不大对劲。要是个普通的矿工，那就可以随便的逮捕，拷打，践踏。那个宪兵大概想了一下：“知道这家伙是谁！也许是官厅或是公司里派来的。”

“你是什么人？”他已经比较的客气一点的问了一句。

德莱赛就说了自己的姓名。那宪兵的脸上，一点儿也没什么别的表示，他只是很高兴的说了一句：“也许那个昏蛋菲列普史坐在亚列克森的监狱里呢。”

德莱赛又碰见了亚列克森的典狱官詹姆士·康。这位康先生是欧战时候的军官。他听见大文学家德莱赛到他办公室来见他，简直发慌得不得了，表示许多假意的殷勤。

殷勤的康先生露着两个门牙，像狗似的嘻着嘴，油光满面的笑着。他否认矿工的一切痛苦和艰难。他否认警察的一切暴行。他一切都否认。

“德莱赛先生，你相信我的话，这都是没有的事。我自己也是个矿工的儿子，我知道他们的脾气。他们总是唉声叹气的。他们这样惯了。

现在更加放纵了。德莱赛先生，法律总是法律。法律是要尊重的。他们这里的人可不肯尊重法律。这样，就有的时候要出一点小事情。……你说起矿工有组织纠察队的权利……让他们在矿坑边逛好了。可是，德莱赛先生，等到他们要破坏私有财产的时候，那就只能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不好。”

那个典狱官的秘书，很起劲的要想帮助康先生说服这个危险的文学家，证明警察没有什么暴行，他拿了一枝〔支〕旧枪放在德莱赛的面前。

“德莱赛先生，你看：我们只不过用这种没有用处的枪朝天放放罢了！”

“可是，用这种‘没有危险的枪’，居然打死了那个矿工齐迦里克！”德莱赛反驳他们。

典狱官在自己的脸上装出一副真挚的生气的神经：

“这是访员造谣。”他很坚决的声明，“我们方面的人，谁也没有打死齐迦里克。也许是他的同志之中有人把他打死的。”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做作，太虚伪了，所以他的秘书马上加了一句：

“我们特别检查了一次，先生，我们方面的人，谁也没有罪过。他们都是很正直很直爽的人，先生。”

德莱赛只有向他们鞠躬告辞了。

典狱官还特别加了几句话：

“你在你的将来的小说里面，一定要描写我了。你相信我的话，我不但是一个保卫法律的人，而且很喜欢艺术和书籍。你看这幅画。”他用手指着墙壁上挂的一幅很大的画。

那幅画据典狱官说，是画的基督劝告一个有钱的青年把自己的财产舍施给穷人。

“我每个礼拜天都到学校里去给小学生讲《圣经》。这是我买了要

送给他们的礼物。”

德莱赛给他们说：所以这些事情，他都记在心上。我们大概可以在德莱赛的将来的小说里，看见这一位典狱官的尊容。他真是一只假道学的野兽，煤炭大王的走狗，他手里掌握着几万工人的性命。这几万工人的血汗差不多已经榨尽了，穷苦绝望到极点了。

德莱赛看见了这些工人。他住在他们的家里，吃了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的面包，不知道是用什么草掺在面里做的，一半是面，一半是草屑。他亲自看见警察对着工人群众开枪。工人是去阻挡破坏罢工的人到矿坑里去。警察开枪的时候，打死了两个工人，十九个工人受了重伤躺在路上，还有警察放着流眼泪的毒气炸弹。他亲眼看见宪兵的马队践踏女人和小孩子，他在一个矿坑的口子边，看见女人身上的马蹄的印子。

工人都被公司里的人赶了出来，不准再住公司的工房，他们住在山窠里的洋铁篷里，住在马厩里，住在木棚里。他们留德莱赛住在他们家里，给他讲他们的生活。

德莱赛问一个工人：

“你在矿里做了几年了？”

“二十三年。我是美国矿工工人联合会的会员。”

“这是黄色工会（注：被资方收买的工会）呀，你知道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别种工会在这个区域里又没有。”

“你赚的工钱也有时候可以够用吗？”

“从来也没有这种时候！我有四个小孩子。我总是不够的。”

“罢工以前，你的工钱是多少？”

“二十四块美金一礼拜。可是一分现洋也拿不到手的。十三元七角扣了做房钱，自来水和电灯的钱。其实工房并没有电灯。其余的钱，都是发的一种票子，只能够到公司办的商店里去买东西。”

“这种票子是不是和现钱一样价钱呢？”

“没有这么一回事。把这些票子打了八折卖出去，换了现钱到别的店里去买东西，还可以比煤矿公司商店里多买得多呢。”

“你们组织纠察队的权利，常常被破坏吗？”

“警察差不多天天开枪打我们，用马冲散我们，还要放毒气炸弹。”

“你们罢工已经有多少时候了？”

“两个半月。”

“还有多少时候可以支持呢？”

“如果外面有帮助来，准备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

德莱赛自己说这一类的谈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对于他的小说可以有极大的帮助。这部小说将要是美国整个资产阶级的罪状。

德莱赛已经和资产阶级的美国决裂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他这样的艺术家，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文学家。

但德莱赛，却像一只老象，它在树林里走着，“一直向前，踏倒它路上的一切东西，随便什么也不能够引诱它走到旁边去”（辛克莱说的）。现在的德莱赛是个六十岁的婴儿，他的斗争已经不是孤立的了，已经是在一个新的立场上了，他的勇往直前的勇气应当比以前更加强了。

世界上有许多人等着要看他的第二部的真正的美国悲剧，当然，也就有些人听见这个消息头痛呢。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五。

美国的“同路人”

对于我，文学的基础是关于勇敢，恋爱，死亡底【的】绝对个人的简单的猜测；这些勇敢，恋爱，死亡，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的关系；外表【部】世界的制度里发生什么变化，又一点儿也不会关涉到它们。我所深切的爱好的诗意，图画，或是音乐，无论怎么样也不会帮助或者妨碍社会的改革——而我对于这种改革，完全和你们一样，也认为是应当的。我所特别尊重的文学是在研究个人的心灵底【的】问题，而个人的心灵在时间和空间，希望和恐怖，爱好和憎恶底【的】神秘之中活动着；这些东西，只要人还是人，大概是不会变更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现代的科学解释里面，不会有任何主要的改变。糖始终是糖，友爱始终是友爱，而死始终是死。

……趁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被庸众所吞没的时候，让我们来公开的谈谈。即便一分钟也是好的，我深信：庸众痛恨你们，和痛恨我是一样的；庸众的心灵的深处，是愿消灭一切私人艺术家，一切 **experimenter** 的，——理由是很有根据的很充分的：就是这些艺术家以前都是，将来也永久是孤独的，反社会的，总有点儿“精神上的贵族”底【的】轻蔑的神情的。这可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很明显的，庸众对于这个事实是非常之痛恨的。因此，我倒觉得很有趣：——总有一天“Left”杂志的编辑和我自己要一同排列在同一座砖墙的墙脚边，面对着武装的队伍，而一齐被枪毙，——枪毙的理由虽然各不相同，可是都是很有根据的呢。

希望你们现在健康，——我和你们在墙脚边相会吧。

——Arthur Davison Ficke

这是美国“Left”杂志上登出来的一封来信，签名的是费克，是个自命为作家代表的人。

“Left”季刊是美国同路人的杂志。

但是，那费克虽然自己说是赞成“社会改革”，虽然自命为作家代表，可只是所谓“同路人”^①罢了，所谓“作家代表”罢了。“Left”自己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Left”的错误是在于登载了费克的来信却没有给他相当的批评。“International Literature”^②杂志对于这件事情发表了意见，认为“Left”的编辑委员会对于费克的来信没有指出他的政治目的，甚至于一句话也没有附加就给他登出来——是很不好的。

费克的态度是什么？对于中国的读者，这倒并不是新鲜的事情。

费克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态度。现在，资本主义的一般恐慌，促进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的速度，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的广大的阶层，转变到革命运动方面来的，一天天的多起来；所以军事化的资产阶级，它的法西斯蒂的奸细和社会法西斯蒂的奸细，在文化战线上拚[拼]命的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想要夺掉无产阶级的新的同路人，新的同盟军。费克故意挑拨，离间，造谣，诬蔑，他要在美国的革命的智识分子之间，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名誉，他故意要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始终不是文学，无产阶级不要文学；他轻蔑群众，甚至于

① “同路人”，一九二一年前后苏联文艺评论界用以称呼以“谢拉皮翁兄弟”命名的文学团体为代表的作家，意思是说，他们虽主张作家不问政治，但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同走一段路。

②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杂志，即《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在莫斯科出版。

认为轻蔑群众是创作的“必要条件”，说群众的干涉主义会要枪毙一切“私人艺术家”……——这就是那种斗争的一种方法。

这是借着“同路人”的名义来挑拨真正的同路人反对革命。

十一，八。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①

——写在《萧伯纳在上海》的前面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工〕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做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在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

但是，真正欢迎他的，不是这些低能儿。事前的“欢迎者”，各自怀着鬼胎，大家都想他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话。而事后一些“欢送者”，就大半瘟头瘟脑——大失所望。“和平老翁”，变成了“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了。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掳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反对那些干文字游戏的虚伪“作家”，

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鲁迅家暂住，时逢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在鲁迅的建议下作者收集各报刊上对萧伯纳的各种评论，编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用鲁迅笔名乐雯出版。此文即卷首语。

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他战胜着自己身上的旧社会的玷辱和污点。他并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误的“主义”和“思想”上，而昧着良心来诅咒新社会的产生。他只见到过“改良”，而事实却是“革命”，他没有因此就恼羞成怒；相反的，他立刻向着“革命”开步走。于是乎那些卖人头的，都噓噓噓的“欢送”他。

所以真正欢迎他的，只有中国的民众，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麼“革命的领袖”，“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更不会当他是偶像。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

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麼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一九三三，二，二二。

慈善家的妈妈

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不用说，这是一位伪善的人道主义者。他周济着一班穷光蛋，有机会就叫他们做工，拔草呀，车水呀，扫除马粪呀，修理屋顶呀。穷光蛋们只知道感激他，向从来没有想到问他算工钱。其实，要是算起来的话，决不止一件破棉袄，几碗稀粥的。他倒沾着便宜，还得了善士的名声。后来，这西洋镜有点儿拆穿了。

但是，这时候来了一位侠客，雄赳赳的，手里仗着一把宝剑，据他自己说，这是“切西瓜”用的。他说他看透了那位慈善家的虚伪。他愤恨极了，就跑上慈善家的大门，破口大骂了一通，还拔出宝剑来说：“我要切你的西瓜！”一些穷光蛋反而弄胡涂了：为什么慈善家的头应当拿来当西瓜切。问问侠客，侠客说：

“吓，吓，吓，……他，他，我丢他的妈，他妈跟我睡觉！”

“他妈跟你睡觉，他又该当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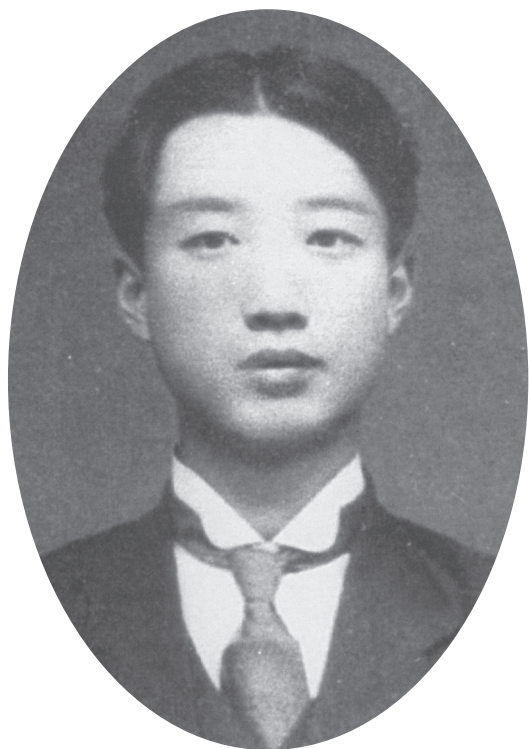
“他，他，他昏蛋极了……我，我□他的祖宗！……该杀的东西！”

侠客实在愤激得说不清白什么理由。侠客以为只要话说得“粗鲁”些，穷光蛋就会懂得。然而他们不会了解慈善家的“妈跟人睡觉”，慈善家自己就立刻该杀；他们更不明白“该杀”就等于伪善的“凭据”。侠客自己的胡〔糊〕涂，要害得穷光蛋们更加胡〔糊〕涂，甚至于更加同情那位伪善家。

慈善家的虚伪，和他妈的不贞节或者恰好跟那位侠客睡了觉，是

完全不相干的。穷光蛋们自己里面的明白人，应该详细的说明慈善家虚伪的事实，说明这世界里的种种假面具。

对于这样的慈善家，像侠客那样的手段是不行的，何况对于比慈善家更细腻的人物呢。



瞿秋白

1921 年摄于莫斯科。



八桂堂天香楼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青果巷八桂堂内的天香楼。

瞿秋白的卧室兼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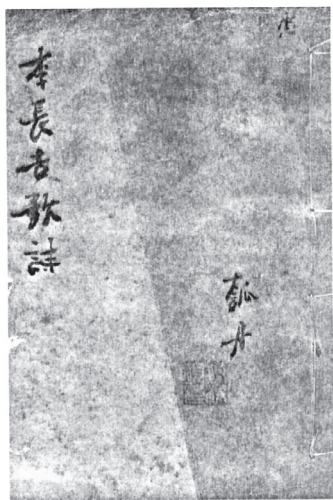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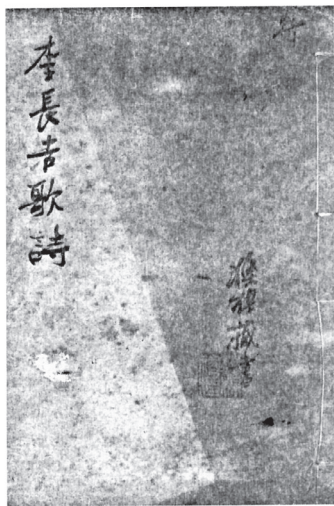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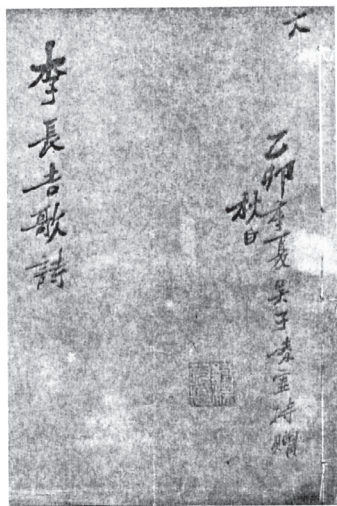
上海兴业里一号

1924年12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海大学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瞿秋白寓所，瞿秋白书籍被焚。当时瞿秋白已秘密转移到北四川路兴业里1号，继续坚持工作。当时他对杨之华气愤地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



萧伯纳与鲁迅、宋庆龄等合影

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剧作家、评论家。1933年,他乘船周游世界,2月17日抵上海,曾与鲁迅等在宋庆龄寓所会见并合影留念。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瞿秋白藏书《李长吉歌诗》

瞿秋白藏书《李长吉歌诗》，一函四册，王绮编注，上海文瑞楼石印，宣统元年（1909年）秋出版，线装有光纸本。每册封面左边都写有“李长吉歌诗”的书名，右上角分别写有“文”、“行”、“忠”、“信”字样编次。第一册上题有“乙卯季夏吴子凌虚持赠”十字，署名“秋白”；第二册上署“漆梅藏书”；第三册上署名“孤舟”；第四册上署名“秋白”。每册署名下均盖有红印泥“铁梅珍藏”篆体白文方形印章。“乙卯”，即1915年。“季夏”，阴历六月。“吴凌虚”，即吴炳文（1898—1975），号凌虚，宜兴人，瞿秋白中学时的好友。“漆梅”、“孤舟”、“铁梅”，均为瞿秋白的别号。

瞿秋白先生殉難一週年紀念

紀念瞿秋白先生

「秋白先生殉難一週年紀念」已一年了。這一年來，我們經歷了許多悲劇，但我們不能忘記，在這些悲劇中，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秋白先生的殉難，是我們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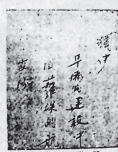
瞿秋白先生傳略

傅 明



瞿秋白先生肖像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瞿秋白先生肖像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秋白先生，原名瞿鴻禨，字秋白，浙江餘杭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死，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救國時報》紀念專刊

1936年6月20日，《救國時報》第37期出版《瞿秋白先生殉難一週年紀念》專刊，發表了《瞿秋白先生傳略》等文章。



纪念瞿秋白诞辰九十周年邮票



纪念瞿秋白诞辰九十周年首日封



宋庆龄与杨之华等合影



周恩来、邓颖超与杨之华合影

瞿秋白牺牲后，夫人杨之华、女儿瞿独伊，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图为1948年周恩来、邓颖超与杨之华合影。

鬼脸的辩护

——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胡秋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不想在此地来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关重要。问题倒发生于鲁迅给《文学月报》一封信说“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而署名首甲，方荫，郭冰若，丘东平的四个人就出来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现代文化》杂志第二期）。

首甲等对于恐吓和辱骂的辩护是：

（一）“革命的工农确实没有吓人的鬼脸”，然而“这是对某一阶级同情者说的，对别一阶级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恐吓“有什么不可以？！”

（二）“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而且也无‘笑骂’与‘辱骂’的分别。只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并不是‘丢那妈’就是辱骂，‘叭儿狗’就是笑骂。……”

这是说恐吓和辱骂也算战斗，而且不这样就会变成“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革命当然要流血的，然而嘴里喊一声“斫你的脑袋”还并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况文化斗争之中，就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也要在“流血”的过程里同时打碎他们的“理论”的阵地。当你只会喊几声“切西瓜”的时候，就要被敌人看做没有能力在理论上来答辩了，而一般广大的

群众并不能够明白敌人“理论家”的欺骗。国际的革命思想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来战胜反动思想和欺骗的理论的！这种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剥削阶级明明知道革命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不是吓人的鬼脸，而他们为着要吓退正在剧烈的革命化的群众，故意要造谣，污蔑，诬陷。敌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杀人”之类的谣言，正是要把这种鬼脸硬套在先进的工农头上，——敌人的可恶就在于他们故意把只对于自己有害的革命说得像魔鬼似的，仿佛要吃尽一切活人。现在有人出来多喊几声“斫”和“切”，那就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首甲等的说法是：对于剥削阶级，革命反正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多扮些吓人的鬼脸，“有什么不可以！”这对于革命的队伍是极有害的空谈。革命的工农不能够不宣布首甲等的意见决不是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至于“丢那妈”之类的辱骂，那更是明显的无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认为革命的贩卖手，但是他们却喜欢和胡秋原较量骂人的本领。胡秋原骂什么“人首畜鸣”，“人类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说骂“丢那妈”“并不比胡秋原……更为无聊”。何以胡秋原无聊，而首甲等就拥护同等无聊的回骂呢！？他们说：“伊里奇在许多理论著作上，尚且骂考茨基为叛徒。”然而“叛徒”和“丢那妈”是绝对不同的。“叛徒”有确定的政治上的意义，而且考茨基的的确是叛徒。而芸生的“丢那妈”，却不会损害着胡秋原反动理论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我们分析某种论调，说它客观上替剥削阶级服务，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这些“理论家”比做“走狗”，“叭儿狗”，——这都有确定的意义的，虽然是笑骂

的字句，而表现着批判的暴露的意义。至于“丢那妈”，以及祖宗三代牵缠着辱骂，却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些无能的“气急”。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自己用社会的舆论的制裁克服这类的恶习惯，认为这是文化革命的一种任务；而首甲等，自命为负起文化革命责任的人们，却以为必须这样辱骂才不右倾！而且还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在理论的战斗之中，无论对于什么人，无论是保皇党，是法西斯蒂，这种辱骂都不会是“适当”的。这固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暂时，在下层民众受着统治阶级的文化上的束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口的把这种辱骂当做口头禅，——然而“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钞〔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

首甲等自己说，要“以尖锐的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然而他们在自己所拥护的芸生的诗篇里，却只举出“丢那妈”作为尖锐的词锋。他们说普洛〔罗〕文化运动的任务不应当降低，说“我们的诗人”应当与斗争的实践联系。但是，他们所谓诗和斗争之间的联系却只是写几句“切西瓜”之类的句子。这种恐吓和辱骂显然不能够揭穿什么奸细的漂亮外衣，显然反而降低了普洛〔罗〕文化运动的任务。他们拥护这样的立场，也就不会有“健全的阶级意识”。的确，他们的立场是离开真正的战斗，而用一些空洞的词句，阿Q式的咒骂和自欺，来代替战斗了。

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希望首甲等不单在口头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能够正确的了解和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王道诗话^①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②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讲演一次，何将军^③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大概就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

① 本文以及后面的12篇文章均为作者在鲁迅家居住时用鲁迅的笔名在上海《申报》等处发表的。

② 《人权论集》，胡适等“新月派”文人论文集，1930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在书的序中，胡适引用鹦鹉救火的故事，用以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卑躬屈膝的苦心。

③ 何将军，即何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

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祖传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街，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柯，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一九三三，三，五。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成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得救了似的。

其实那不是她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是败亡的预兆。其实亡汉的何尝不是女人！总之，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同意女人，我们就知道高等阶级的地位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什么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要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正人君子骂女人奢侈，板着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的欣赏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拉伯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典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女人的奢侈是怎么回事？男人是私有主，女人自己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她也许因此而变成了“败家精”。她爱惜家财的心要比较的差些。而现在，卖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就

听说上海的时髦总是从长三堂子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少奶奶，太太，小姐。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竞争——极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自然，她们就要竭力的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的代价，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我们的老婆就要使我们破产，较工人来没收我们的财产要早得多呢，工人他们是来不及的了。”而中国也许是为着要使工人“来不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供节俭的。

一九三三，四，十一。

真假董吉诃德

西洋中古时期的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董吉诃德那样的蠢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也只觉得他可怜可笑。

然而这是真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是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柄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变成了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注解，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变成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变成了征讨当时的革命军的军需。现在这套把戏实在太欠新鲜，谁不知道。——不然的话，还可以算是新发明。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老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什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

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牛马猪狗身上去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是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而小百姓做了牛马猪狗仍旧要负“救国”责任。结果自然应当拚〔拼〕命供给自己身上的肉给假吉诃德们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了（挂出去）示众，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万遍“不仁不义”或是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三岛）的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偏要高喊“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朗诵“唤起民众”而杀之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其实“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①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笑不出哭不出；你要认真和他辩驳，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一九三三，四，十一。

^① 菲希德，德国哲学家。

透 底

凡事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就像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的一丝不挂。

反对八股是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最初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用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格式；拿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随后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原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不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还奖励你，说打倒“打倒偶像”者，透底之至。这样，世界上就剩得偶像和打倒“打倒”者。

开口诗云子曰，算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在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一通物。……这自然透底之至。其实，从前说反对卫道文学，原是反对那道，说那样吃人

的“道”不应当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有下列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僵尸直立着，喉管透出一股气来，仿佛是在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

一九三三，四，十一。

中国文与中国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偪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订〕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

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①——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① 语见《庄子·齐物论》。

关于高尔基的书

——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

……想着，也许这是——一本好书，诚心诚意地写了的，不少人读着它而感动了，争论了，学习了思想；也许，它用新的思想使得一些人丰富起来，用自己的温暖使得许多人在冷酷的孤独时间暖和起来。（高尔基：《书》——《高尔基文集》卷八，二三八页）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这本《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确是这样一本书。虽然这书的原文——美国康恩教授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Maxim Gorky and His Russia*）——就已经包含着一些模糊的偏颇的见解，然而它没有疑问的感动着读者，引起读者的许多新的思想，教训读者许多生活的经验。书是要会读的。一切书都不会告诉你现成的公式或是什么秘诀——例如成名秘诀，学成文豪的秘诀。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着代替你思想而写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叙述着二十世纪的一个巨人的生活。他从社会的“底层”冲破农奴宗法社会的罗网，燃烧着真正人类的光芒——新的文化的灯塔；挣脱着私有主义和市侩主义的羁勒，而歌颂着洗刷这污浊世界的暴风雨。这高尔基的生活在这里相当的反映出来，虽然不免有些模糊的烟雾，然而这巨人的生活过程始终明显的在读者的眼前经过。美国大学教授的偏见还不至于淹没新世纪文学的巨大形象。

最近有人说起“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然而他所说的上代是“《庄子》和《文选》”（施蛰存先生，见《申报·自由谈》）。

德国的农民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对于中国人是否也算得“上代”呢？像高尔基那样的“文学者”，他的“上代”又是什么呢？

“高尔基紧靠着外祖母的身边，静听她的温柔的话，关于她对于人生，对于贫的和富的，关于她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此时高尔基脑际充满了新的印象，靠着外祖母的温暖的身体，沉沉的睡去。”（邹编《高尔基》，四五页）外祖母的故事，歌谣，神话……以及俄国和世界的“上代”文学对于高尔基决不是一张白纸。但是，这文学也决不是“《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意思，这至少是对于“贫的和富的”等等人生经验的意义。固然，俄皇政府审查合格的小学教科书里，也同中国一样，不会对于“贫的和富的”等等有什么像人话的解释，那里是充满着虚伪和伪善的。然而从民间的故事和歌谣里，高尔基却会吸取一些现代还有生命的东西，也因为这一类的上代文学里的确包含着一些现代的种籽〔子〕。自然，不仅是民间文学。人类文化的成绩，一代代的积累起来，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伟大的反对“思想上的僵尸化”的战斗，都含孕着新的文化和文艺的胚胎。问题是在于怎样在难产的过程里争得新的生命的权利。没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经过“产生”的痛苦过程的。看高尔基的青年时代，他的所谓“大学”——流浪的劳动的生活，再看现代这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以至整个新的社会，是怎样产生的？高尔基对于智识的渴望，他对于书的爱好，那么勇猛精进的态度，其实代表着新兴的整个“社会力量”。在文化艺术方面，他可以算是这个“力量”的象征。

“高尔基在河边的时候，有时候看见易索特也在他的身边，易索特在这种万籁俱寂冷气沁人的夜里，常常诉说他的梦想……他这样说：‘老弟，分你的心灵给别人共享，这是多么一件好事！’分出心灵来给大众共享！文化的生活，理智的，不驯服的，不妥协的斗争，智识，科学，技术……的胜利，克服自然，克服人造的黑暗，愚昧，剥削，偏见，迷信，统治阶级的一切卑劣和欺罔，这是大众的事业，这是先进分子领导大

众的责任。高尔基的一生，高尔基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目的，不会不是这种事业的完成。高尔基现在已经能够亲眼看见这方面的伟大的成绩，新的文学——普洛〔罗〕文学也在高尔基的周围放着万丈的光焰了。

说起来，文化和智识的传播似乎是“智识阶级”的使命。然而，请看高尔基一生的“际遇”罢。亲切的了解大众的生活，对于他们——“智识阶级”，始终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当时高尔基所来往的智识阶级，对于他的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淡漠的态度……这班知识分子都把高尔基看作‘尚须加以同化的原料’，无怪唤不起高尔基对于他们的同情，也鼓动不起他对于他们的信任心。”然而高尔基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一样，对于一切有希望的知识分子，都竭力扶助着，鼓励着他们“为人类的文化”做点事情。俄国后来的许多文学家，除开极少的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高尔基所赞助的。直到现在，他还不断地担任着无数文化方面的工作，帮助新兴文学者的学习……

高尔基对于“智识阶级”的信任心其实也许太大了。“……邱科夫斯基还这样接着说道：‘我们不得不明确地承认，我们在当时那样缺乏面包，伤寒症蔓延的数年间，幸而还得保全生命的，大部分不得不归功于我们都做了高尔基的“亲属”，……我还常常看见高尔基替那些著作家说情，他们在革命以前却曾经卑劣地窘迫过他。’邱科夫斯基还忘记提起的，是那些受过高尔基救济的著作家里面，有许多一跨出苏联的边境，就比以前更加卑劣地糟塌他！”

总之，这本书里，读者——譬如我罢——可以得到文学，社会，以至政治上的许多智识，引起我的许多感想：那陈旧腐败的俄皇政府，那卑劣残酷的市侩主义社会，用尽了一切力量和手段来反对高尔基，压迫高尔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一九三三，一一。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读《革命文豪高尔基》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并且说“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

关于《新生活》报的问题，值得说一说。因为邹先生——也许是美国教授康恩先生——没有清楚的叙述高尔基的改变政治态度和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非政治性质”这句话很可以引起误会。其实，“十月”之后的高尔基，是很快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的——难道他的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后，他的参加“Com. International”杂志的编辑，他的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新的社会的产生，克服着难产之中的一切痛苦，不会不战胜高尔基的怀疑。高尔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报上，的确，曾经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间，他在《新生活》的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写道：“齷齪和垃圾，在太阳好的日子，总要格外显露些；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太紧张的注意那些敌对我们对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实，我们就反而不再看见太阳的光线，仿佛不感觉到它的活跃的力量……现在，俄国民众整个儿的参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事变，应当从这里出发，来估计一切好的和坏的，一切使得我们痛苦和愉快的。”

《新生活》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才停办的；而六月间，高尔基就已经停止了自己在在这报上发表文章，感觉到《新生活》报以前的态度，事实上违背了他的目的：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在后来，高尔基屡次坦白的承认过的。例如白俄侨民的文学家A. 列文松在巴黎“Temps”（《时报》）上攻击高尔基的时候，有一个左倾的杂志“Europe”（《欧洲》）给高尔基一封信，诚恳的请求他答复[复]。高尔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对于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着说什么魔鬼，因为人们想出了，并且拥护着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可耻的结构。我同布尔什维克一块儿走，他们是否认自由的？是的，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拥护一切忠实的劳动的人的自由，而反对寄生虫和空谈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尔什维克争论过，敌对过，当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而农民被战争所无政府主义化的了，而且布尔什维克同农民的冲突，会使工人党灭亡。后来，我相信了，这是我的错误，而现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以及因为这种敌视而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俄国的民众已经走进自己的复兴时代。”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一九〇五年，反动期间，欧战，“十月”，经济恢复和五年计划……那末[么]，我们可以看见高尔基的天才总在反应[映]着当时的事变，回答历史所提出来的新的问题。他自己在斗争，在群众里学习着，他给群众极宝贵的“精神粮食”——伟大的艺术作品。他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里改正自己的错误，磨砺自己的武器。

他说：“当然，在极卑劣的许多次害虫政策的事实之后，这固然是一部分专家的反动手段，可是，我必须重新审定——而且已经重新审定了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态度。”他的重新审定的态度，正是他的新的创作的渊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对人说过：“……我在写着一部大

作品。写的是‘空想出来的’人。我们这里‘空想出来的’人实在多。有人把他们‘空想出来’，而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来’……”这就是《四十年——克里慕[摩]·萨慕[摩]京的生活》。这部大小说是说的一九〇五年之后俄国智识分子的离开革命。这是“中等智识分子”的写真。这种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职位的市侩，是抄袭和盲从别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书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无才的聪明人。结果，他们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拥护那“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譬如上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可惜在邹先生编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见解，不管关于文艺生活的缺少——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读者真正要学习的时候，他自然会深刻的思索，勤恳的找寻材料，用批判的态度去读一切书。那么，像邹编《高尔基》对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我在读完之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而且表示希望关于高尔基，尤其是高尔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邹编的这本同样认真的译本出现。

“美”

普洛廷^①，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说：

“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它不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找着自己的表现和满足，就使人造出艺术来，在艺术里它——“美的观念”——就找到了自己的完全的实现。

对于那些轻视艺术而认为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过在模仿自然界的人，首先可以这样反驳他们：自然界产物的本身也是模仿，而且，艺术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简单模仿，而在使得现象高升到那些产生自然界的理想，最后，艺术使得许多东西联结着自己，因为它本身占有着“美”，所以它在补充着自然界的缺陷。

康德说：“艺术家从自然界里取得了材料，他的想像在改造着它，这是为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这东西已经站在自然界之上（比自然界更高尚了）。”黑格尔说，美“属于精神界，但是它并不同经验以及最终精神的行为有什么关涉，‘美术’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世界”。

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① 普洛廷（207—270），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生于埃及，曾在罗马讲学。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以及《颜氏家训》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至于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祿寿。

对于……

究竟“美”是什么，啊？

照上面的说来，仿佛这是“一相[厢]情愿”，补充一下自然界的缺陷。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呵！”这其实也是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对于 drama（戏剧）是太 dramatic（戏剧化）了，对于 poetry（诗）是太 poetic（诗化）了”。“艺术是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的再现。”艺术的范围不止是“美”，“高尚”和“comic”（喜剧），这是人生和自然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一切。不要神学，上帝，“绝对精神”的“补充”，而要改造现实的现实。

欧洲人的“绝对精神”，理想之中的“美”——以及中国的 caricature（讽刺画）：“潘驴邓小闲”之类，或是隐逸山林之类，都是艺术的桎梏。可叹的是欧洲还有“宗教的，神秘的”理想和它的艺术，而中国的韩退之和文素臣，袁子才和“礼拜六”似乎已经尽了文人之能事了。

“如果很多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意义——再现人生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现象，那么，很多其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除开这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就是解释那再现的现象。最后，如果艺术家是个

有思想的人,那么,他不会没有对于那再现的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不由自主的,明显的或是暗藏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要反映在作品里,这就使得作品得到第三种的意义:对于所再现的现象的思想上的判决……”

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钞[抄]袭。

“在这方面,艺术对于科学有非常之大的帮助——非常能够传播科学所求得的概念到极大的群众之中去,因为读艺术作品比科学的公式和分析要容易得多,有趣得多。”(Tchernyshevsky: Polnoe Cobranie Sotcheneniy, X, 2, 157—158.)

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①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了。因此，胡博士对症下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见报载最近胡适博士的谈话）

据胡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了仇恨，因为没有仇恨心，自然更不抵抗，因为不抵抗，自然更和平更忠诚……中

^① 一九三〇年四月，胡适在《新月》月刊上著文《我们走哪条路》，说危害中国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个大仇敌”，说是“五鬼闹中华”，而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

国的肉体固然出卖了，中国的心灵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适博士说：“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

为着要洗刷这个污点，所以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们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方法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魂灵罢！何况这并不难，只要实行李顿的“公平”报告，那就是“彻底停止侵略”——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三，二十二。

最艺术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而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性。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譬如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同时，老实的民众，想要革掉一切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以便实现反动的民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现在早已回到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哪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又得重新扮过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然后再挑选一下，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就作为被选举人。照文法说，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正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之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行的民权，是纳税的就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是一面并不违背固有文化，一

面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其四，一面是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一九三三，三，三十。

人才易得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①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②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不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

① 这里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比喻国民党政府。“刘姥姥”指吴稚晖。

② 这是章太炎《再复吴敬恒书》(载一九〇八年《民报》二十二号)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痛;善补而裤,勿令后穿。”

守！^①——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②

然而娼妓说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不大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一九三三，四，二十四。

①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对记者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似战似和”等语，本处即在揭露汪精卫。

②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答记者说：“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择 吉

中国的算命先生最善于替人家“看日子”。讨老婆，出殡，安葬，开工等等都要挑选吉日。这叫做择吉。中国的什么纪念日，大概也是用了择吉的法子挑选出来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覆 [复]，所以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辱国条约”。于是乎就为难了，纪念“五七”呢还是“五九”？挑选的结果，北方是纪念“五七”，这是说日本不顾“国际公理”；而南方纪念“五九”，这是说袁世凯卖国，勾结日本。当时是北方代表反动，南方代表革命，北方的吉日是“五七”，因为这似乎可以开脱一些袁世凯的罪名；而南方的吉日是“五九”，因为要着重的指出卖国贼的罪状。现在“南北统一”了，究竟哪一个是吉日呢？今年索性都不准纪念了，而日本正在用枪炮实行二十一条，而且超过了十倍还不止。大概就因为二十一条反正已经实现了罢，所以只有“华租两界加紧防范反动分子利用‘五七’‘五九’，施行捣乱，故宣布特别戒严”云云。这样，似乎“五七”“五九”都不是吉日了。虽然“国耻”的官样文章还在做着。

现在新的择吉问题却是“五五”。“五五”是马克思的生日，又是去年上海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又是十二年前（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究竟纪念什么呢？最近的纪念自然是去年的上海协定，但是现在是只能够纪念“一·二八”日本向闸北开炮的日子，不能够纪念“五五”签订缓冲区协定的盛典。这理由很明显，就是这“并非辱国条约”！至于马克思生日，那不用说，中国比

马克思自己的祖国还“先进”：我们这里早就禁止纪念了，而德国直到今年才由法西斯蒂政府宣布禁阅马克思的书籍。最后，当然是非常大总统就任的“五五”是值得纪念的吉日了。然而我们觉得很怀疑，最近一位“在野的”要人说：“民众无政治智识，致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以前之选举，即其明证，故必须……训政。”十二年前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当然还没有经过训政，那时的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的，不是由“无政治智识的民众”选出来的吗？当时的选举不是“为少数人所操纵”的吗？少数人所操纵的无政治智识的民众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日期，似乎不见得“吉”。那真是为难极了。幸而好，“五五”除开上述三个纪念之外，还有第四个纪念，这就是一九三一年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开幕日，那次国民会议议决了“训政约法”，选举了国民政府主席，宣布了中国的“完完全全的统一”，“建设时期”的开始，大举剿匪的誓师……懿欤盛哉！虽然那年就有了“不凑巧”的“九一八”，似乎有点“不祥”，但是，其实也在“建国”纲领之内的，要知道“九一八”是大亚细亚主义实现的开始呵。

一九三三年。

《子夜》和国货年

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矛盾的《子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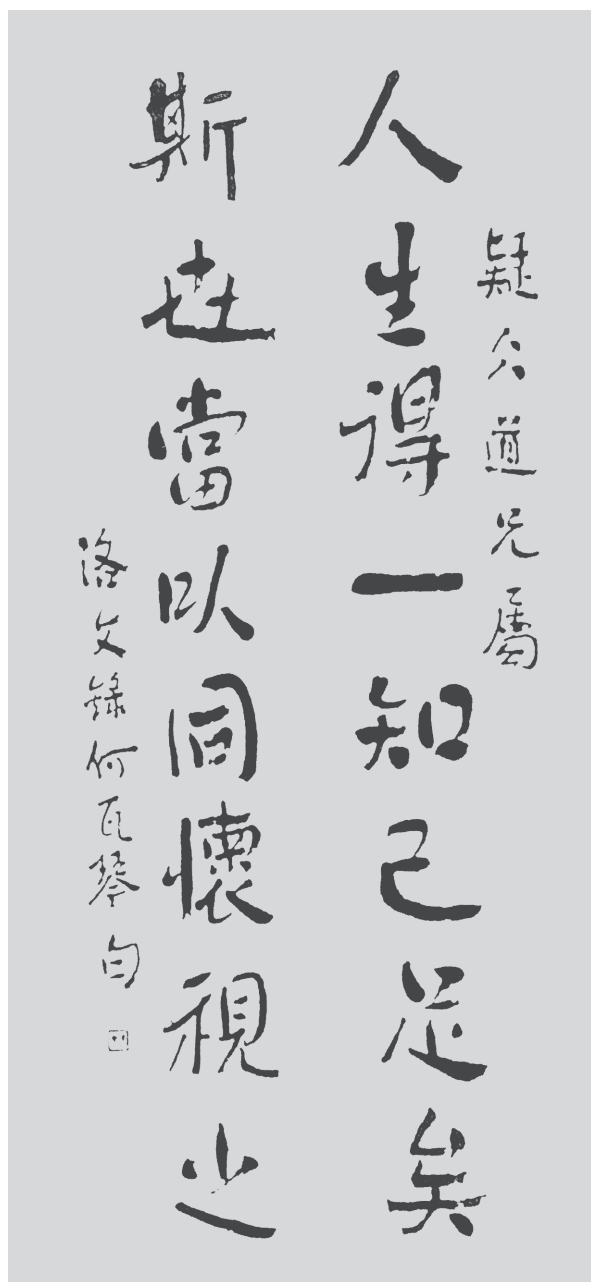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固然，国货可以“救国”，公债听说也可以“救国”，——然而这“救国”是怎样的救法呢？譬如说，《子夜》里的公债大王——银钱业大王老赵就比他厉害。问题原很简单：救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这种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孔夫子就已经说过的了。对于这些种种“大王”，首先要有利润，直接的间接的剥削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修身”之用。谁善于“修身”，谁就可以有“救国”的资格。公债等等有这样的功效，自然要钻在公债里去，这显然不在于志愿伟大与否。于是国货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华洋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掇客！老赵就厉害煞，终究只是掇客。”其实何止华洋合办的企业呢，就是名目上完全华商的工厂，背地里的主人也会是洋资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伟——火柴厂“老板”。（今年是更新鲜了，有些华商工厂，事实上变成了日货的改装打包工厂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觉得这“投降的出路，总比没有出路好得多罢！”

好，投降是决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赵——那个“同美国人打公司的”老赵吗？老赵“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掇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找原户头，何必



《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画)

画家徐悲鸿根据鲁迅和瞿秋白的两幅照片创作的素描《鲁迅与瞿秋白》(未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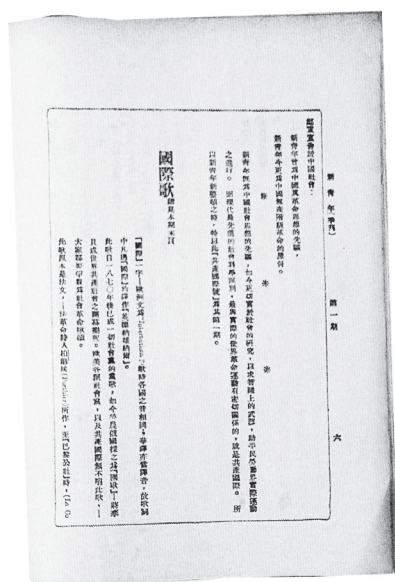
鲁迅书赠瞿秋白的条幅

1933年，鲁迅将清人何瓦琴集裱帖联句，书赠给瞿秋白。瞿秋白非常珍惜，挂在避居的东照里亭子间卧室的墙上。瞿秋白曾用“魏凝”、“何凝”的笔名，“凝”字从“疑”从“欠”。“洛文”是鲁迅的笔名，国民党反动派曾污蔑鲁迅为“堕落文人”，鲁迅用“隋洛文”或“洛文”作笔名，以示“回敬”。



瞿秋白和杨之华合影

1924 年底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合影。



G 調 國際歌 1/4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一) 起來，受壓迫的兒女！起來，天下無產階級！起來！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二) 不論是哪種壓迫，不論是哪種苦難，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三) 總有偉大的勞動軍，總有我世界的勞工，有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一) 勝熱血的鬥，勝死戰決矣，勝低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二) 解放不得我們，紅線我們自己，更強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三) 勝利來死大地，那裏勝勝寄生蟲。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一) 勝值得這，新社會創造得光華，真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二) 勝萬重的壓迫，爭取自己的權利，勝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三) 勝這世界，勝這世界，勝這世界。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一) 勝我們一樣，不論現今那，有天下，這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二) 勝這世界，勝這世界，勝這世界。

♩ | 1 2 3 4 | 5 4 3 2 | 1 2 3 4 | 5 4 3 2 |

(三) 勝這世界，勝這世界，勝這世界。

《国际歌》

瞿秋白译《国际歌》歌词，配有简谱。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1期，署“柏第埃”著，未署译者名。“柏第埃”，今译鲍狄埃。瞿秋白是第一位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者。

《前锋》是中共中央又一理论刊物，由瞿秋白创办并主编。1923年7月1日，创刊号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刊行。为了蒙蔽敌人，刊物版权页上将“出版者”标为“广东平民出版社”。本期刊载瞿秋白《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等文章。图为《前锋》创刊号。

前鋒

創刊號

本誌籌布

目錄

一、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	孫錦
二、現代中國的國會制度與軍閥	程秋白
三、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	趙維它
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	趙維它
五、中國農民問題	獨秀
六、中國最近婦女運動	雪千
七、寸鐵	
八、省憲下之湖南	石山
九、法西斯主義之國際性	太雷
十、近代印度概況	太雷

[illegible]

我們現在暫時還不能不說「改造新舊」，這完全是新的生活，新社會的條件所決定的。但是我們增加了許多新的目的，我們暫時不談這個。但是我們增加了許多新的目的，我們暫時不談這個。但是我們增加了許多新的目的，我們暫時不談這個。

五四

瞿秋白创作的新诗《心的声音(五)远!》，刊载于1920年8月5日《人道》月刊创刊号。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首新诗。

名可屢移頭可斷
心凝堅鐵血凝霜
今日東風吹永晝
秋陽皜皜似春陽

題瞿秋白筆名印譜

一九五九年九月 郭沫若



瞿秋白筆名印譜

郭沫若为《瞿秋白笔名印谱》题词 (1959 年 9 月)

释文：“名可屢移頭可斷，心凝堅鐵血凝霜。今日東風吹永晝，秋陽皜皜似春陽。題瞿秋白筆名印譜一九五九年九月郭沫若。”

借重他这位掮客！”这所谓原户头——“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投降问题。受降的主顾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头等恶霸，岂有不互相打得头破血淋的道理。不过这些恶霸也不这么蠢，他们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他们自己直接开火的时机暂时还没有到，却先让中国来做“狗”的战场。形势自然十分复杂，中国的“人”当然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例如，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拚[拼]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见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大众在实践里学习着。大众的斗争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各种大王，然而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那些狗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这个浪潮，假装着吉诃德老爷式的“国货奋斗”，不过是这些手段之中的一个。无论是吴荪甫，无论是老赵，是周仲伟——这些种种色色的大王，城里的，乡下的，都是很担心的。像冯云卿那样的地主，他不能够不躲到上海来做公债，以至出卖自己的女儿，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闹。而上海虽然比较稳当，也在成天闹着工潮，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

这对于他们——互相排挤着的他们——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

他们，连并不留恋顽固的乡村生活的“工业家”也在其内，都要和“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他们又要勾心斗角地对付工人，要想“一网打尽那些坏家伙”。他们“身边到处全是地雷！一脚踏下，就轰炸了一个！”……他们的“威权已处处露着败象，成了总崩溃！……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们的处境的确是这样，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咽喉。

在他们的周围盘旋着的，固然也有个把屠维岳，——有点儿小军师的手段，会用一些欺骗的挑拨的把戏，不过连他也始终只能够“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而屠维岳之外，还有什么人材？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社会的渣滓。连自以为钢铁似的吴荪甫本人，也逐渐的变成了“色厉内荏”，说不出的颓丧，懦怯，悲观，没落的心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五年前参加五卅运动的智识青年，现在很有些只会“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楼，希图追踪尼禄（Nero）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〇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说到《子夜》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

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曾经通行过几年，当时甚至于将军和绅士都为着要变成忠实同志或是“革命军人”起见，也高喊过的。可是这个口号的历史十分曲折。

最初，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个“过激派”的杂志上提出了这个口号，没有什么“人”注意。可是，不久这口号就渐渐的传播了出去，一些革命的“学生子”开始研究什么是帝国主义，懂得五四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虽然还不彻底。这风气一起来，胡适博士就大起恐慌。一九二二年，胡博士用什么“实验主义”证明“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他说反帝国主义就是反对西洋文化，有些义和拳的气味。然而胡博士的“权威”并没有多大力量。这口号还是在流行出去，而且越流越广，甚至于什么矿坑里也看见这一类的标语。

一九二三年就出了这么一段故事：一位前参议院议长某先生说，过激派提出这个口号，目的是在挑拨“友邦”的恶感，陷害中国的老牌革命党，使它在外交上孤立。另外一些人就说：原先的“富国强兵”，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本来也都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那些旧口号是民众容易懂得的，现在何必又提出这种新鲜的口号。仿佛嫌它太欧化，“比天书还难懂”。

然而不久，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衙堂口会发见〔现〕画在那里的乌龟底下有小孩子写的“帝国主义”的字样。马路上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的五更调。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

准的标语。其实这是因为民众并不嫌它难懂了，而且懂得“太厉害了”，所以必须照准，以便加以曲解和利用。“五卅”是这样过去的。

后来，民众有点倒霉了；于是可以重新公开的欢迎洋大人，广州市上用黄土铺道恭迎香港总督金文泰的时候，特派三百名夫役洗刷墙壁上的“打倒帝国主义”。这样准备着“五三”的来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那天，日本帝国主义把“代表中国国家的”交涉员捉去，割掉了鼻子和耳朵，挖掉了眼睛，后来说连尸首也没有找着。然而“打倒帝国主义”却听不得，相反的，中国的“国家”不但不生气，还和日本订立了“最惠的”关税协定。足见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又从奉旨照准变成了“反动的”了。

所以今年纪念“五卅”，“五三”，“五四”等等的时候，就有一位要人出来说：“标语口号的年代早已过去的了……越是沉默越是坚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应当“没落”，沉默主义“万岁”！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口号完全没有用了。相当的用处还是有的，譬如仅只在屋子里喊喊之类。今年“五一”的时候，要人们所指挥的“工会”发表了“告工友书”，是说中国工人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因为“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侵略”。还有人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这仿佛很义气的替外国工人打“抱不平”，像要打倒帝国主义似的。然而谁都知道这些话是“话中有话”的，意思倒是着重在中国工人不应当反抗本国资本家的“有理的”压迫。这种奸猾的运用口号和纪念的手段，倒是十分巧妙的“艺术”。

中国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如果是一个活人，它的古典和历史倒像一部很有趣的小说。水浒上有真假李逵打架的故事，中国的“打倒帝国主义”也是假的和真的在这里相打。真正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只有劳动的民众。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①

文学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对于当时战争的态度是文学界之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赞助帝国主义战争的是反革命，而反对这个战争的是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开始。最近四五年来中国，重新开展了断断续续的军阀混战。很自然的，那些所谓“民族诗人”要出来歌颂这种军阀战争。而劳动民众是坚决的反对这种战争的，他们一定同样坚决而英勇的去反对列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瓜分中国和屠杀民众的战争。但是，中国同时还开展着红白的战争，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实行过进攻苏联的战争，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准备着新的进攻苏联的战争。自然，所有这些维持剥削制度的战争，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是在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进行的。中国一切反动的文学更自然的站在白军的战线上，用一切无耻卑劣的谣言和咒骂帮着白军的枪炮来攻打民众，攻打工人，攻打已经建设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劳动民众，可积极的反对白军，反对进攻苏联，因为反对白军的战争以及拥护苏联的战争，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战争，是为着劳动民众的解放的。革命文学和普洛〔罗〕文学对于战争的态度，自然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的态度。

满洲事变发生之后，直到上海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民众是站在一个新的问题的前面：革命的民族战争被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压制着出

^① 原文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出版的《文学》上，署名“同人”。

卖着。这里，问题是比较的复杂。劳动民众是不是简单的拥护上海的战争？或者，反对上海的战争？这显然都是不对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劳动民众说：我们大家都要赞助以至于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同时必须反对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也就是中国革命普洛〔罗〕文学应当采取的态度。

最近，日本的普洛〔罗〕文学已经坚决而明显的表示反对进攻满洲和上海的战争，并且号召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努力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也就是革命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态度。日本的工人反对日本资产阶级派兵来打中国，而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要把日本资产阶级派来的军队打回去。——这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夹攻。这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

而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呢？中国的绅商的一切种种文学家呢？他们哀求着列强来“主持国际主义”，宣言“绝对尊重条约的尊严”，——他们歌颂着“和平和公理的战胜”。他们为着要欺骗民众，方才狂喊几声：用四万万人的肉体去塞住日本的炮口，其实，这只是用死来赌咒，而根本上并不希望这种反日战争的胜利。他们还根据自己的所谓“民族主义”，而称赞“敌人有为国奋斗的青年”。这样，是要日本的“青年为国家奋斗”，而中国的民众去填炮口，——双方配合起来，恰好完成同卖中国的任务！

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文学，正在这样进行着欺骗民众，鼓吹屠杀，以及卖国的送命主义。

上海战争的事实应当叫醒更广大的群众，揭穿各种各式的欺骗。上海的反日战争是前线的兵士群众发动起来的。党国要人和绅商名流的帮口虽然多，意见虽然复杂，互相攻讦得虽然很热闹，可是，他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他们只想用什么手段来欺骗民众和兵士，而决不

想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更不想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上海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军事当局表面上算是指挥着作战，而实际上严禁进攻日本军队的大本营（租界），党国中央政府表面上宣言“长期抵抗”，而实际上故意不派救兵；中国绅商的各种团体表面上去慰劳兵士，而实际上欢迎英美法意的军队，主张保存“上海公共租界的商业精华”。他们都是用假抵抗的手段实行不抵抗的主义。结果，自然中国方面是失败了，这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抱定了失败主义的目的，用假抵抗的假面具把持着战争的指挥权！一个月的猛烈战斗，真正用小兵去填日本的炮口！而失败之后，退出上海之后，党国要人和绅商名流已经在实行谈判了，已经宣告把上海的闸北吴淞完全交给日本，“倘使日本不再进击，我军决不开始攻击”。……以后到事变还不都这个样吗？！

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起来自动的发展这个革命的民族战争，一直到完全由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权来指挥。只有这样，才能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这就必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参政的权利。那些冒充革命的人，现在出来主张什么国民会议，要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普通的平等的选举，这种普选的国民会议是“民众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些人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小走狗罢了。真正的民众政权，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动民众的代表会议，禁止地主资本家参加的民众代表会议。只有这种民众政权方才能够战胜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现在发展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民族战争，以及反对出卖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一定要在广大群众参加战斗的过程之中，建立起全中国的真正民众的政权。这才能够真正解放中国，真正解放中国的一般劳动民众。

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普洛〔罗〕文学，没有疑问的，一定要赞助这

种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同时，还必须在文艺战线上努力揭穿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公理”，“同情中国”等等的假面具，必须揭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假抵抗的一切种种假面具。

因此，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要创造极广大的劳动的群众能够懂得的文艺，群众自己现在能够参加并且创作的文艺。劳动民众和兵士现在需要自己的战争文学，需要正确的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需要用劳动民众自己的言语来写的革命战争的文学。中国的革命普洛〔罗〕文学，应当调动自己的队伍，深入广大的群众，来执行这个任务。

一九三二，三。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马克思关于文艺的议论，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里，例如《资本论》里就有好些说到莎士比亚或者巴勒扎克的话。此地，只译了极少的几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和恩格斯关于《息庆耿》的书信。这是他们对于“革命文学”的具体批评。在这两封书信里，读者可以看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立场和文艺创作底〔的〕关系的意见，以及他们关于文艺底〔的〕创作方法的意见。

《息庆耿》这部悲剧是拉萨尔做的。拉萨尔自己以为这部悲剧表现着革命之中的矛盾，而是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艺术上的”结论。

拉萨尔在六十年代（十九世纪中期），是德国工人运动底〔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他虽然是马克思的学生，虽然是德国最早的工人政党底〔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不久就发展了“自己的”的主义——机会主义，形成了所谓的拉萨尔派。他最初是“忏悔”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妥协，认为革命底〔的〕失败是由于指导者底〔的〕“理智”太强，没有顺着群众的热烈的“情感”一往直前地前进；后来，他这种“理智的与情感对立论”底〔的〕错误，又把他引导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信仰群众底〔的〕的力量，甚至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群众都是一般的“反动群众”，而非常之崇拜所谓“现实政策”——敷衍涂砌的改良主义，他以为只有个人的英雄能够改造社会，能够统一德国。因此，他屡次企图“联合”俾士麦克——他和俾士麦克有过许多通信（见 Gustav Mayer, “Bismarck und Lassalle. Gespräche und Briefe.” Berlin, Dietz, 1928），这就简直是背叛工人阶级了。

在《息庆耿》那部悲剧里，拉萨尔对于一八四八的革命的“绝望”，以及倾向于唯心的解决“革命矛盾”的情绪，都已经表现了出来。息庆耿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代底〔的〕人物，他和他的顾问古滕都是德国历史上的著名“英雄”。拉萨尔描写他们反对诸侯底〔的〕失败，想要暗示革命之中“理智与情感”底〔的〕根本冲突。他根本不了解十六世纪的农民运动底〔的〕意义。他同样的不了解 1848 年前后的革命策略，所要联合的，不是群众的民权主义，而是自由派的上层阶级。所以马克思批评他说：

你也许像你自己的弗朗茨·封·息庆耿一样，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也做了那个外交式的错误，就是把路德派武士阶级的反对派放在蒙采尔派平民阶级的反对派之上了。

当宗教改革的时代——封建制度正在崩溃之中转变着自己的形式，适应着商业资本的新的发展。当时的武士阶级（恩格斯信里叫做贵族），也在反对着皇帝诸侯底〔的〕旧式统治。而同时，“骚动”的农村中，却还有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着统治阶级，这可是另外一种的反对派。武士阶级底〔的〕反对，不过是因为当时的皇帝“从武士底〔的〕皇帝变成了诸侯底〔的〕皇帝”了。这仿佛中国底〔的〕一些“失意的”绅士，要提出打倒劣绅的口号。而自命为正绅。他们其实都在幻想着恢复古代“拳头政治”。那古代的“拳头政治”，是所谓“太平”时代：每一个地主——直到小地主，都是当地的土皇帝，可是任所欲为；而后来，商业资本把市场作用扩大了，因此也扩大了“行政区域”，于是有些地主——武士，所谓“正绅”的“拳头”势力，就被兼并了，被剥夺了，诸侯以至于皇帝客观上执行着集中化的作用。贵族之中发生了好些破产的，落伍的，因而“忏悔的”武士，他们忽然出来替平民

打抱不平了。至多，他们只会客观上代表一些初初发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要的，也许是“民族的统一”，也许是“宗教的自由”，也许是笼统的改革和进步，“文明”和“光明”。他们的主要策略，不会不是妥协主义，不会不是“从上面来维新”，尽可能的多保存些封建式的特权和中世纪式的一切种种齷齪东西。至于农民和一般城市平民群众底〔的〕民权主义，那却是相反的，他们要求尽可能地肃清封建的一切残余，彻底地扫除中世纪的腐败恶劣的垃圾堆，尤其是农民所要求的改革，——废除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是要废除封建阶级的物质基础的。因此，这两种反对派之间，不会不发生冲突，这是阶级的冲突——而不是什么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不是什么心理上的悲剧。对于息庆耿——武士贵族的代表，悲剧是在于他是没落的阶级，他的前面站着兼并他的皇帝和诸侯，他的后面又是要连他都推翻的农民群众，真所谓前有毒蛇，后有猛虎，是个没有出路的局面！他的“改革”客观上只是维持旧式剥削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是所谓路德派的反对派。至于蒙采尔——德国农民运动的一个领袖——却是群众的革命要求底〔的〕象征，他所要的是根本推翻封建底〔的〕一切种种方式的统治。这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工人应当联合农民群众底〔的〕革命的民权主义，而反对武士正绅改良的立宪主义或者训政主义。乌梁诺夫说：

正是“左派联合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现代的无产阶级）同民权主义的农民底〔的〕联合，使得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得到那样的规模和力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了许多次，不但在一八四八年，而且在此后很迟的时候。为得不要再引那些引证过许多次的话，我们现在提出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和拉萨尔的通信。马克思关于拉萨尔的悲剧《息庆耿》说：那篇戏剧里所表现的冲突，“不但是悲剧的，而且正是把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的革命党极有理由地引导到了破产的那个悲剧的冲突”。马克思已经一般地指出了后来同拉萨尔派和爱圣纳赫派的不同意见底【的】整个路线，他责备拉萨尔，说拉萨尔做了错误，“因为把路德派武士阶级的反对派放在蒙采尔派平民阶级的反对派之上”。我们这里不关涉到马克思底【的】责备是不是正确的问题：我们以为这是正确的，虽然拉萨尔竭力地辩护，要想逃避这个责备。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拉萨尔都认为把“路德派武士阶级的”反对派（译成二十世纪的俄国话，就是自由主义地主阶级的反对派）放在“蒙采尔派平民阶级的”反对派（同样的翻译出来，就是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反对派）之上——显然是错误的，还对于社会民主党是绝对不容许的！（乌梁诺夫，一九一一年，《选举运动底【的】原则问题》——见乌氏文集第二版，卷十五，三四七页）

总之，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对于工人革命家——“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一年还是工人革命政党底【的】正式名称——“是绝对不容许的”。拉萨尔的政治立场，他的机会主义，他对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同情，——也反映在他的文艺创作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评他的错误。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绝对不容许的，——因此他“竭力地辩护”，——然而事实上他是抱定了这种错误观点。用不着埋怨什么“诛心之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拉萨尔的“诛心”的批评，的确预言了拉萨尔的政治命运——他始终走上了同俾士麦联合的道路！文艺和政治是不会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或者，作家主观上要做一个“即使无益也不会有害”于革命的职业文学家，更好些的，甚至于自以为是“从来没有做过错误的”革命文学家，然而，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曾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或者，

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这对于诚恳的要想向着光明前进的作家，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的。例如只要“伟大”，不管什么别的“闲事”的文学家，自然可以不顾这些问题。他们的意见是：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贝尔等等始终是“伟大”的，虽然他们“并无正确的意识”；努力做个“托尔斯泰”罢！当然咯，拉萨尔虽然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却成了世界史上的名人，而当时的非机会主义的无名小卒，始终只是些无名小卒。对这一类的“文学家”，还有什么话好说！

关于文艺的创作方法——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塞勒主义”是“极大的错误”，恩格斯也说：“思想之外，不要忘记现实主义的要素，塞勒之外不要忘记莎士比亚。”

拉萨尔的塞勒主义是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这是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既然用唯心论的观点去分析革命势力底〔的〕消长和革命之中底〔的〕“悲剧的冲突”，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反现实主义的道路。塞勒的创作方法，就是专靠一些“时代精神”的代表思想，用一些“英雄”来做他们的化身。这样，拉萨尔的创作方法，就是专靠一些“时代精神”的代表思想，用一些“英雄”来做他们的化身。这样，拉萨尔创作的方法，一开始就走上错误的道路，他跟着塞勒，至多只能够走到左派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用一些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的空谈，来掩盖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糊涂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底〔的〕时代，那种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固然也有些“优点”，它客观上表现着新兴的青年的先进阶级底〔的〕“狂飚和袭击”，但是同时，它已经在反对封建的过程之中埋伏着蒙蔽群众的迷药。这就是一些笼统的“博爱，自由，平等”的欺骗，一些“高尚的情思”，一些含糊的“正直”，“进取”的口号。这里，不会有切实的认识现实，也就不会有切实的改造现实底〔的〕意识上的武器。阶级的观点是不用说更不会有的了。正眼观看现

实的真正勇气，被虚伪的空喊的“英勇”所代替了。何况拉萨尔写《息庆歌》的时代，那些“英雄的”狂飚主义的使命早已过去了，剩下的只是空洞的革命情感主义——对于自己是欺骗，对于群众也只是欺骗。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本身就 and 全人类社会底[的]真正进步是一致的，他们的热情，理想，高尚情思的根源，就发生于赤裸裸的丑恶的现实，他们用不着虚矫的神圣化的情感上的麻醉和刺激才能去鼓动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只是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底[的]需要。相反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切实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认识现实——认识具体的阶级关系和历史条件，这是决定他们革命策略的基础，这是改造现实底[的]真正的出发点。所以在文艺上，他们不会需要浪漫主义。中国底[的]初期革命文学——往往有些“革命的团圆主义”，那是比拉萨尔更粗浅十倍的，可是，居然会被称为“普洛[罗]文学”！

自然，说“不要忘记现实主义的要素”，并不是要抛弃一切热情，理想，思想和“最终目的”。只有庸俗的实际主义者，才会只管今天的饭碗或者明天的饭碗，只顾个人的“衣食住行”——而不要一切理想和思想，不要热情和鼓励，不要“理论”和“幻想”，不要“发议论”或所谓“哲学化”，——有人认为这是实际主义，甚至于认为革命也只有这样“实际”才能够干，至多，也只想到个人没有饭吃才要革命，革命只不过是穷人造反，丝毫高尚的理想也没有。可是，无产阶级却不但要吃饭等等，他们的“实际”是按照现实的社会阶级关系，去改造整个的社会的制度，他们这个革命高尚理想不会是乌托邦；可也决不是饭碗主义，或者名利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科学”底[的]俘虏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英勇的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把这些情感和理想建筑在现实生活

的基础之上，怎样表现意识转变的唯物辩证的规律性。

文艺应当是改造社会底〔的〕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武器。社会的斗争是多方面的，社会现象底〔的〕本身是变动的，是人自己的行动所组成的。如果文艺也还是人的行为底〔的〕一种，那么，谁也不能够禁止它影响社会意识的形态，也就是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之中去辅助现实底〔的〕改造。反动阶级其实本能地感觉到这种可能，有时候是有意的制造着欺骗，他们时常运用文艺来阻碍社会底〔的〕改造，麻醉群众的意识。所以现在“十月”之后的新兴阶级，他们的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绝对不会是简单的照相机主义。这现实主义决不会说，只要“绝对”客观地反映现实，“自然而然”就是革命文艺。其实，主观上要想“绝对客观地”表现的作家，他往往会走到所谓超阶级的的观点，而事实上，把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等所反映的“狭隘的小小的中等资产阶级”的世界，或者守旧复古的农民的世界，当做是现实的世界。这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却未必就是“无害而甚至于有益”的文艺。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等的文艺，在当时的环境里，因为许多种的具体原因，可以在一定的国家发生相当的革命化的影响，在现实的环境里，也必须新兴的阶级用自己的阶级立场去批判，才能够真正接受这种文化遗产。无产阶级阶级的和党派的立场，因为根本上是反对保存一切剥削制度的，所以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客观的立场，——不但在哲学科学上是如此，在文艺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说，艺术是繁盛的一定时期和社会物质基础底〔的〕发展并没有任何适应。“死鬼常常会抓住活人的。”过去时代的意识往往会残留在现代，何况统治阶级总是些“骸骨迷恋者”，时常想利用“死鬼”来箝制“活人”，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也会无意之中做了死鬼的爪牙。但是，胜利的工人阶级却要冲破这个天罗地网，他们不但实行了改造经济的计划，并且在这种计划里进行着思想意识上的斗

争，文艺的新的繁盛时期尽可能地跟着社会物质基础底〔的〕改造而开展起来。革命战斗远没有胜利的地方，文艺斗争应当也是这种战斗之中的一个阵线。“不做你们——旧社会——的走狗，始终要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这是“超阶级”文学家所应当有的觉悟。

如果神话是“自然界和社会形式在民众的幻想之中所经过的无意之中的艺术上的制作”，那么，现在这簇新的时代底〔的〕艺术，应当是民众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形式的自觉的了解底〔的〕艺术上的表现。这新的艺术应当是民众的，——只顾作家底〔的〕自由不顾读者群众底〔的〕需要，拒绝估计民众底〔的〕兴趣，拒绝适应民众底〔的〕要求，拒绝表现民众生活经验而回答他们的疑问，希望和理想，那是资产阶级“高超的”个人主义，这新的艺术应当根据于新的阶级的党派的科学，这就要有脱离了神话和资产阶级科学底〔的〕支配的“幻想能力”。现在不但迷恋着宗教神话的艺术，是“可笑的假扮小孩子的成年人”，就是迷恋着易卜生时代的文学家，也象〔像〕满头插着红花绿叶的刘姥姥，很难冒充年轻姑娘的老妖精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不然的话。我们必须继承这些遗产，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阶级的立场，一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底〔的〕宇宙观，而在克服可能的错误底〔的〕过程之中，去达到真正科学的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底〔的〕认识。对于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都要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成年的大人，——那过去的儿童时代是不能够再来的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也是这样。马克思教我们留心希腊时代的艺术，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社会底〔的〕儿童时代，你可以在这里“再现”儿童时代底〔的〕天真稚气的可爱的景象，而不能够自己也去“重新变成小孩子”，那是可笑的。